

# 新视界

## NEW VISION

### 学术讲堂

新千年的全球失序 ..... P01

### 时事观察

威权主义心理视角下的中日关系分析 ..... P14

### 国关人物

杰克·斯奈德 ..... P17

### 他山之石

社会科学研究如何提高教学质量（二） ..... P23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

## 编者的话

连日的雾霾不禁让人联想到中国经济发展的高昂成本，我们在专注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似乎忽视了发展的质量。在这个令人沉思的冬季，新鲜出炉的冬季号希望能引发读者对于国际关系的更本质的思考。

兰德尔·施韦勒教授做客南开，讲述新千年的国际秩序。施韦勒教授以熵比喻当今世界不断增加的混乱和不确定，认为国际体系未来很可能走向失序和功能失调，国家间围绕地位、威望和权力的竞争很可能加剧。

肇始于2012年钓鱼岛争端的中日紧张关系给2014年的东亚局势蒙上了一层阴影。日本是中国未来外交破局的重要突破口，不得不慎重对待。《威权主义心理视角下的中日关系分析》从政治心理学角度帮助我们理解与我们一衣带水的东瀛邻国。

本期的国关人物介绍了杰克·斯奈德教授。在斯奈德教授看来，“战略文化”是现实的战略制定过程，不懂一国的战略文化就无法正确理解该国的外交决策。未来的研究主流将采取问题导向，需要“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民主的实现是一个艰辛的过程，需要充分发挥政治智慧。这一切需要扎实的学术积累。

学习国际关系离不开国际视野，海外背景和英文能力无疑是国关学子的重要追求。本期“海外南开人”和“英采飞扬”栏目的作者将展示去海外求学的原因、感受和申请过程，以及如何运用英文阐述本学科的重要概念和现象。

年终特辑盘点了2013年世界政治的十条重大事件，既把握了当今局势，也有助于见微知著，启迪未来。南非前总统曼德拉于近日去世，不禁让人感叹风云变幻，又一位伟人永远成为历史，而未来的历史有待后来者塑造，每一位国关学子都有思考的责任。周边的变化更让我们思考，未来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否需要改变？

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社会，不断挑战人们的常识，也让人们思考在未来的世界，中国何为？这是否是一个变革时刻？

姜忆楠

2013年12月

# 目 录

编者的话..... (I)

## 学术讲堂

新千年的全球失序.....兰德尔·施韦勒 (1)

## 时事观察

威权主义心理视角下的中日关系分析

.....季乃礼 (14)

## 国关人物

杰克·斯奈德..... (17)

## 他山之石

社会科学研究如何提高教学质量 (二)

.....加里·金、玛雅·森 (23)

## 海外南开人

海外留学记.....杨 锋 (30)

## 英采飞扬

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体.....郭晓琼 (32)

什么是公共物品.....郭晓琼 (33)

## 年终特辑

2013 年终大事盘点..... (34)

《新视界》2013 大事记..... (46)



新视界

NEW VISION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主管

《新视界》编辑部 主办



2013 年冬季号

【总第 16 期】

2013.12 出刊

主编：吕 海

本期执行主编：郭晓琼

副主编：

曹 滢 郝丽君 沈 琳

刘芮宁 王宝盆 郭晓琼

编辑部成员：

陈一一 程 康 董柞壮

胡阳阳 姜忆楠 缴懿鑫

李 漩 李安琪 李冰莹

李家胜 李志宇 刘 志

刘雨晨 马焱粮 马逸群

宁鹏举 裴 瑶 彭紫嫣

任 娟 石 宇 孙 迪

唐铭兴 王 燕 王芳琳

杨 雪 姚丽丽 于凯玥

张晓康 赵 政 赵姝婧

封面设计：郭晓琼 刘芮宁

# 目 录

新书架 (四) .....	(48)
院系活动	
学术交流.....	(51)
师生活动.....	(58)
校外短讯.....	(62)
国际关系系科研简报	
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科研简报.....	(64)
国际关系中文核心期刊最新论文篇目信息.....	(67)
国际关系英文核心期刊最新论文篇目信息.....	(71)
读编往来 .....	(78)
国际关系系论文注释体例.....	(80)
征稿启事 .....	(86)

## 刊物简介

《新视界》(季刊)于2010年6月改版创刊,由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主管、《新视界》编辑部主办。本刊秉承“知识性、交流性、原创性”原则(张睿壮教授语),在学院领导、教师的悉心支持下不断发展、壮大,也得到院内外师生、校内外读者的关注与好评。

《新视界》编辑部下设编辑处、秘书处和宣传处等部门,由不同专业、年级在校学生组成。编辑部成员以“我的视界我做主”为理念,旨在以此为平台,活跃学术氛围、引导学术思辨、推动学术争鸣,为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者、学习者、关注者开启“新的视界”。

编辑部倡导“立足于南开,但又不限于南开”,热忱欢迎校内外和国内外学人、师生来稿来函,为刊物发展提供宝贵意见和强劲动力。

## 通讯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4号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新视界》编辑部  
(300071)

## 邮箱:

[newvision@mail.nankai.edu.cn](mailto:newvision@mail.nankai.edu.cn)

## 网址:

<http://nknewvision.yolasite.com/>

## 博客:

<http://blog.sina.com.cn/nkirnewvision>

**注:未获本刊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媒体不得转载本刊原创内容。**



## 新千年的全球失序\*

**【编者按】**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当今世界发生了太多标志性变化。对于世界的发展趋势如何，自由主义学者、现实主义学者分别给出了不同的预测。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创立者兰德尔·施韦勒 (Randall Schweller) 教授从结构和过程、宏观和微观层面向我们阐释了为什么他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失序的世界。

主讲：兰德尔·施韦勒

时间：2013 年 11 月 28 日

地点：南开大学范孙楼 440

**主讲人简介：**兰德尔·施韦勒 (Randall Schweller)，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Ohio State University) 政治学教授，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创立者。其代表作有《没有应答的威胁——均势的政治制约》(*Unanswered Threats: 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致命的失衡——三极与希特勒的征服世界战略》(*Deadly Imbalances: 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在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ecurity Studies* 等顶级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新著《麦克斯韦妖与金苹果——新千年的全球失序》(*Maxwell's Demon and the Golden Apple: Global Disorder in the New Millennium*) 将于 2014 年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

今天我想谈谈几个月之后即将出版的书。这是本关于宏理论的书，其内容非常具有理论性。谈到我写这本书的原因，我不知道你们中有多少人知道查尔斯·格拉瑟 (Charles L. Glaser)，他的上一本书是《国际政治的理性理论》(*Ration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这本书是现实主义的，关于防御和进攻理论、安全困境等等，但对于我来说，这本书的内容太过时了，不是关于 21 世纪的问题，不是 21 世纪的现实主义，这本书中说世界没有什么改变。在我看来这不够好，因为事实上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数字革命改变了每件事。我们要思考国际关系的哪些东西变得不一样了。

当我做这个演讲的时候，我不再是一个完全的现实主义者了。让我们继续看看权力的概念和世界发生的标志性变化。我现在来到中国和在座的各位进行交谈，这种情况在 30 年前是不可能发生的，这种变化不可谓不大。

这本书的题目《麦克斯韦妖与金苹果——新千年的全球失序》看上去有些奇怪，不过我可以解释的是，“妖 (demon)” 在美国有些像邪恶的部分，听起来是坏的，而“金苹果 (golden apple)” 是好的部分，这两个是相反的。

我要谈论的是世界已经进入到“熵”的时代 (the Age of Entropy)。“Entropy” 是借用了

---

\* 本文由本刊编辑部组织翻译整理，未经施韦勒教授审校，错漏之处由本刊负责，望读者批评指正。本刊邮箱是 [newvision@mail.nankai.edu.cn](mailto:newvision@mail.nankai.edu.cn)。

来自物理学的一个概念“熵”，是热力学第二定律中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它的内容非常广泛，但它的中心概念是失序（disorder），能量不能起作用。而我们的世界正处于失序当中，尽管这不是很美好，但是却是真实的。

首先要说的是全球权力扩散。第一部分我将用所有类型的标志指数（indicators）来向大家展示世界在结构层次上发生着何种改变。结构是指各个部分对彼此如何反应、实力的分配等等。根据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中央情报局的数据，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变化。这是新的复合全球实力指数预测（图 1），包括文化、教育、科学实力等等，不仅仅是军事实力。在这张图上，中国、印度在上升，美国、欧盟、日本在下降。大家可以看到世界权力在扩散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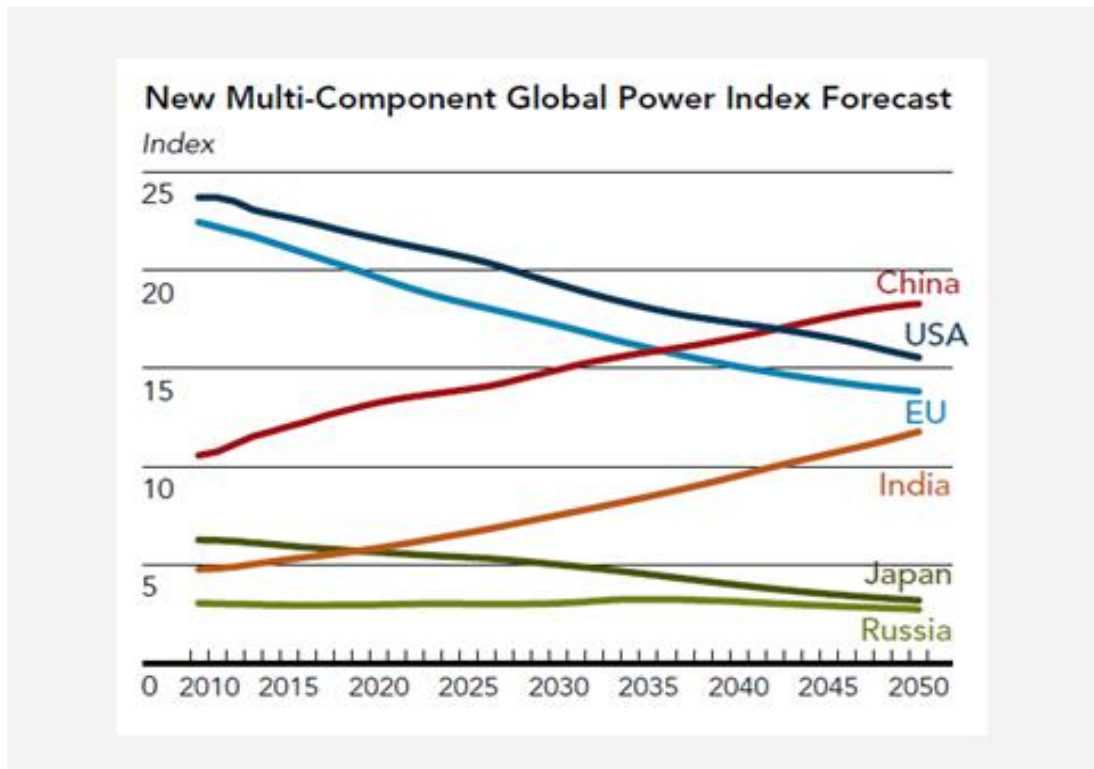


图 1

经合组织（OECD）可以看成发达国家，Non-OECD 可以看做是发展中国家。根据 CIA 数据（图 2），转折点（turning point）在 2030 年左右。再来看看人口机会窗口（demographic windows）的相关数据（图 3），我们可以看到德国、日本、俄罗斯的人口机会窗口在增长。再来看看金砖国家（BRICS，图 8），中国也是其中之一。重点在于，这个世界存在着大规模的权力转移：西方世界不再是权力的中心，而新兴国家在不断获取从西方国家中流散出的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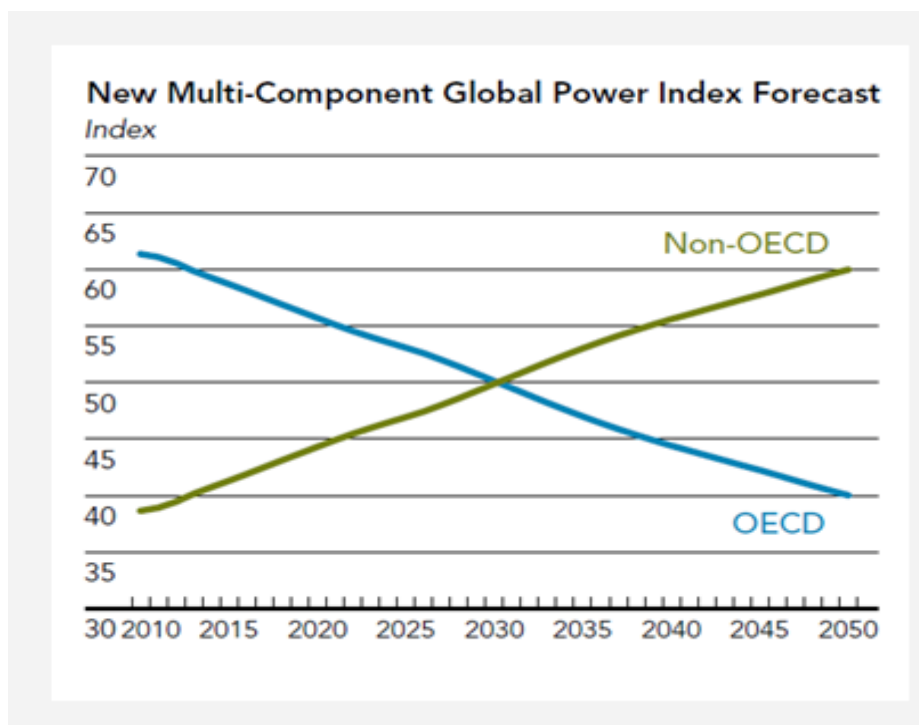


图 2

### Demographic Windows/Challenges

Country	Median Age, 2010	Median Age, 2030	Demographic Window of Opportunity
Brazil	29.1	37.4	2000 to 2030
India	25.1	31.2	2015 to 2050
China	32.5	42.5	1990 to 2025
Russia	37.9	43.3	1950 to 2015
Iran	27.1	39.5	2005 to 2040
Japan	44.7	51.4	1965 to 1995
Germany	44.3	48.8	before 1950 to 1990
United Kingdom	39.8	41.3	before 1950 to 1980
United States	36.9	39.1	1970 to 2015

图 3

有更多迹象表明，N-11 这些国家在接下来的 40 年里只能和 G7 相追赶（图 4、图 5），而不是与金砖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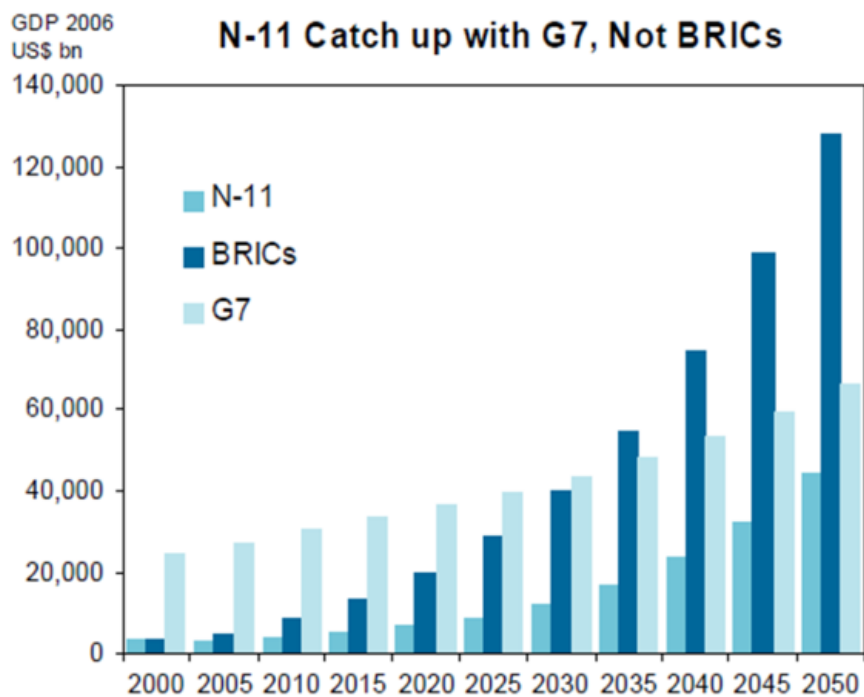


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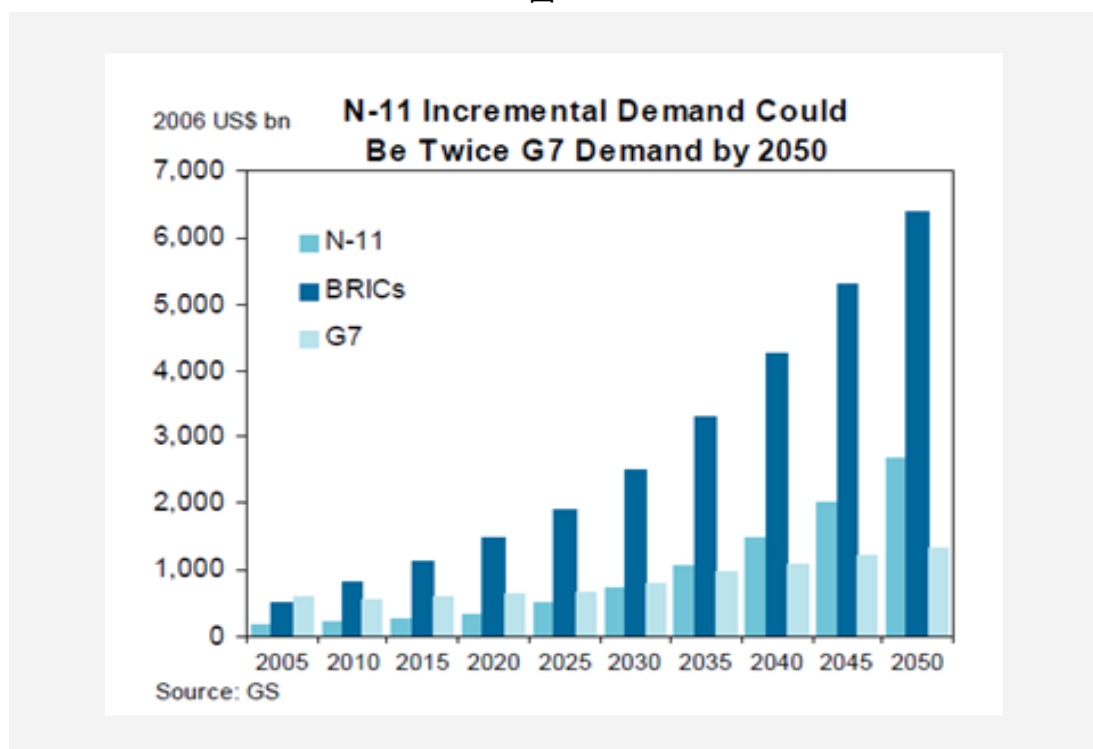


图 5

接下来，再看这一张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图 6），大家可以看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权力转移，他们在 2008 年的时候已经接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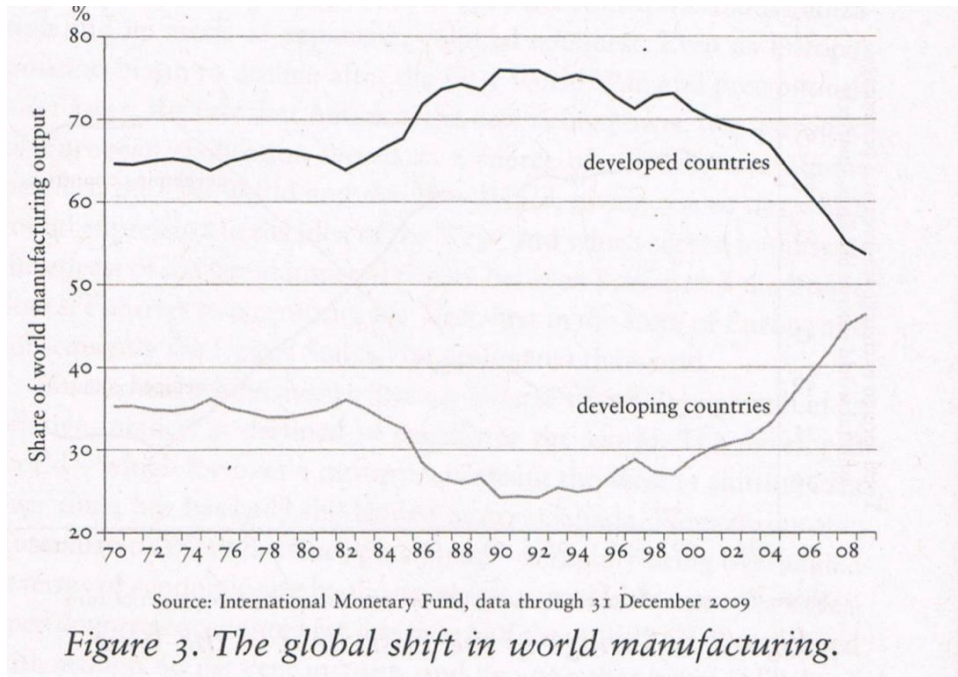


图 6

再来看一下 (图 7) 人均 GDP 翻一番所花费的时间。英国用了 154 年, 从 18 世纪初到 19 世纪中叶; 美国用了 53 年, 从 19 世纪 20 年代到 19 世纪 70 年代; 对于有着人数多了几百倍的中国来说, GDP 翻一番用了 12 年; 印度用了 16 年。中国有着多了百倍的人口, 却只花了 12 年, 而不是 15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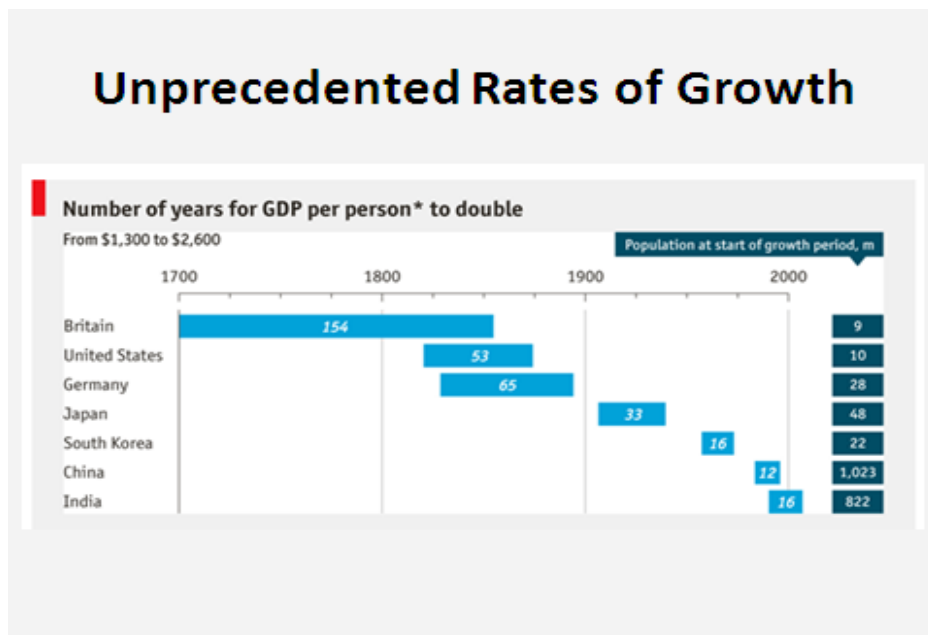


图 7

关于未来增长 (图 8)。中国将会用 8.4 年来再次使得人均 GDP 翻番, 而美国则需要用大约 50 年来翻番它的人均 GDP。所以, 它不只是一个历史上的权力转移, 不是数量, 而是改变的速度迅速增加, 并且不会在短期内停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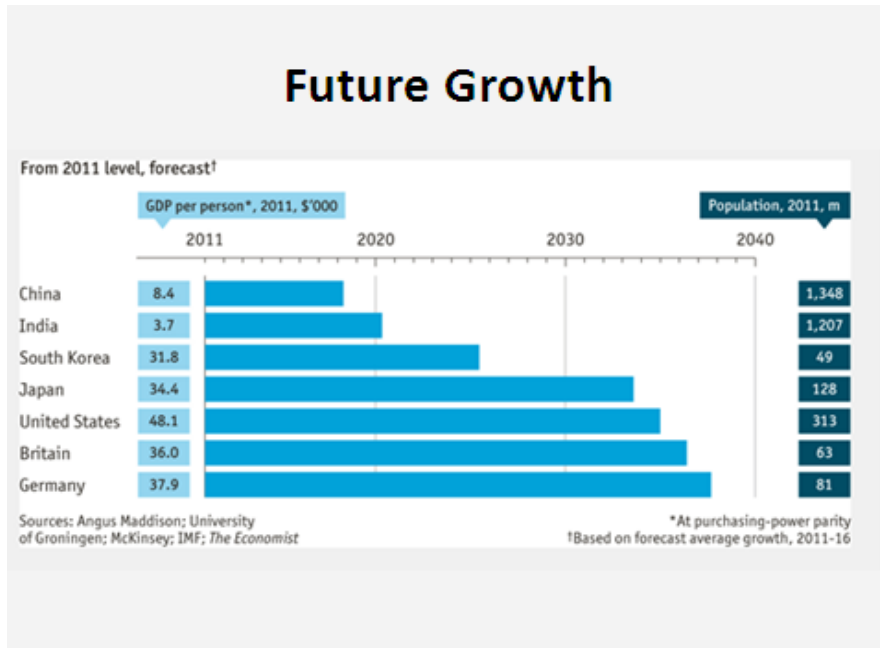


图 8

下面是国家经济预估规模的柱形图（图 9），依据此图表可以推测，到 2050 年，中国可能会成为 GDP 第一的国家。美国是第二，印度第三，巴西第四，墨西哥第五，俄罗斯第六，这是非常显著的变化。

在美国大约有 34% 的人认为中国将会最终超越美国。在欧洲，非常高比例的公众认为美国会被中国取代，甚至是中国公众认为中国会超越美国的比例，都没有法国公众比例高。但是，无论如何，在美国甚至是欧洲，民众都关注中国的崛起。我现在认为西方大多数的人确信中国目前在经济领域也发挥着领导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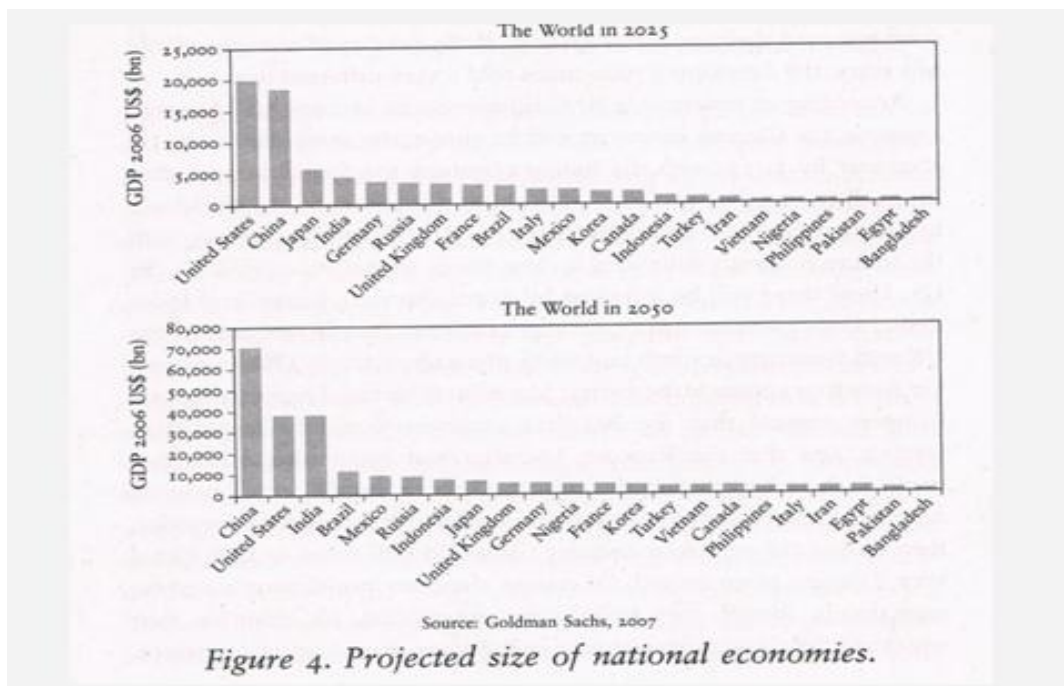


图 9

2009 年 28% 的德国人认为中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领导力量, 到 2011 年时大约 48% 的人赞同此观点。这些数据证明了世界人民相信这种预言是真的, 它正在发生。

综上, 世界正经历着结构上大规模的权力转移, 这个转移是权力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变化。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预测, 到 2030 年, 亚洲在以 GDP、人口规模、军事扩张和经济发展方面为基础的综合国力上, 会超越北美和欧洲的总和。世界银行预测, 到 2025 年, 中国和印度的推动全球发展的动力, 将会是美国和欧元区的两倍。六大新兴经济体将会推动全球一半多的发展量。国际货币体系将不再被单一的货币控制。美国很明显地将会衰落。还有更多的数据显示相似的结果。

所以世界权力结构正在经历一个巨大长久的变化。我认为, 在宏理论中, 过程很重要。体系是由国际结构、部分和单元组成, 它同样也是由各国相互联系而成的。在非常简单的层次, 我们要探求各个单元是如何相互联系的。这似乎有点像动态的过程, 世界的联系是怎样的。权力正在扁平化 (flattening out), 但它也变得更加相互联系 (interconnected)。

在数字化的世界, 有着超过五亿五千五百万的网站、九千多个电视频道遍布世界, 数不清的在线报纸定期更新, 每年有超过 100 万的新书出版, 一亿六千万的博客发表, 一万亿的视频在 youtube 上播放, 并且有极其多的播客、mp3 和视频被下载。爆炸式存的数字信息需要好几万的数据中心用 300 亿瓦的电量, 相当于三十个核电站的产能。

假设我们有一些网络把各个单元连接起来。在这种情况下, 首先出现的是国家, 之后系统变得越来越多元, 不只是国家, 还有国际组织、跨国合作、一些国际团体等很多的行为体。

我在书上说过, 由于世界网络化的变化, 权力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就像伤害猫一样, 如果你想伤害几只猫, 那非常困难; 如果想伤害一群猫, 那根本是不可能的。我们有众多的行为体, 他们都是相互联系的。所以现在的权力含义是相互分离的能力, 权力是给别国造成伤害, 与他们抗衡的能力。这非常像美国的政治, 每个人都有权力, 但却没有能力去做些积极的事。在这相互联系的世界有太多复杂性。太多的弱小行为体也可以猛击到你。因为你是与别国相互联系的, 你将会比过去更加敏感。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损害他人而让他们觉得不舒适, 并不意味着你可以肆无忌惮的做事。权力是防止其他国家去做他们想做的事。

下面我们讨论过程的发展。联系和行为体越多, 那么相互联系就会越多, 更多的行为体将会变得重要。参与的行为体越多, 相互作用就会越多。两个行为体会有一到三个重要的联系, 三个行为体会有一到三个重要联系, 如果有十个、十五个行为体, 那么就会有更多重要的联系。但是事实上, 你有很多的相互联系也证明了有很多重要的行为体。所以这里有一个因果关系在发生作用。

目前的争论存在于 (进攻性) 现实主义的“大国冲突”模型和自由主义的“大国一致 (和谐)”模型之间。

约翰·米尔斯海默是我的一个朋友, 他认为未来将会与过去非常相似。作为一个现实主

义者，他认为未来就像过去一样，是一个回到未来的逻辑。在他的观点看来，正在崛起的中国将会与美国发生战争，这场战争会非常像德国崛起时的样子。现在的多极局势会像以前的多极局势一样发展，国际政治将会渗透着不安全、军备竞赛、国家主义以及争夺稀缺资源的竞争上。所以，基本上，未来就像过去一样，遵照时间的周期会不断循环。

另一个部分就是关于自由的争论，理想主义者认为，时间以极快的速度一直向前，就像一支箭一样，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时间会进步。我们将会到达某个地点，就像历史的终结这个争论一样，我们都会获得自由，未来不会像过去一样，会达到自由主义霸权时代。新兴国家的发展轨道在自由主义理论下会使得世界多极化，所以我们要使新兴国家和现存的体系保持稳定。问题在于如何合作、控制其发展轨道使之处于和谐状态。例如，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关于建立多元的伙伴关系来应对多极化世界的设想。

失序的时代如时间之箭。我的核心论点是，世界会变得更加没有秩序。比如你种了一棵树，你却没有给予它足够的关注，任它自己生长。如果你不在正确的地方做正确的事情，这会使得所有的看起来都非常无序，这便是自然的时间之箭的效果。时间之箭使得事物更加无组织、无序。未来世界没有秩序，世界将会面临功能失调。

我认为米尔斯海默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世界不会像以前那样，不会像一战、二战时那样，战争可能不会爆发。我们很尊重中国的权力，但是我们更尊重核武器，我们试着去避免核战争而不是和中国进行战争，我们会找到应对对方的方法，和平是非常有益的。国家几乎不再为争夺领土而发动战争，没有人会因为占领别人的领土变得富有，我想最近的一次可以把领土变为财富的是美国对墨西哥领土的占领吧。领土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你可能很需要资源，但它是有限的。

和平有很多种形式。但是现有对世界进行预测的观点是错误的。

自由主义认为，未来世界是有序的，并且也能够自发处理无序的状态，因此能够保持和平状态（如冷战中的“冷和平”）。但是，他们错了，因为世界不会永远处于和平与和谐之中，并且不会有不变的秩序。秩序是什么？历史上国际社会的秩序就是霸权战争带来的秩序，胜利的一方带上皇冠，失败的一方接受统治。总体而言，在无政府的状态下，世界各国处于战争之中，只有最后得到霸权地位的国家才有实力在世界范围内强加秩序。但是，尽管国际社会权力在不断更替，但是国家内部如政治结构、制度等都会坚韧不摧，而这就导致了一个“断裂”，或者说是实权的掌握者与对世界秩序存在话语权的威望拥有者之间的鸿沟。在这种矛盾下，世界不会是永无战争，也不会永远和平，这不是像米尔斯海默所代表的现实主义所概括的地狱，也不是伊肯伯里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所夸大的天堂，这是实权与威望的博弈。而这，便是一种类似于混沌的无序状态。

世界秩序处于永远变化之中，越来越多的制度被创造，但最后都鲜能发挥作用。于是，人们开始摒弃所谓的秩序，当人们不遵守秩序，就不会掌握秩序，所以容易造成秩序的缺失，而这正是我用“熵”来形容国际秩序的意义所在。正如我在书中所言，这种“熵”一般的国

际秩序是一种黏着的状态，甚至可以说是混乱状态。

就国际秩序的“熵”而言，主要体现为两种形式，即过程上与结构中的熵。就一个动态的过程而言，一个封闭的国家系统是最没有全球秩序可言的。因为其中没有可产生效力的富余能量存在，即在封闭的系统之中，系统结构中的各个成分趋同，每个单元的效力都在被利用，难以同外界存在任何交流，所以难以被世界秩序所影响，反作用于国际则是一种秩序缺失。这种封闭的过程就像是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描述的一样，难以交流与互动。就结构而言，当结构中的单元以相同的方式扩散，那么它们之间便很难组成一个有机的综合体，因为它们之间不需要互动，而所谓的“能量”也就不会产生。然而，在国际秩序中，国际社会网络的形成与运作对国际秩序的形成至关重要。因为即便你拥有大量的信息，你也缺乏交流与互动的路径，而这必定会使所谓的国际秩序濒临崩塌。

这本书十分有意义广泛，内容非常丰富，但是我的语言却很贫乏，很难解释。我给你的解释可能也很难理解，或许你可以尝试去读一下书。

让我们谈论一下结构问题，我认为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无序。我认为世界的结构正在逐渐的“熵化”。

因为在我看来，国际体系可以改变一些事情，这正是我们所谈论的。它到底做了什么？它约束行为体，这意味着国际体系可以对某些行为体施加影响，并且能够让确定的行为获得相关收益，这是约束的意义。当然，体系不能强迫你做任何事，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但是如果你做了，你可能受益，如果你不做，你可能会损失。在现在的体系中并没有这种约束能力，这正是我要指出的，为什么体系会“熵化”。

那么现有的单极体系到底有什么用？我能够告诉你在冷战两极格局下体系的作用，我也能够说出以前多极体系的作用，但我不能告诉你现有体系的作用，因为它纵容美国为所欲为。美国在体系中付出很少，却为所欲为，并且有很强的灵活性，但是在这种体系下，美国并不考虑其他国家的自由。在过去，欧洲被两极体系约束，它在一定程度上唯美国马首是瞻，日本同样追随着美国。那么，现在欧盟为什么要追随美国呢？如果要想成为领导者，必须有跟随者。美国是世界最有权力的国家，但是没有追随者，那就不能证明它的强大，你不能让别人做别人不想做的事。单极体系是一个显示权力的典型例子，美国相比冷战时期有了更多的能力，但是力量却比冷战时期要弱，因为它现在少了在冷战时期苏联对资本主义国家威胁的这个砝码。现在的这个体系并没有对国际上的任何行为体作出约束，那这个体系的作用是什么？在单极体系下你无法预测。

下面我们会谈到影响同质化和扁平化影响 (Homogeneity and a Flattening Effect) 以及机能的消耗、衰弱。

我们常常用很多事物来比喻国际层次上国家间行事的规则，在这里，我使用熵的比喻也正要说明国家间并不存在所谓的行事规则。因为从结构层面而言，并不存在一个约束国家行为的更高的行为体，所以国家间并不存在行事的规则。另外，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年代，



而信息与信息之间是平等的，这也恰是在熵中所体现的一个特性。在国际信息的传输中，过程显得尤为重要：信息是怎样实现在单元间的相互交换的，单元对信息的处理是怎样被其他单元所了解的，这都是信息传输的过程所需要回答的。

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在国际政治中，我们经常谈及的两个概念就是结构和过程。新古典现实主义者们主要关注过程，对于结构问题则相对很少提及。而在此，我所要做的就是尽量兼顾结构与过程这两个概念。就国际体系而言，我将其分之为宏观层面(macro level)和微观(micro level)层面两个层次。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都对应着结构与过程两个方面。比如说，在过程层面，微观层次所要解释的是个体决策是如何受到信息传输的影响的；而宏观层次所要解释的则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共同政策是如何受到信息传输的影响的。由于这些内容在书中有很详细的说明，我在此也就不做过多的解释。

我首先将从微观层次说起，即国际信息的传输是如何影响个体决策的。就结构层面而言，现实的实质性与网络空间的匿名性无疑会导致个体对规范以及道德准则的背离。在这里，我应当提醒大家的是，这些现象都不仅仅限于国际关系之中。在日常生活中，现实的实质性使人们在都了解对方主要信息的情况下进行交流，而网络空间的匿名性则与之相反。就国际关系领域而言，作为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国际关系的行为体们都希望能够保证信息的确切性，这样才能做出好的决策。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每一个行为体都希望能够获取确凿的信息，而不是那种模棱两可的只言片语。只有这样，行为体所做出的决策才能够有明确的过程和对象。但是，很多情况下，事实并不如此。正如我的导师罗伯特·杰维斯对情报机关的分析一样，美国的政策决策者们都希望能够有好的情报机关，但是他们往往不能如愿。因为情报机关所提供的很多信息与政策制定者的既定目标往往相左。比如，对于伊拉克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迪克·切尼一再声称确认伊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即便他们也没得到可靠的消息。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切尼一类的政策制定者希望攻打伊拉克，因此即使对消息具有不确定性，美国最后还是对伊开战了。就此而言，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政策制定者们也能在信息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决策了。

就过程而言，我们需要提及的就是数字革命。不得不说，数字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世界。在过去，我们认为心愿总是主宰着大脑，而大脑则只背着人们的行动。这似乎就是人的行为的最根本来源。但是，数字革命给我们的启示是，人们的心愿是可以被塑造出来的。一个人的心愿被塑造成什么样，这与其所处的周边环境紧密相关。并且，这一种塑造的过程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而这就使得信息的传输也变得复杂多样。比如，我们要将一条信息由 A 传送到 B，那么这一个传送链不会只是简单的 A 到 B，而有可能是 A 到 Z 到 G 到 C 再到 B。很明显，这是一个显得很愚蠢的过程，但它却是现实世界中信息传输的真实现象。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只有那些最为聒噪和喧闹的信息才能被大家所重视，这也是为什么国际关系中极化现象会出现的原因。在国际关系中，只有那些得到强大国家支撑的信息才能表现得“聒噪”和“喧闹”，因此，这些信息也最常被听见。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见，

在国际关系中,美国总是拥有最多的话语权。

我们当前正生活在一个事后(post-fact)的世界,很多事情只有在它被完成之后我们才得以知道,而完成它的人则是掌握了比所有人都多的信息。因为数字革命的影响,这些信息会以更快的速度传播到世界各地,而人们则会因为对这些信息产生的不同的偏好而产生一些意见的联合。这些意见的联合可以根据所得到的信息来“自创”出事实,尽管这些“事实”很可能与现实情况相去甚远。

在宏观层次的结构层面上,我使用了“随机”一词对国际关系行为体的行为进行描述。这是因为,在现实中,行为体的行为往往难以被预测。此外,对于全球力量(global power)而言,它正处于一个流散和失效的状态,而这正是熵的特性所在。在这一种大环境下,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行为体所带来的更多会是负能量,它们对国际体系的破坏、对抗,对现有秩序的扰乱要远远多于创造和合作。对很多人而言,国际组织也许是匡正国家行为的有效机制,但由于全球力量的流散,国际组织的作用将大大降低。当一个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利益因一些规则受挫时,它们便会加入另一些组织,甚至自己创建一个组织。这一过程就像是在购物一样,你只是在寻找适合自己尺寸和颜色的衣服罢了。就这种行为而言,我不知道中国如何,但美国确实常常如此。

我们现在常常提全球治理,但是很明显的是,我们还没有弄明白全球治理到底是什么。很多人在此中论述国家权力、国家责任,但是却没有提及全球权力、全球责任,这是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国际关系仍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中,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全球政府,而霸权也并没有在 9.11 后销声匿迹。所以,就我而言,全球治理只是某一种程度上的全球治理,并不是真正的全球治理。

在宏观层次的过程层面上,全球化正使得国家间在选择朋友或是敌人时一步步超越地域和边界的限制。在我的书中,有专门的一部分来论述为什么国家在选择朋友或敌人时变得更为自由。确实如此,在现实世界中,地理再也不如它曾经一般重要,他只是圈定了一个国家实施内政的范围而已。在当前,中国也正在全球范围内选择自己的伙伴,比如欧洲的罗马尼亚、非洲的南非、南美的巴西等等。正因为如此,联盟成为了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但与以往不同,当今的联盟已经不再受到地域的桎梏。我曾经读过一本很老的书,其中对政治的定义便是“政治是一门选择朋友和敌人的艺术”。而这,也是我认为的政治的真意所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资源才会得到有效的分配。在这样一种过程中,我们应当认识到,地理在政治中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国际体系也应当变得更为灵活和不可控。

全球文化必将同质,我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个现象,它非常类似熵的概念,它的奇怪之处在于,你会觉得混乱会导致大量的不同,但它并没有,它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同质。

非军事战争方式的问题,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但我不在这讨论这个。我仍然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因为我仍然相信竞争,我仍然相信这个世界还不是有秩序的,我不相信全球治理,我不相信和谐,我相信稀缺的资源,我相信我们都仍要争夺、竞争地位、威望与最重要的影

影响力。不仅我们，每个人都想要影响力，我不关心安全，但即使我们有安全，我们还是争执不已，因为我们想要拥有影响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米尔斯海默是错误的。如果你读米尔斯海默的作品，他说他是一个进攻现实主义者，但他不是，他说他认为大家都追逐权力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是安全的，除非我们已经征服了整个世界，但我不这么认为。

我的想法是，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安全，但我们仍然竞争，因为我们希冀财富。

这有什么意义？对于当今世界有什么意义？国家实际上在忙于什么？国际本应使其国民富足，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它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国家，国家是由其人民创造的，为人民利益服务，对不对？如果他们沒有让人民富有，他们就不合格；如果他们没有得到更大的影响力，他们就不能做得更好。

为什么美国要成为一个大国？因为我们想要最大的影响力。为什么我们不希望日本成为世界第一？不是因为我们反感日本，而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会像我们一样，他们会为日本人思考，而不是美国人，他们只会考虑他们自己的利益，就像如果你们（中国）成为第一的大国，你们只会关注自己的利益，毫不在乎我们的利益。一个好的制度是使大家高兴，但一定会让自己更加高兴。

工业革命和核革命对于改变以往的权力方式作用巨大，事实证明一切都颠倒了，但数字革命的影响更为巨大。我们的世界变得全球化、数字化，信息无处不在。

今天最重要的是创造一个环境，通过拥有核武器来获得安全，这不错，但是这不是你真正想要的安全。如果你需要开发、创新技术，你需要能够创建一个环境，创建机构、大学，那里的人正在学习最前沿的、新的东西。你需要的是知识和信息，并且最好善于此道，因为这将决定你的未来，而非武力和领土，故而，作为现实主义者，必须直面数字革命。但这并不是说现实主义错了。现实主义是对的，世界充斥着竞争，无非是对稀缺资源的争夺。

讨论熵的原因包括打破霸权战争的循环、去殖民化、单极世界的现实、权力的分散与多极中心以及数字革命或者全球化的挑战。作为演讲一部分，我将介绍在熵时代中一些崛起的力量。他们可以是搅局者，是支持者，是逃避责任者。

中国既被人称为逃避者，又被称为激进而强势的搅局者。我们希望中国是支持者。中国也一直认为如此，还谈论 G2 之类的话题。现实是，连中国自己也还不清楚自己的定位。它时而强势，时而又逃避——有时在全球事务上确实如此。“这是你们的秩序，不是我中国的秩序，你在运行这一机制，还不停的说，‘你还没承担足够的成本’，‘你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因为这是你们的秩序啊，如果你想要我们来运行，我们可以做到。”当然，还不行，因为中国还没有准备好。“历史上，中国曾是一个超级大国，中国经济很快将跃升第一，你们最好认真的对待我。”同时，中国又说自己“还是发展中国家，虽然总量有可能成为第一，但人均不过百名开外”云云。

但重点是，中国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崛起中的大国，他的身份也与他所传播的信息熵一致，

但是不同的受众会有不同的理解。当谈论南南关系的时候，中国是一个支持者，当谈论周边关系的时候，中国是一个搅局者。现在，当谈论全球国际关系的时候，中国是一个崛起国，这个崛起国并不与我们为伍，我们有自己的发展问题。

我现在所说的世界是很真实的，它已经不同于现实主义者眼中的世界。

我不认为国家会受到外部环境的激化，反而，国家的发展主要受制于内部环境的刺激。我们过去常常谈论德意志帝国要扩张到太阳升起的地方，也包括日本。但是我认为，中国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当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很多崛起国并没有声称他们要获得国际威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明白，威望是与付出相联系的。一个国家要获得足够的威望，就必须对国际社会有足够的付出。中国也是如此。英国和美国也都是如此。二战之后，美国想重塑全球秩序，而英法两国比较担心德国的再武装，英法两国也不只是在西半球发挥影响，他们也为重塑国际秩序做出了贡献，因此可以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

这是一种博弈，你们应该对博弈都比较熟悉了，比如囚徒困境。这种博弈是非常有趣的，它反映了当前国际社会的现实，我想说的是，这种博弈模型是否具有有效性。这听起来像是笑话，但是它确实可以反映现实。在 1930 年代，最大的游戏者是美国的垄断者，几乎所有人都很穷困，但是企业垄断者可以让你参与游戏，这反映了当时的现实。

冷战期间，最大的博弈是危机。在 1950 年代，美国仿佛是红色恐惧者，他担心并遏制全球任何地方的红色势力，所以冷战期间最大的博弈就是危机。在 1960 年代，很多人都在猜想最大的博弈是什么，是在美国吗？最大的博弈是美国的爱与性的解放。在 1980 年代，最大的博弈便是追根究底，在这个过程中，信息成为最重要的媒介。谁可以获得信息，谁就是博弈的成功者。在冷战结束之前，信息真正成为最重要的资源。那什么是冷战结束之后，直到当前最重要的游戏呢？是俄罗斯方块，这是苏联人发明的。

在电脑实验室，一种新的游戏产生了，类似日本的任天堂游戏机上的游戏。什么是麦克斯韦妖，我必须告诉你们，麦克斯韦妖是一种排序和分类。一种超人类的工具被创造出来。

世界上很多人，都在试图解释这种概念，但是英国的麦克斯韦（Maxwell）第一次解释了信息熵。你是怎么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改变一种信息熵的呢，并且使之可逆？如果你可以拥有一种能力，将一种冷分子和一种热分子共存于一体，那么信息熵将不会改变。所以在没有外部能量的前提下，这种实验是不会成功的。现在，在美国，是谁在进行这样的研究呢，是大数据。大数据将这一切变为可能。

现在，让我们重回博弈游戏。俄罗斯方块，什么是俄罗斯方块呢？俄罗斯方块的敌人并非什么恶人，而是一种不断地面对的压力，给你不断地制造障碍。

我们都是麦克斯韦妖。我们知道，世界正在不断地过滤信息，这是很有趣的，换句话说，它可以反映出我们是谁。

[整理：陈一一、李家胜、马焱粮、裴瑶、赵姝婧]

[责任编辑：赵姝婧]

[校对编辑：董柞壮]

## 威权主义心理视角下的中日关系分析

季乃礼\*

中日关系不仅关系到东北亚国际安全,更关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很多学者对中日关系也已有颇多论述,在此,鉴于个人的研究兴趣,笔者将主要从威权主义心理视角分析当前中日关系的互动模式。本文将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分析:何谓威权主义人格?日本人是否具有威权主义人格?如何从威权主义的视角看待日本的一些外交行为,尤其是对中国的外交行为?

### 一、威权主义的解释

霍克海默对威权主义类型的人做出了解释:“区别于旧有的顽固类型,他看来集合了以高度工业化社会的非理性和反理性的信念为特征的观念和技能。他是被启蒙过的,同时又是迷信的;为自己成为一个个人主义者而自豪;却又害怕与他人有所不同;自负于自己的独立性,却又倾向于盲目地屈从于权力和权威。”从霍克海默的解释中可以看出,威权主义心理具有以下特征:其一,启蒙之后自愿接受专制。其二,因袭的特性,即对传统价值或社会主流价值的继承;其三,威权主义式的攻击;其四,威权主义式的服从。

### 二、日本的威权主义心理

早期威权主义心理研究的对象是德国法西斯及其群众,测量威权主义人格的量表被称为法西斯量表。有关威权主义心理有左右之争,但基本认为威权主义心理的人存在于右派,具体来说应该是极右派。日本人文化主流是否是威权主义心理呢?西方社会经历过一个工业化的阶段,经历了自由、民主思想的启蒙之后,自愿放弃自由、民主而接受专制。日本并没有经历一个自由、民主的阶段,日本的现代化过程中在经济上吸收西方的较多,但在政治上则较保留了传统的文化。即他们在西方政治文化的冲击下,并没有放弃自己传统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保留很多的专制成份。日本的政治文化基本是儒家文化与日本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儒家的政治文化中本身就有极浓的王权主义成份,落地日本后,日本的政治文化中除了强调孝之外,更突出了忠的成份,在家庭中强调对父母的尊敬,对先祖的崇拜。而在政治领域强调对上司,对天皇的忠诚。即使在经济领域,每个员工强调对公司的忠诚。中根千权在其著作《纵社会的人类关系——单一社会的理论》把日本的社会称为纵向社会,个人的上下级关系在整个社会成为了主要的关系,不允许自下方发出对上司、长官、前辈的异议。<sup>①</sup>

日本专制文化并没有因明治维新变化而有所变化。在日本天皇仍然有绝对的权力,日本政治系统中等级森严。二战前,主导日本政治格局的日本陆军军人在战前的主流思想分为皇道派和统制派。二者的基本思想基本一致,要求改革为军国体制,奉行法西斯主义和威权主

\* 作者简介:季乃礼,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教授,研究方向是中外政治学说和政治心理。

① デヴィッド・ピーター,『機長の真実』,講談社,2002年,228頁。

义，但是无论哪一方都无比遵从皇权。两者的区别是皇道派者多出身于市民和农村，他们把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归于日本的官僚门阀制度，而统制派则来自于社会上层，世代为官的官僚，他们把问题归于文官政治。最终统制派占据了主导地位。<sup>①</sup>二战之后，麦克阿瑟对日本的政治体制进行了改革，废除了天皇的绝对权力，使之变为虚位的元首。但是统制派却并没有在这次改革中受到冲击，他们在民主选举中获得了新生。

二战之后，日本实行民主选举。但是民主制度的实施并未改变日本的威权主义文化传统。从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来看，民主的发展与专制的文化是冲突的。因为选票掌握在选民的手中，他们把票投给符合自己利益的候选人，而不是某个贵族、或某个家族。民主制度下，很少出现子孙世代为官者。理论上讲，每个人，即使出身平庸，也可凭借自己的政治主张赢得选民的支持，从而登上权力的宝座。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一些领导人皆没有显赫的家世，同样可以竞选国家的领导。但在日本民主制度的推行，并没有冲击日本的专制文化。与西方选民对某个政党的认同不同，日本选民往往对某个家族忠诚，他们投票不是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而是基于哪个家族。这受日本自古以来惣掟制的影响，惣掟制是庄园法制度，日本古代的主要社会形态，低层的民众，尤其是农民依附于庄园主，这些庄园主多是武士、贵族，农民向他们效忠，他们则向农民提供保护。选举制下，选民把选举投给某个家族，换取这些家族对他们的经济和社会的保护。

因此，在西方国家中，如果想参与领导人及议员的竞选，必须加入某个政党。而在日本，尽管政党的属性在竞选中也是重要的，但是首先必须是代表某个家族，否则很难获胜。自民党和民主党尽管曾经实现了政党轮替，但是两个党所产生出来的首相均具有一共性：家族显赫，这不仅体现在二战以后，而且在二战以前。换言之，二战中日本的战败并没有对日本的家族政治伤筋动骨，相反这些家族的子孙依然掌握权力，他们依然通过民主制度，通过选民的支持长期执政。

由此我们看出如下的关系，二战之后，日本政治制度的改变，并没有改变人们的心理。日本人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仍然具有威权主义的心理。他们长久支持某个家族，战前如此，战后亦然。不管该家族在政治的舞台上从事的对外的侵略战争，还是战后对内的经济改革，他们的支持依旧。而对于出身于这些家族的政治精英来说，为了赢得选民的支持，他们必须刻意突出自己的家族身份，他们要对自己的先辈表达应有的尊敬，体现在政策上就是不敢否认自己的先辈，即使他们的先辈是战争的罪犯，因为他们的权力来源于此。可以说，先辈的极右翼倾向以及选民的威权主义心理，迫使他们的意识形态是极右的。自民党和民主党尽管存在党派的差异，但是他们都往右走。只是不同的是，民主党的领导可能有被迫的成份，而现在的自民党则主动的成份多些。

<sup>①</sup> 相关论述见伊藤正德，《军阀兴亡史》第二卷，文艺春秋新社，1958；Buruma, Ian (2004). *Inventing Japan, 1854-1964*. Modern Library.



### 三、威权主义心理与日中关系

日本的威权主义心理与外交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威权主义的重要心理特征是对下专制对上屈从。具体到国家内部来说，威权主义国家的民众处在政治系统中，对上为奴仆，但对下是主人。具体到国家来说，威权主义国家面对比自己强势的国家表现出屈从的一面，但面对比自己弱小的民主表现出攻击的一面。具体来说，对其没有较大利害冲突，地缘较远的国家，譬如欧洲诸国，日本能够表现出平等外交的一面。但对地缘相近，有较大利害冲突的国家，日本要么表现出屈从的一面，要么表现出攻击的一面，面对美国表现出屈从的一面，但面对中国则表现出攻击的一面。

二战中，日本在与诸国的战争中，受到美国的打击最大。它的精锐主力皆是在与美国军队的交战中损失的，占领的土地也相继被美国收复，更为痛心的是在两颗原子弹在日本的爆炸使其损失了几十民众。按照道理讲，日本人最为痛恨的是美国人。但是二战之后，日本却把美国看作最可靠的盟友，日美关系最为密切。其原因就在于二战中日本人彻底被美国的军队所打服，二战后无论在军事上还是经济上要依赖美国才能生存和发展，因此日本把美国看作是自己的主人，对美国表现出屈从的一面。

日本与各国的关系中，与俄罗斯、韩国和中国的关系最为紧张。日本曾经在日俄战争中战胜过俄罗斯，但在二战前的诺尔坎战役中被当时的苏联所战败，1945 年，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被苏联击败。但是在日本人看来，诺尔坎战役日本并没有派出主力，关东军的失败则是在日本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军心涣散的结果。换言之，日本人从未认为自己被俄国人击败过。二战后的经济强势，以及美国的支持使其有了与俄国人斗争的资本，因此在领土争端中表现得很强硬。

对韩国也是如此，韩国曾经是被自己奴役的国家，日本的战败中韩国基本不起作用。因此在领土之争中也表现得相当强硬。

对中国也是如此，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被战败，在抗日战争中遭受重撞，尽管在中国战争上抵御了日本大部分的主力，但是日本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被中国击败。二战之后，中日经济发展中形成的巨大的差距，使中国曾经依赖日本的经济援助。即使现在的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但是日本人至今也不认为中国的经济具有优势。即他们对中国军事和经济势力的增长，从来没有从心底里佩服过。因此，他们在钓鱼岛的争端中表现出强势的一面。

日本与他国的交往中，体现的是一种二元的思维方式，要么你是老大，要么你承认我是老大，很少出现平等的兄弟关系，即中国所倡导的无论国家大小，一律平等相处。纵观日本与诸国之间的关系，承认美国老大的地位，因此与美国的关系很和谐；东南亚诸国，承认日本的老大地位，因此他们与日本的关系也没有矛盾。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必须在经济上和军事上保持强势地位，换言之发展好我们国家的实力，让日本人彻底服气，让日本在胡作非为时有所忌惮，也是中日关系真正改善之时。

[责任编辑：李安琪]

[校对编辑：李家胜]

## 杰克·斯奈德

**【编者按】**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没有多少人不知道杰克·斯奈德。这是一位研究兴趣极为广泛且成就非凡的学者，他的研究范围横跨国际关系理论、民主化与战争、民族主义、俄罗斯（苏联）对外关系、国际安全与战略、大国过度扩张等多个领域。他首次提出了“战略文化”的概念，并对现实主义做出了“进攻性”与“防御性”的划分。本文选取了斯奈德在“国家安全与战略研究”、“国际关系理论”、“民主化、民族主义与战争”三个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为大家做简要介绍。

### 学者简介

杰克·斯奈德 (Jack Snyder)，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索尔兹曼战争与和平研究所 (Saltzman Institute of War and Peace Studies) 贝尔福国际关系讲座教授 (Robert and René Belfer Professor)，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诺顿 (W. W. Norton) 出版社“世界政治丛书”主编，《美国政治学评论》、《国际安全》和《安全研究》杂志编委。

斯奈德于 1973 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政府系，获学士学位。1978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1981 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获政治学博士学位。此后于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任教至今。

1973 年，斯奈德从哈佛大学本科毕业后，在美国国会担任了议员助手，并从事国会研究工作。1976—1978 年，任职于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社会科学部，研究苏联军事问题，期间首次提出“战略文化”一词，开创了国家安全与战略研究的新视角。在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任教期间，他为多个国际关系杂志担任编委，并发表了大量论文和专著，其中《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一书是他在国际关系理论和大国过度扩张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冷战后，他的研究兴趣转向民主化、民族主义与战争的研究方面。2012 年，斯奈德获得由国际研究协会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颁发的国际安全研究杰出学者奖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Distinguished Scholar Award)。

斯奈德的主要著作有：《进攻意识形态：军事决策与 1914 年的灾难》(*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Disasters of 1914*,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Korean edition, 1996. Chinese edition, 2007)，《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与民族主义冲突》(*From Voting to Violence: Democratization and Nationalist Conflict*, W. W. Norton, 2000. Indonesian edition, 2003)，《选举战争：为什么新兴民主国家会走向战争》(*Electing to Fight: Why Emerging Democracies Go to War*, Co-authored with Edward Mansfield, Cambridge: MIT Press, 2005)。



## 一、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

### （一）“战略文化”概念的提出

当斯奈德在兰德公司工作期间，他曾经发表过三篇关于苏联对外战略的研究报告，其中在1977年发表的《苏联的战略文化——对有限核战争的含义》一文影响最大。这篇文章首次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提出了“战略文化”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国家战略决策者通过传授或模仿而获取并彼此分享的关于核战略的观念、情感上的条件反射和习惯性行为模式的总和”。在斯奈德看来，苏联与美国的战略文化有着很大的不同：美国的对外战略是像兰德公司这样的智库提出的，这些专家在分析核战略时会更多地按照博弈论的思维进行考虑，即把核战争看成是一场大国之间为扩大自身影响力而进行的政治竞赛，并由此提出了有限核战争的观点。而苏联的战略思维则是在一种不同的思想和组织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制定苏联对外战略的人并不是智库中的专家们，而是军队的高层领导。在这些军人看来，核战争与之前的各种战争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一种大规模的、以赢得战争为目标的进攻”，因此他们不可能理解美国的有限核战争观点。不同的战略文化，决定了两国不同的对外战略。

1984年，斯奈德在他的《进攻意识形态：军事决策与1914年的灾难》一书中对战略文化进行了更深的解读。在这本书中，斯奈德提出了战略文化的三个衡量变量，即战略上的理性计算（rational calculation）、军事组织本身所具有的动机偏见（motivated bias）以及认知和组织方面的简化偏见（simplification bias）。从这三个变量的视角出发，斯奈德对一战前夕法国、德国和俄国的战略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和考察：一战初期，三国都认为防御会比进攻对自己更加有利，但却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进攻，而具体行动却又有所不同，这其实是三个国家不同战略文化作用的结果。

### （二）正确理解“战略文化”

虽然“战略文化”最初是斯奈德为研究苏联对外战略而提出的，但后来这个概念却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借用，甚至有着被滥用的趋势。一些学者没有正确理解“战略文化”的含义，把一国的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也作为战略文化的考虑范畴，从而导致了过于简单化的理解，对此，斯奈德本人提出了坚决反对。在斯奈德看来，考察一个国家的战略文化，首先应明确这个国家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战略环境之下，它自身的实力如何，地缘环境怎样；其次要考虑该国制定对外战略的人是谁，他们的职业偏见和组织利益都是什么；最后还要知道战略环境和制定军事学说的组织环境是怎样结合起来的。由此可见，斯奈德的“战略文化”考察的是不同国家在各自的战略制定过程中，可以对最终战略制定结果造成影响的不同因素，其着眼点是现实的战略制定过程，而不是该国的历史文化。后来的斯奈德竭力要拉开自己与所谓战略文化研究的第一代学者的距离，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 二、国际关系理论

### (一) 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

斯奈德认为,将现实主义划分为进攻性和防御性两种类型是很有必要的,但有些现实主义者夸大了这两种思想流派之间的区别。在斯奈德看来,这二者是可以统一的,即无政府状态本身必然导致国家为了自卫而不得不具有进攻性,而“均势”又促使国家在采取自卫措施时会表现得相当谨慎。斯奈德在《帝国的迷思》一书中指出,扩张主义在强大的国家中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强国剥削和征服弱国,因为这样做常常会带来收益。

斯奈德指出,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甚至沃尔兹(Waltz)这样的学者,没有对无政府状态促使国家采取审慎的防御性行为这一点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斯奈德看来,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的思考和防御性现实主义有很多重合之处,他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分析胜过他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言辞,这也印证了米尔斯海默一直反对小布什政府期间美国所采取的进攻性行为并非偶然。关于沃尔兹,斯奈德认为他基本上是一位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因为他把均势描述成是无政府状态的后果。但沃尔兹的表述是模糊的,因为他也谈到,是无政府状态本身造就了国家进攻的诱因。如果单从字面上来理解,这更倾向于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

### (二) 折衷的现实主义者

斯奈德评论自己说:“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十足的沃尔兹式的现实主义者,我一直是一个折衷的现实主义者。”他接受现实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的某些假设,包括无政府的逻辑和国家至上的假设。但他一直认为,国家之间的国际无政府逻辑并不是驱动国家行为的唯一因素或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意识形态和国内政治也是极为重要的。所以,尽管斯奈德吸收了像沃尔兹这样的新现实主义者的某些思想,但他却从不认为将这些思想与其他概念结合起来有何不妥。事实上,他追求通过不同且带有折衷性的研究路径来成就逻辑上一致的理论。

### (三) 关于新古典现实主义

斯奈德认为,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可以是新现实主义者也可以是古典现实主义者。使新现实主义者与其他流派的现实主义者区别开来的不是进攻抑或防御,而是这位现实主义者是否试图保持沃尔兹新现实主义理论的演绎逻辑。相反,新古典现实主义者无论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都与沃尔兹的理论拉开了距离: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是以国际无政府结构为论证起点的严密演绎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虽然也关注国际层次上的权力政治,但并没有一个具有严密演绎逻辑的理论框架,它还讨论国内的政治意识形态塑造国际上的权力政治思维的问题。这都是非常不同的思想风格,并且有时候它们会得出不同的实质性结论。但是,由于像均势这样的概念为每一个现实主义者所共有,所以在新现实主义者和新古典现实主义者之间也有一些重合的地方。

斯奈德指出,新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各有自己的优缺点。新现实主义的优点在于,它力图清晰地阐释自己的理论假设,并且其演绎推理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成为推动理论和概念

发展的发动机，并将国际关系研究引向一个论证更为严密的方向。但是，新现实主义理论假设的简约性也导致了它在激发思想方面的局限性，当用这种理论来分析某种特定情况下的对外政策时，它便使现实主义者穿上了一件紧身衣。新古典现实主义者所具有的优势是，他们所面对的概念菜单的选择范围要更广，这些概念以一种更为松散自由的方式被联系在一起，因此也可以根据特定情况的需要将其组合。这种思维框架经常可以产生良好有趣并且具有创造性的结果。斯奈德说：“在我看来，挑选何种研究路径取决于你的研究目的是什么。如果你更想用细节和事件的微妙之处来说明一个具体案例或历史时期，那么新古典现实主义便具有某些优势。而如果你想以一种严密的方式来研究基本的理论问题，那么像新现实主义那样建构起来的理论对你将更有帮助。”

#### （四）未来十年国际关系的研究纲领

斯奈德认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这三种主要范式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基于理论的经验著作方面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现实主义理论虽然遭到了众多的批评，但仍然显示出令人吃惊的灵活性和持久性，在克服障碍与回应批评方面做得相当成功。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即使不是一种居于支配地位的声音，至少也仍将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声音。自由主义被杰克·列维（Jack Levy）称作是国际政治中的唯一规律——民主和平论，未来它仍将是一个重要的研究纲领，不过它已经丧失了某些发展的动力，因为现在它已经完成了所需要的大量基础工作。建构主义认为，现实主义者所强调的权力和自由主义者所关注的利益，最终都是由观念和信念所构建的。在这方面，建构主义的论点是令人信服的，这一点已经被许多现实主义者和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所吸纳。因此，建构主义者在他们所提倡的某些基本观点上已经赢得了胜利。但是，建构主义者们没有像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那样成功提出带有独特和清晰预测的、强有力的、经验性的研究纲领。事实上，建构主义者们已经趋向于与主流的研究路径合流。

尽管三大范式的研究方法仍将延续，但总体而言国际关系领域正在脱离这种基于范式的分析，较为年轻的学者已经厌倦了范式。在他们看来，这些范式都是片面的，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他们对关于哪一个大理论将会解释所有问题这样的争论不怎么感兴趣，而对解决特定问题更感兴趣。如果权力政治思维可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他们就乐于借鉴现实主义。如果创建制度可以有所帮助，他们就乐于借鉴新自由制度主义。有一些研究路径并非基于传统的范式，但却引起许多关注并被认为是成功的，例如关于战争和冲突的“讨价还价学派”，以及运用统计方法来研究冲突等。斯奈德预计：“未来会有更多像这样走中间路线和基于问题的著作问世，而非范式导向的著作。”

### 三、民主化、民族主义与战争

#### （一）关于民主和平论

根据民主和平论者的观点，两个民主国家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因此如果所有国家

都实现民主化,世界就会变得更加和平。然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民主实验结果却令人沮丧:伊朗、巴勒斯坦、伊拉克和黎巴嫩的民主化甚至增加了地区不稳定因素,这一事实对民主和平论提出了挑战。

对此,斯奈德指出,从上述中东国家迈向选举民主政治的最初几步来看,民主化的确倾向于和民族主义、恐怖主义、暴力以及政治不稳定相关联,但这并不能说明民主和平论是错误的。因为鉴于“民主国家”与“战争”定义的严格性,一些所谓的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如 1898 年的美西战争、美国的南北战争、1812 年的英美战争以及印巴的克什米尔争端,都不能算作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而且,历史发展的趋势将会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向严格意义上的民主体制转型。

然而,尽管斯奈德坚信民主和平论的说服力,他所担心的问题却是:当我们从眼前的现实出发,到绝大多数国家都实现了国内民主化并和平共处的过程中,国际政治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 (二) 民主化与战争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民主化的最初阶段一般都与民族主义的兴起相关联,但与此同时,该国陷入战争的可能性也会增加,这一现象在政治制度薄弱的国家中尤为突出。

为此,斯奈德及其合作者对民主化与战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根据战争相关因素数据库(COW dataset)和政体数据库(Polity IV)中所涵盖的从 1816 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统计资料,总结出了以下结论:如果在民主化进程启动时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比较脆弱,那么从威权体制向民主与威权兼有的混合政治体制转型过程中,该国卷入国际战争的可能性是其他国家的 4 倍。他们对 1945 以来的内战数据的研究则显示,正在经历从威权体制向混合政体转型的国家陷入内战的可能性是其他国家的 2 倍。

此外,斯奈德及其合作者还采取了案例研究的手段。他们从一些新近发生的案例中发现,像前南斯拉夫、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布隆迪和东帝汶这些国家,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基本都发生过因民族主义升级而造成的流血冲突事件。

据此,他们得出了如下结论:政治体制薄弱但是政权未发生变更的国家并不会更容易陷入战争;只有当政治转型和政治体制薄弱两个要素相结合的时候,一国才特别容易陷入战争。

斯奈德及其合作者认为,之所以正在经历民主化的国家更容易卷入国际战争或是内战,是因为在多数情况下,威权政体的垮台和不断增长的大众政治参与的需求给了精英们宣扬民族主义的动机和机会,从而导致了国内暴乱或是对外战争。但更糟糕的是,打民族主义牌的人中,往往既有新兴精英,又有想极力挽回其日渐式微政治权力的旧精英,二者间的竞争会使得战争更容易爆发。

## (三) 民主转型的特例

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智利、阿根廷、巴西、韩国等国都曾经是威权体制,但在过去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也都实现了从威权体制向民主政体的转型。这些国家举行多党竞争



选举、建立法治社会，当选者对政府政策也有实质上的控制权，它们在转型的过程中并没有陷入战争的泥潭。

对于这些民主转型的特例，斯奈德及其合作者认为，它们之所以能够实现和平转型，是因为具备一些能够帮助一个国家从专制走向稳固民主体制的优势条件。这些条件包括：

- ①国家相对富有，国民人均收入较高；
- ②在民主化启动初期，国家便具有能够使民主运转起来的稳固的政治制度；
- ③较高的识字率；
- ④不存在隔阂严重的民族关系；
- ⑤国民经济不单纯靠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支撑；
- ⑥确定的边界——即在民主化启动时，对谁有资格参与特定地区的民族自决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

#### （四）民主化理论的政策启示

对于斯奈德的民主化理论，学者托马斯·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提出了如下质疑：

第一，研究对现实政策的启示是什么？

第二，如果没有大众政治运动的压力，威权统治者在多数情况下不会主动去建设民主制度，而举行选举是实现政治精英问责制的一种途径。

第三，即便民主化的尝试因为条件不具备而夭折，情况也没有那么糟糕。尝试和失败对进一步推动民主化大有裨益，因为这一过程为一系列制度，如司法体系、政党、媒体等奠定了基础。这些制度即使在专政时代被摧毁，残留下来的结构仍然可以很容易地在随后的民主化进程中被恢复起来。

对此，斯奈德是这样回应的：

首先，研究对现实政策的启示是：推广普及民主制度应当遵循合理的发展顺序。如果民主化的第一步是强化民主所需要的制度条件，那么民主转型的过程会更加顺利、更加和平。

其次，有些时候，威权统治者确实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建设一些民主制度，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使国家的制度安排更合理、更有效率。他们需要巩固、强化市民社会，建设一支合理、合法且廉洁的官僚队伍，这样才能够为经济增长创造条件。

最后，在一些情况下，失败的民主化尝试会调动起偏执的、反民主的制度和思潮。这不仅将会在短期内导致暴力冲突，还有可能使一些国家走上民主化的迂回之路，其实现民主转型的旅程将会更加漫长而艰辛。

[整理：王 燕、胡阳阳、宁鹏举、董梓壮]

[责任编辑：宁鹏举]

[校对编辑：任 娟]

# 社会科学研究如何提高教学质量 (二) \*

加里·金、玛雅·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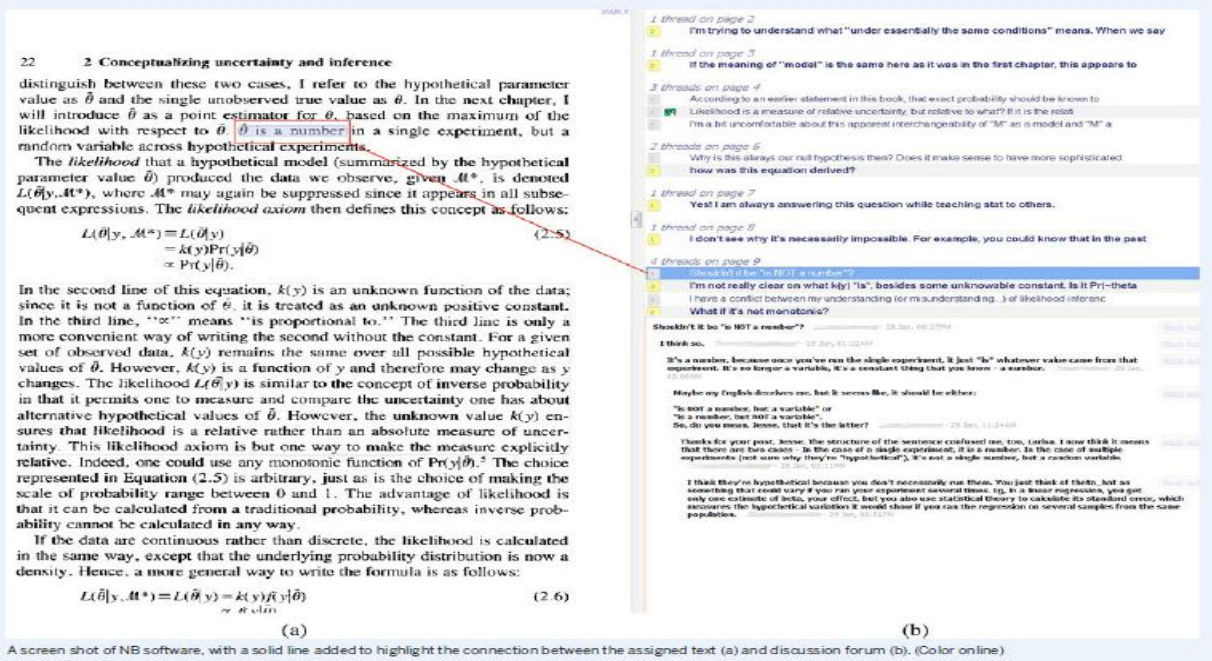
(接上期)

## 让阅读互动起来

假如你被分配到一章阅读任务,但却没有看懂第二页的一个关键点。在传统课堂模式下,你只能指望在办公时间或教学日程安排的讨论会上与助教见面。无论哪种情况都要延误好几天;你如果选择等待,就将被迫暂时搁置阅读并且很可能无法按时完成阅读任务。另一种选择是,你可以假装读懂了这个关键点,并对其做一些模糊的假设,然后跳过它继续阅读。无论哪种选择都违反了社会科学教学的所有三条原则。

与此不同,我们的实践是采用类似制作视频的技术来完成阅读资料。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所有班级的阅读放在一个协作文本注释系统里。我们使用由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实验室(Computer Scienc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boratory at MIT)的教员和研究生发明的在线注释系统——NB 软件<sup>①</sup>(图 2 是 NB 软件修改后的屏幕截图)。NB 系统和其他同类型的系统可以让学生标注出他们不懂的文本中的段落,并且可以在一个单独的文

Figure 2  
Collaborative Text Annotation



本框中提出问题。其他学生、教授或者是助教随后就可以看到这些问题并快速作答——在一

\* 本文原载于《美国政治学会》杂志 2013 年 7 月号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 46, No. 3, 2013, pp. 621-629), 与秋季号相承接。有删减。

\*\* 哈佛大学阿尔伯特·魏斯赫得三世学院教授和定量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主任。他的主页地址 <http://gking.harvard.edu>, 他的邮箱是 [king@harvard.edu](mailto:king@harvard.edu)。

玛雅·森 (Maya Sen), 罗彻斯特大学政治学的助理教授。她的主页地址是 <http://mayasen.org>, 她的邮箱是 [msen@ur.rochester.edu](mailto:msen@ur.rochester.edu)。

① 网址参见 <http://nb.mit.edu>。

个星期的7天、一天的24小时都可以做这种工作。在任何一个晚上,即使课程在下个星期仍然没有安排讨论会,学生仍然可以及时收到对他们所提问题的反馈(在一个Facebook形式的讨论区里)。由于教学相长,这种教学方法不仅惠及了那些提出问题并获得回答的学生,而且惠及了那些回答问题的人。并且,由于社会联系的激励作用,学生会把更多的时间和注意力投入到阅读和课堂中。

### 通过电子邮件列表创建社区

如今,许多大学的课程都有班级邮件列表,教师们借此通知一些教学信息(我们的电子邮件列表是由哈佛大学定量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创建的,但是老师们也可以用许多其他方式快速建立邮件列表或讨论列表,例如通过Google讨论群和Pizza网站的一些服务)。我们则更进一步地,鼓励学生面向整个名单上的人提问,而不仅限于教职人员。我们还让那些知道答案的同学来帮助回答这些问题,这样提高了反馈速度,让一些学生获得了当老师的益处,并且鼓励他们参与社会联系。而且,我们还克服了直到工作时间才能联系或收到教员工回复的问题。为了加强联系,学生们可以分享包含非课程的信息,只要这些信息能够增进班级友情;甚至可以包括工作机会、相关论文、有趣的会议以及班级社交等信息。

此外,最近我们发现班级邮件列表早在十几年前就可以使用了。通过实现邮件列表的可搜索化,我们将这些信息转换成一个可进行搜索的知识库,就像一个独立运作的社区。学生们现在可以获得超过10000种的班级邮件,这些班级邮件覆盖众多领域并且提供数百道关键

Figure 3

### Querying the Class E-mail

#### The Gov2001 Archives

You can get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is log.

likelihood or log likelihood

About 112 results (0.15 seconds)

powered by Google™ Custom Search

[\[gov2001-l\] poisson log-likelihood](#)  
https://lists.gking.harvard.edu/pipermail/gov2001-l/0001908.html  
[gov2001-l] poisson log-likelihood. Jens Hahnmueller [jahnmueller]. Sun Apr 13 15:42:50 EDT 2008.  
Previous message: [gov2001-l] poisson log-likelihood. Next ...

[\[gov2001-l\] seeing the log-likelihood iterations](#)  
https://lists.gking.harvard.edu/pipermail/gov2001-l/0008930.html  
[gov2001-l] seeing the log-likelihood iterations. Miya Woodlak woodlak. Wed Mar 25 18:02:37 EDT 2009.  
Previous message: [gov2001-l] seeing the ...

[\[gov2001-l\] seeing the log-likelihood iterations](#)  
https://lists.gking.harvard.edu/pipermail/gov2001-l/0007390.html  
[gov2001-l] seeing the log-likelihood iterations. Patrick Lam lam. Wed Mar 25 17:49:30 EDT 2009.  
Previous message: [gov2001-l] seeing the log-likelihood ...

[\[gov2001-l\] Assignment 4. Binomial model and log-likelihood](#)  
https://lists.gking.harvard.edu/pipermail/gov2001-l/0006656.html  
Mar 2, 2009 ... Binomial model and log-likelihood. Olofin, Remember to apply the log function to the entire Likelihood function. Your terms not only reduce from ...

(a)

#### [gov2001-l] likelihood vs loglikelihood

Kosuke Imai [imai@fas.harvard.edu](mailto:imai@fas.harvard.edu)  
Wed Mar 5 09:26:56 EST 2003

- Previous message: [\[gov2001-l\] likelihood vs loglikelihood](#)
- Next message: [\[gov2001-l\] likelihood vs loglikelihood](#)
- Messages sorted by: [\[date\]](#) [\[thread\]](#) [\[subject\]](#) [\[author\]](#)

That's right. This is because log is monotone transformations:  
 $\log(x) > \log(y)$  if  $x > y$ .

You should \*always\* take log. This is a rule whenever you are calculating the density function. The logscale is much more stable numerically. Think about the Gamma function, which is equal to  $\Gamma(x+1) = x!$  if  $x$  is an integer. You definitely want to take a log if  $x$  is large.

Another important reason is that the law of large numbers and central limit theorem apply to the loglikelihood function, not to the likelihood function. Do you see how?

Wenkuo

On Wed, 5 Mar 2003, Phillip Y. Lipsy wrote:

- > For 2b, if we use the product term of the negative binomial distribution to
- > estimate the likelihood rather than the loglikelihood, am I right to assume that
- > we should get the same result for the maximum point? i.e. we use loglikelihood
- > instead of likelihood to get rid of the product term, but our results should not
- > change?
- > Thanks,
- > Phillip.

(b)

Class e-mail archives (a) and getting an answer (b). (Color online)

问题的答案(图3展示了一个屏幕截图,其中a图是搜索示例,b图是回答示例)。此外,我们从哈佛大学总顾问(General Counsel)那里获得了许可,不仅可以获得档案馆里的问题和答案,而且还可以知道每一封邮件的作者。这样,档案馆不仅可以给我们即时反馈,还使我们能够深入了解在过去几年中学习这门课程的学生使用过的优质网络资源。这个创新有一

个惊人的激励特性，那就是寻找出和你的问题类似但由前人提出的问题；而此人现在刚好是重点大学里面的终身教授、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或者是一个大公司的领导者。

我们还通过建立和定期发布只有本班毕业生才能看到的 Facebook 群，鼓励形成班级社区的跨时段的特质。我们使通过这种方式交流工作机会、数据问题、方法论建议和其他信息。

## 2.2 在教室里

承上，如果所有的活动都在教室外进行，那么上课的要点是什么？适当地运用 2.1 节的创新性的技术并辅以其它的创新技术，能够改善课堂本身的体验，显著地提高整体学习的信息量。

运用我们创造的课外技术，教师可以准确了解学生最常遇到什么样的麻烦且可运用这些信息使课堂体验变得更有力度。因此，通过运用视频和文本注解，并且让学生查询我们的电子邮件数据库，我们可以持续收集关于学生所讨论的话题的数据，比如他们询问的问题的种类以及他们回答其他问题的方式。在每堂课之前，通过注解的颜色强度，我们自动构建并了解材料的阅读数并安排授课时间。通过额外收集学生们的反馈情况，我们能在上课前把零碎的信息整合起来，了解学生们所指的困惑是什么，通过对直接评估的判读得出学生的真正困惑之处。

我们如何运用这些知识增加学生的学习成果呢？有两种途径。

### 见多识广的讲师

第一，社会科学的学习原则也适用于教师。通过这些技术创新提供给我们的关于学生存在何种困难的即时反馈，这与期末考试相比，将大大提高教学的质量。我们使用这些信息，以便能够把更多的精力集中于让学生产生困惑的材料上去。如果学生已经在之前的讲座中看到过展示，我们会开发出新方法去获取近年的材料。我们在上课期间也会激励学生，在他们存在困难之处或我们存疑之处进行思考。

### 计算机辅助的同行指令（Computer-Assisted Peer Instruction.）

第二，由于学生们在课外已经学到了比课堂更多的内容，而且由于我们的课程能更加有效地针对他们不懂的问题，因此我们在传统的课程展示上将花费更少时间。这是一个实质性的收益，因为课程可能会产生一种人们有共鸣的“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就像在演唱会、体育节目，或者是宗教仪式上一样，并且会增加合作的可能性，促进进一步的参与——课程内容也包括对于授课者、学生的最小化反馈，学生之间最小化的社会联系，以及让学生尽量不要只靠授课来学习。

因此，我们让一部分课堂使用电脑辅助教学（computer assisted peer instruction，简称 CAPI）。这由埃里克·马祖尔发明，并且已经得到广泛使用。

首先，我们使用自动化的系统“学习催化剂”（Learning Catalytics），来帮助我们使用 CAPI，如帮助我们给学生签到。然后我们给他们的设备上发送一个有难度的概念性问题，并给学生们一到两分钟思考，但不允许讨论，随后让他们把答案回复到该设备上。问题可以

是众多种类中的一种，比如多选，画一幅草图，写一个数学表达公式，算一个定向矢量或者是其他。我们构建的问题超出了一周作业中最难的部分，所以在理想情况下，只有大约 20% 的学生能得出正确的答案。

其次，“学习催化剂”自动将学生分成两到五组，让他们准备讨论问题。将学生分组可使对话效果最大化。该系统会不断更新，但是对于预测者来说，我们从学期初就开始收集数据，并且会加入每个学生对刚才提出问题的初始回答、他们对之前的“电脑指导助手”的问答、他们在系统里的经历以及他们之前参加的 CAPI 讨论的成效性。所以，从上百相似的课程中与上千类似的学生那里得到的数据也可以被使用了。

一旦分组，系统将向每个学生的设备传送信息，以告之他们将和哪些学生交谈以及（随机地）选择哪里的座位进行讨论（大部分指导者会费时费力地尝试说服学生坐在前排；作为备选方案，我们可以让学生们在他们走进教室时坐在他们喜欢的地方，但是在进行第一个 CAPI 问题时，我们将自动给每个学生分配我们想让他们坐的座位。这样，对于剩下的 CAPI 问题，我们就减少了困难，并且选择那些不要求学生移动的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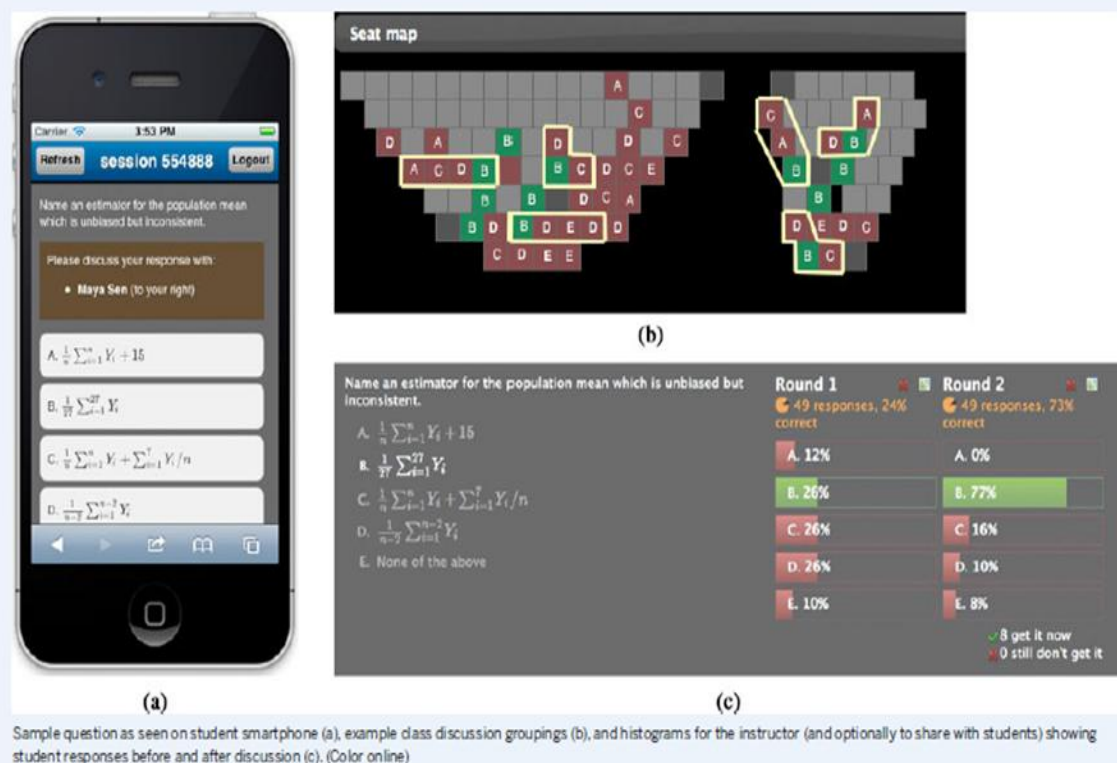
然后，我们让学生们尽量说服他们组的其他成员，使他们认可其答案的真实性。因为社会联系的激励作用，我们经常能够热烈讨论（在学习过程中，我们使用不同的分组以使学生们认识更多的学生，而不是只让他们和最初结识的朋友一起）。我们让随后的讨论继续进行大概两到七分钟——允许时间根据问题的难易程度变化。在这段时间内，教学职员在讨论组中以参与者的身份穿行，或者只是倾听学生们的误解和困难。因为教学相长，让学生们试着说服其他人大大促进了他们对主题的理解。这甚至对那些一开始就给出正确答案的学生也很有用。

对传到学生手机上的多项选择题（图 a）以及他们指导老师的观点（图 c），在第一轮之后，一条私人信息会传到每个学生的手机或者其他设备上，告诉他们谁会和他们讨论问题（见图 a 里手机上的笔记）。一张为指导老师准备的座位表出现在图中右上角的图像中，图中标有与每个答案对应的字母，绿色的代表正确答案（图 b）；分组同时也会显示。指导老师也能看见，并可在讨论前后随意给班级学生看答案分布的柱状图（图 c）。最后，学生有几个选项，分别表示“现在懂了”或是“还是不懂”（参见当前图 c 底部的标数），以便指导老师得到即时反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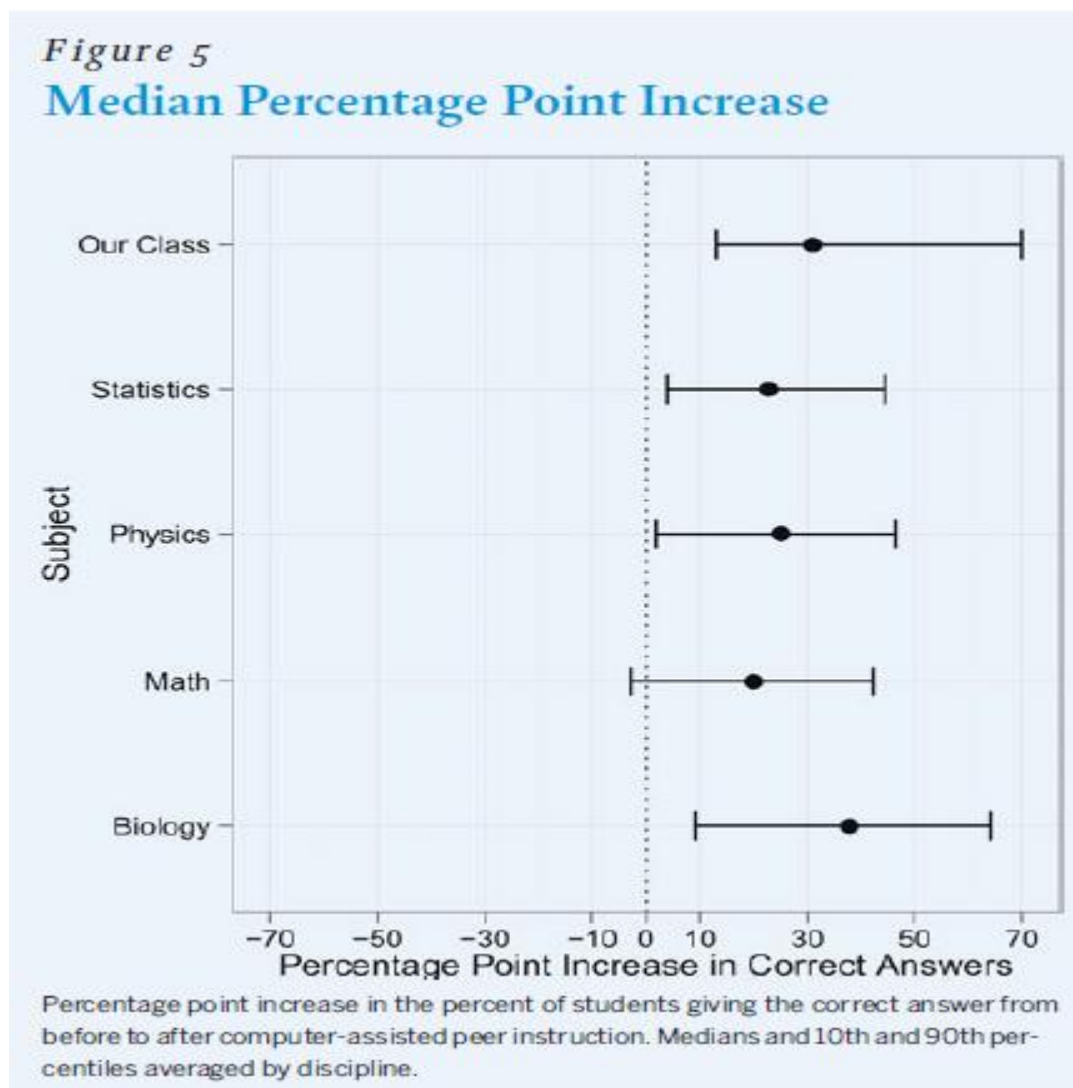
我们将 CAPI 的问题散布在课程的各部分中。为了确保学生在课堂上积极参与,我们通常以 CAPI 相关问题或者其他最难的课程相关的问题开始课程。但是事实上,在电脑的帮助下,使用 CAPI 的人几乎不会实地授课,因此这种行为被称作“远离课堂”。学生也被告知回答这些问题并不会被计入成绩(不包括出勤分)。

Figure 4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 Delivered to a Student's Smartphone



我们上一次以这种技术进行教学时,提出 14 个有可计算的正确答案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平均增长准确地稳定在 31%水平上。我们也通过“学习催化剂”收集全国高校没参加过该课程的各学科教师的课程样本中的数据。这些数据来自 275 种不同的问题在四个学科(统计、物理、数学、生物)19 种课程中的统计结果。每个问题都通过自动分组、同伴教学等途径向课堂里的学生提问。图 5 总结了这些结果与平均增长的百分比。

图 5 可明显看出 CAPI 研究在没有教师干涉的情况下,在课堂上得到的结果是非常相似的。此外,以我们的经验,用 CAPI 方法学习的学生比那些尝试以其他教学方法学习的学生对知识的记忆更加深刻。CAPI 也可以适用于没有明确答案的学科,如哲学。这种做法鼓励学生锻炼他们的辩论能力,不同之处在于我们不能期待学生必须给出确切的有方向性的答案,但是似乎在帮助学生锻炼辩论技巧和深刻理解手边文献上有很大的作用。



### 2.3 超越教室

在近几年里,社会科学家让学术界以外的人们了解了大量的观察实证数据收集分析的价值。毕竟,这种定量社会科学已经重新建设了现有企业与新工业,使得人类的表达能力有了巨大的提高,在重塑医学、社会网络、政治阵营、公共健康、法律分析、警察部门、经济、体育、公共政策、项目评估等部门中起了重要作用。近些年来,最有影响的定量社会科学对于公众来说就是“大数据”。毫无疑问,那些负责创造、应用、传播从而让改变成为可能的社会科学家,不应该把这个生产机制限制到教学之外。

糟糕的是,除了期末测评,用数据收集来提升教学效果是十分罕见的。尽管我们掌握的有关教室课程的数据有了很大增长,但是我们还要和学校行政人员一同为教学实行数据战略。在保护学生隐私和遵守联邦政府规定的前提下,我们做了些商业性质调查,向学校提供尽可能多方面的文件。我们得到的结果是可靠的。比如,不是通过简单了解学生的专业、所修课程、职业追求等来说服学生接受一些奇怪的意见,而是通过收集和分析先前成千上万的学生案例来系统地给学生提出建议。这样,学生就可以通过大学教育了解不同的出路,然后选

择哪个更适合他们，明白在他们前进的路上有什么障碍，可以避免什么样的障碍，什么样的选择会使他们直面障碍。我们可以通过教职员帮助我们了解特定的行为会有怎样的效果、怎么样就没有效果、对于老师来说如何工作最好。如果我们努力收集数据，并把这种方法应用到我们的教学研究之中，老师们就可以通过观察性研究学习，而非仅仅尝试改变他们在教室的行为却从未受到评估（主要因为缺乏一个适当的对照组）。

大学的公职人员、全体教师委员会、全体员工需要接受社会科学研究在每一个地方产生的巨大影响，思考如何改变大学的管理模式以提升教学效果。

### 总结：

近些年来，缜密的教育研究已经开始植根于物理学、化学、计算机技术、医学等其他领域。另外，许多科学部分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小组。比如，亚利桑那大学、科罗拉多大学、哈佛大学、堪萨斯州立大学、马里兰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等其他大学里有物理教育研究小组。爱荷华州立大学、普度大学、剑桥大学的化学研究小组、鲍登学院、杜克大学和维拉诺瓦大学的计算机技术研究小组，斯坦福大学有医学教育研究小组。

这些小组正在研究人的行为的某些方面，这就是所谓的社会科学研究。令人高兴的是，我们在其他领域也有一定的影响力。我们应该接受挑战鼓励大学参与其中，系统学习社会科学知识，收获社会科学领域中有关教育的一般理论，发明新的技术来提高教育促进学生学习水平的增加。这样的结果会使教室里的学生变得更加博学，尽管他们要很努力。

[翻译：刘 志、缴懿鑫、吕 海、杨 雪、裴 瑶]

[责任编辑：裴 瑶]

[校对编辑：姜忆楠]

### ..... 敏感性和脆弱性 .....

理解相互依赖，需分辨相互依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

敏感性指的是在某一政策框架内做出反应的程度——一国变化导致另一国发生有代价变化的速度有多快？所付出的代价多大？可理解为在试图改变局面而做出变化之前受外部强加代价影响的程度。

脆弱性是指各行为体获得替代选择的相对能力及其付出的代价。可理解为行为体因外部事件强加的代价而遭受损失的程度。

资料来源：[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3版）》（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14页。

[整理：马焱粮、赵 政、任 娟、姜忆楠]



## 海外留学记

杨 锋\*

我于2010年从南开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毕业,目前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政治系学习,是博士一年级学生,研究方向是比较政治学和方法与模型。目前,我的主要的研究兴趣是威权国家的政治经济学,比如腐败、官员激励和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国际关系专业的师弟师妹让我为《新视界》写篇短文,介绍一下在这边学习的感受。我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交流。我参考了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孙芳露学姐2011年为《新视界》写的留学经验,感觉无法写得那么细致。而且,她是国际政治系的“嫡系”师姐,所说的对大家的借鉴意义更大。我在不同的专业学习,借鉴意义有限,但仍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对那些打算在学术道路上奔跑的同学有所帮助。

先说说为什么读博。可能很多人都跟我一样,不知道自己毕业后要干什么。读博无疑是种选择。但是有一种情况要谨慎:因为找不到工作而选择继续深造。这种选择很危险,其原因在于如果你已经决定投身实业了,再呆在学术界几年并不能给你带来相应的价值。且不说能不能学到东西,就算学到了新的东西,这些知识并不一定能被运用在未来的工作实践上。另外,一个区分学者和其他职业从业者的重要特点是好奇心。我碰到的很多学者——教授或者研究生,都特别喜欢问问题。有些问题可能很小,比如为什么西南村的豆皮好吃?有些问题可能更大些,比如互联网能遏制腐败吗?有些问题可能只需要谷歌一下就能找到答案,有些可能要花几年甚至十几年来解答。如果回答这些问题能够给你带来快乐,你可能适合做个研究者。

再说说目前在美国的学习。在来美国前,我在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的研究型硕士项目里学习。该项目英文授课,并提供相当好的方法论训练。两年的时间给了我很好的过渡,不至于在来美国的时候觉得不适应。我也做个广告,希望有志于做学术的同学在申请的时候不要遗漏掉这所香港的学校。我刚来洛杉矶的前半年,大多数时间被用来读新东西,一小部分时间用于修改我之前的论文或者想一些新的研究。最令我开心的是这里的老师都很热情,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己在领域里德高望重而不愿意跟学生交流。事实上,只要发邮件给他们,都能很快找到跟他们交流的机会。而这些交流就会把我的一些简单的想法变成值得继续研究的方向,让我受益匪浅。另外一个让我惊讶的现象是,虽然有些教授年纪很大了,但他们对新东西总是热情不减,在各种课上也经常看到一些头发花白的教授熟练地向我们展示学界的一些新“时尚”,比如新的统计软件。

最后,谈谈博士申请。从中国院校直接申请美国的博士项目并不容易,有一部分原因是目前国内的政治学教育跟国外还不接轨。但是,放眼望去,现在美国任何一个不错的政治学博士项目里都能找到中国人的身影,说明被录取也没那么难。对于那些刚刚入学的本科同学,

---

\* 作者简介:杨锋,男,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政治系博士一年级学生。

我想说，好好学习，GPA 挺重要，而这不仅仅是为了在期末拿个奖学金。在别人不熟悉你学习能力的时候，这些硬件经常就是他们衡量你的唯一标准。同理，也不要低估那些标准考试（比如，GRE）的重要程度。当然，如果已经是高年级同学了，这些东西都无法改变了，就多花点时间在写作上，特别是 writing sample。一篇好的论文要花很长时间，半年甚至一年，所以有志于申请的同学要尽早开始准备。我也推荐大家阅读一篇关于申请的文章<sup>①</sup>，作者是美国的一位教授，这种“一手”信息很难得。

祝大家学习顺利。

[责任编辑：李安琪]

[校对编辑：王芳琳]

### ……………《开罗宣言》发表 70 周年 日本或图谋翻案……………

1943 年 12 月 1 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发表了著名的《开罗宣言》，宣言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开罗宣言》是战后处理日本问题的重要依据，《开罗宣言》连同其他一些国际文件奠定了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基础。

然而，即使在《开罗宣言》发表后第 70 个年头的今日，日本右翼势力还是试图掀起这块压在身上的“镇妖石”，为其侵略史翻案。有分析认为，战后的日本仍存在否定《开罗宣言》精神的思想。由首相安倍晋三带领的日本政府表现出的极端民族主义，其否定历史、修宪扩军、推进解禁自卫权的种种行为，都显示出日本试图摆脱“战后体制”的约束。

这一思想具体表现为：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向中国挑衅，在颇为敏感的靖国神社问题上，安倍政权也不顾多国的谴责和反对，一意孤行。此外，日本战后首个“国安会”及配套的国家安全保障局预计将分别于下月及明年 1 月成立，国家安全保障局拟设中朝小组，针对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

[整理：马焱粮、赵 政、任 娟、姜忆楠]

<sup>①</sup> Daniel W. Drezner, “So you want to get into a Ph.D. in political science Ph.D. program, Episode II: Attack of the Postgrads.” [http://drezner.foreignpolicy.com/posts/2012/03/22/so\\_you\\_want\\_to\\_get\\_into\\_a\\_phd\\_in\\_political\\_science\\_phd\\_program\\_episode\\_ii\\_attack\\_of](http://drezner.foreignpolicy.com/posts/2012/03/22/so_you_want_to_get_into_a_phd_in_political_science_phd_program_episode_ii_attack_of).

## 英采飞扬

**【编者按】**当今世界,国际关系行为体日益多元化,除了传统的国家行为体依然是最主要的行为体之外,非国家行为体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公共物品的存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无政府状态压力带来的冲突倾向。本期英采飞扬带大家了解国际关系行为体和国际社会中的公共物品。

### Actors in IR

Guo Xiaoqiong\*

Actors are the basic uni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y refer to the individuals, groups, states, or organizations that play major roles in world politics.

Generally, actor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One type refers to states, and the other type refers to non-state actors. On the one hand, these two concepts are opposite in definition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re also related to each other.

As fo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concepts, a state means an independent community in the global system. It has fixed territory and is administered by a sovereign government. This government manages the affairs of certain people. In contrast to states, non-state actors refer to all transnational active groups other than states. They usually don't have specific territory or residents. A state can be a member of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GOs), which belong to non-state actor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such as International Red Cross and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violent organizations such as anti-government armed forces and Taliban,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and some influential individual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such as politicians also belong to non-state actors.

There are connections among states and non-state actors. Firstly, when dealing with global affairs, states often take advantage of non-state actors' actions; non-state actors also take advantage of the diverse regulations made by different states to obtain their interests. Secondly, states and non-state actors have conflicts with each other. Non-state actors are against the states' sovereignty and always ignore the borders of the sovereignty. They hope to weaken the influence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Thirdly, non-state actors have contradictions within themselves, too. For instance,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promote globalization, but some NGOs tend to launch the anti-globalization movement.

---

\* Guo Xiaoqiong is a juni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 What's the public good?

Guo Xiaoqiong\*

There is always something in the world that we have to share them with others, such as clean air, safe drinking water and world peace. These things are usually called “public goods”.

In simplest terms, public goods refer to the things which are freely provided to the collective. It cannot be consumed exclusively by those who pay for it, or denied to those who do not. Strictly speaking, public goods possess two properties. One is nonexcludability and the other is noncompetitiveness. The former means that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prevent others from using the good due to technical difficulties or because it is hard to charge money for it. The latter refers to the character that everyone can benefit from it without diminishing other's enjoyment.

In global society, som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an be called public goods. Take the multilater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UN as an example. On the one hand, as the membership of these organizations is open to all members in UN, we can say that the multilater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UN has nonexcludabili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addition of new members won't influence old members' rights to share the benefit of the organization. So we can also say that the multilater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UN has noncompetitiveness. However, not al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have these two characters above. For instance, the membership of EU is limited to states belonging to certain areas. What's more, although adding new members to the organization won't influence old members' rights, the cost of operation and negotiation will also increase at the same time.

[整理: 彭紫嫣、李志宇]

[责任编辑: 彭紫嫣]

[校对编辑: 石宇]

---

\* **Guo Xiaoqiong** is a juni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 年终特辑

### 2013 年终大事盘点

**【编者按】**2013 年就要过去了，我们经历了它，也“围观”了它，也因它产生了无数的“感动”，用一个网络热词来概括，过去的一年很“给力”。从年初的查韦斯到年末的“南非国父”曼德拉，两位世界领袖的逝世让世界人民感到悲痛；中东地区依旧动荡不已，伊朗核问题和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牵动世界神经；中国改革大踏步地进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各国，积极促进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2013 年不管是世界还是中国，都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本期《新视界》年终特辑，将带您回顾 2013 年的大事件。

#### 1. 查韦斯逝世

2013 年 3 月 5 日，委内瑞拉总统、拉美地区重要的左翼领导人、“反美斗士”查韦斯罹患癌症逝世，享年 58 岁。“后查韦斯时代”的委内瑞拉能否在新任总统马杜罗的领导下实现政局稳定和内外政策延续？整个拉美地区近年来“向左转”的趋势是否会发生改变？拉美左翼国家是否能够顺利整合、实现独立自主、同美国较量？中拉关系是否会发生变动？这些问题还需要时间来解答。



#### ➤ 专家解读

自查韦斯 1999 年 2 月上台以后，委内瑞拉与中国的关系迅速发展。查韦斯曾经 6 次访问中国，是在任拉美领导人中访问中国次数最多的总统。在查韦斯执政期间，两国共签署 430 项协议，200 多个合作项目。马杜罗上台将会维持这种关系。当然，无论执政党还是反对派执政，两国关系特别是政府间的交流都不太会有大的改变。

——徐世澄 社科院拉美所研究员

美国与委内瑞拉关系最困难的时刻不是已经过去，而是尚未到来。改善关系的意愿存在于美国一方，向美国示好不符合查韦斯所属政治派别的利益。

——米查姆 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美洲项目主任

#### ➤ 学生视角

作为一个坚定的维护国家利益、反对美国霸权的政治家，查韦斯尽到了一个政治家应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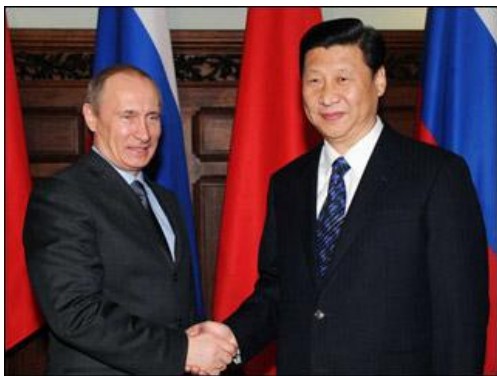
担负的责任。他在国内深受民众欢迎，在国际上不断得到众多的热爱和平的人士的支持。查韦斯的逝世，是委内瑞拉政坛的一个巨大的损失。

——南开大学 2012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唐朝阳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作为一名旗帜鲜明的“反美斗士”，他也是委内瑞拉人民（特别是贫苦人名）的好总统，他的逝世，对于所有反霸权国家、对于委内瑞拉人民无疑是一次重大损失。

——南开大学 2012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杨至远

## 2. 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



2013年3月22日至3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联邦、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南非共和国和刚果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南非德班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这是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以后的首次出访。按照外交部长王毅的总结：“这次访问是我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外交开局之旅。首访俄罗斯，着眼的是周边环境和大国关系；出席金砖峰会，着眼的是当今世界快速上升的新兴力量；访问非洲三国，着眼的是发展中国家这一中国外交的根基。这次开局之旅，既有国家正常交往和参与国际会议的客观需求，更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战略擘划，体现了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本质特征，体现了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充分结合。”此外，习主席首次出访展现了中国新领导人的全新形象，而“夫人外交”也是为这次出访的一大亮点。

### ➤ 专家解读

习近平何必选择俄罗斯作为首访的外国？在策略运用上，正因为今后习近平要着手改善中、美关系，眼下更要加强与俄罗斯的邦交。北京只有在加强与莫斯科的关系以后，才能站在更为坚实的基点上，让华盛顿更为看重中国。

——薛理泰 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朱惠忠 中国战略发展基金会主席

在今天的全球事务中，首脑外交占据着显赫的位置。特别是在大国外交中，首脑的风采、举止和眼光，更是展示大国的国际形象、演绎大国的人文底蕴和突显大国的国际责任的重要契机。习近平作为中国国家主席，此次出访，一路走来、和风细雨，向世界传颂了声音和气场，在一个已经个性化社会的中国展示中国新领导人对外交的自我理解和发挥。这让世界了解和目睹了中国新领导人“新”的所在。

当中国领导人愿意、并能从容而又享受地在国际外交场合展示自己的眼光、个性和对世



界外交的理解,这一成就足以掩蔽习近平出访的其他政治、战略和经济成果。一个乐于、并能快乐地向世界展示自我、展示个性和展示“气场”的中国领导人将预示着外交的调整和发展。

原因很简单。外交工作是创造性的工作,是需要注入领袖个人活力和影响力的工作,更是需要展示自我期待和气质秉性的工作。大国外交是领袖外交,领袖的眼光、思想和风采,永远是大国外交的坚实财富。习近平在访问中温和、放松和自然的神态,朴素但又显示功力的国际思维,面对公众和客人时热情、坚定而又活跃的神情,近20年来很难看到这种用自己的思想和魅力去感染对方的中国领导人。

——朱锋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 ➤ 学生视角

虽然“远交近攻”和“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有些激进,但是却恰巧描述了习近平首访的目标,是为中国日后的崛起做的最好的准备。

——南开大学2012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唐朝阳

习近平主席首访俄罗斯足见对于俄罗斯的外交关系是我国外交非常重要的一点,自从解决了领土问题后,中俄关系发展良好,此次访问也向世界表明中俄关系将保持良好发展。此外首访跨越亚洲、欧洲、非洲三大洲,体现了全方位外交的特点。

——南开大学2012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唐铭兴

## 3. 朴槿惠会奥巴马 美韩同盟再提升

5月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会见来访的韩国总统朴槿惠,双方举行首次正式会晤。谈及朝鲜半岛问题,奥巴马重申美国对韩国的安保承诺。美韩两国元首声称,不会容忍来自朝鲜的威胁和挑衅,但同时也表示不会关闭谈判的大门。朴槿惠第一次以韩国总统身份访美,适逢美韩同盟建立60周年。当天,她和奥巴马共同签署发表《纪念韩美结盟60周年联合宣言》。双方一致决定,将美韩同盟的定位提升至全球伙伴关系,扩大两国在东北亚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合作。



### ➤ 专家解读

美韩关系是一种制度性的关系,实际上很多实质性的内容已经在之前的这种同盟框架当中已经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体现,朴槿惠的前任李明博总统时期执行了一条全面倒向美国的政

策,那么在他的任期当中美韩是通过自贸协定的签订把这种同盟关系是从军事领域扩展到了一个经济的领域,所以他们叫全面的战略关系,全面的战略同盟。

到了朴槿惠时期,由于今年也是美韩同盟签订的 60 周年,应该说是一个大日子,在这样的基础上,双方经过协商一致同意要把全面的战略同盟关系提升到全球伙伴关系,这个全球伙伴关系它的实质性含义就是指美韩同盟不仅是要在朝鲜半岛地区发挥作用,也要在整个的东北亚地区,整个的全球性事务当中也要发挥作用。从表面上来看,比之前的关系又有了一个更进一步的提升,那么韩国在美国的全球同盟体系当中的地位也得到了一个提升,就拿美韩同盟和美日同盟来做一个比较的话,之前美日同盟他实际上地位在整个同盟体系当中的地位是要比美韩同盟要高,那么现在美韩同盟要把它管辖范围或者说他的涉及的范围要扩展到全球领域,实际上这个同盟跟美日同盟的地位已经有比肩的意思了,所以从表面上来看这个是韩国想要的一个结果,但是从长期来看应该说这个恐怕又是要替美国掏腰包的机会,好比以前要更多了,所以也是需要两面来看。

——于迎丽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 ➤ 学生视角

利益交换,两国就双方和第三方之间的利益关系达成一致,以对抗或平衡其他国家,双方都得到好处了,都高兴了,同盟关系可不就更进一步了。但是,就美韩来说,双方实力差距大,双方之间是否处于平等交往还难说,同盟关系升级对美来说是好事,对韩来说还真不一定,当然对跟韩有间隙或利益冲突的国家来说,不是好事。

——南开大学 2011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郭天语

作为冷战初期的产物,美韩同盟并未随其结束而宣告解体,反而日趋紧密。目前,美韩同盟已经超越国家安全层面的合作,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国际事务等多个领域。不过,无论是应对朝鲜半岛问题,还是处理同日本关系,或是参与其他国际议题,由于彼此关切不同,美韩两国的政策主张不尽相同。此外,美韩双边合作中尚有诸多问题等待化解。所以,两国元首虽有意提升美韩同盟的定位,但其未来发展仍面临不少牵绊。

——南开大学 2011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彭紫嫣



#### 4. 菲射杀台湾渔民 海峡两岸齐谴责



5月9日，台湾“广大兴28号”渔船在屏东县鹅銮鼻东南方约180海里处海域作业时，突遭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射击，导致一名船员死亡。事件发生后，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同仇敌忾，义愤填膺。台湾方面向菲律宾政府提出道歉、赔偿、惩凶等要求，敦促其限期做出答复，否则采取制裁措施。大陆方面强烈谴责这一野蛮行径，要求菲方立刻开展调查，给受害渔民一个交代。针对受害方合理的要求，菲律宾方面不但敷衍塞责，配合消极，还强词夺理，歪曲事实。耍尽一番无赖之后，迫于压力，才不得不予以正视。

##### ➤ 专家解读

中国现在已经重组了国家海洋局，对外称海警局，应该和台湾海巡署有海上安全合作，共同来维护我们中华民族、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在军方，我觉得也应该有这方面的一些合作，大陆军方学者已经多次呼吁，两岸军人要共同协防南海，协防钓鱼岛。我觉得现在从事态的发展来看，确实提出了这么一个现实的要求。这个呼吁我觉得关乎着中华民族它的根本利益，所以我觉得希望台湾当局对于呼吁应该引起一个高度的重视，两岸毕竟是血浓于水。

——罗援 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副部长

外交上，中方要求菲方对这一事件道歉、赔偿、并以实际行动一次性地解决岛屿争端，否则，中方有权付诸武力；中国军方要借此事对收复八个岛屿给出时间表，表明不惜一切代价誓死捍卫主权，先礼后兵。中国大陆同时要敦促台湾别再执迷不悟，一致对外地先解决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海疆与岛屿。两岸因就此事同时发表声明（立场必须一致，台湾随中国之立场），若菲律宾再次先开第一枪，中国将有权以牙还牙地摧毁开第一枪的兵器及缉拿凶犯。

——单福山 时事评论员

### ➤ 学生视角

菲律宾方面射杀台湾渔民并且拒不道歉,让本就紧张的南海局势更加恶化。菲律宾本与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有领土纠纷,而其又在对待该事件上态度如此强硬,可以看出其维持南海争端的强烈愿望。这也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相关国家对海洋领土争端的重视,“搁置争议”并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最有办法,寻找从根本上解决南海问题的方法的需求也越来越紧迫了。

——南开大学 2010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吕海

菲方公务船射杀台渔民的过程和行径是极其野蛮的,不人道的,无论菲方如何辩解,都是没有道理的!最近几年,仗着有外国势力的撑腰,菲律宾政府狐假虎威,狂妄自大。有恃无恐之下,该国一意孤行,到处煽风点火,不断惹是生非。菲律宾当局若不改弦更张,难免有朝一日自食其果。届时,恐悔之晚矣。

——南开大学 2011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彭紫嫣

## 5.八国集团开峰会 共识难觅成果少



6月18日,为期两天的八国集团峰会在北爱尔兰厄恩湖畔落下帷幕。

峰会结束之时,八国领导人共同发表

《厄恩湖宣言》,倡议各国在公平税收、开放贸易和提高透明度等方面做出努力。关于叙利亚问题,由于分歧严重,各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峰会发表的联合公报只做了原则性表述,呼吁尽可能以

政治方式,共同推动叙利亚内战的结束,支持尽早召开日内瓦国际会议,但未提及会议的具体时间。

### ➤ 专家解读

若没有俄罗斯的陪衬,八国集团是名副其实的富国俱乐部。昔日,作为一个基本由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八国集团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然而,时移则世异。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八国集团的作用日渐式微,风光不再。论代表性,八国集团远不如二十国集团。面对层出不穷的区域和全球性问题,八国集团愈发鞭长莫及,难以发挥实质作用。长此以往,八国集团沦为明日黄花,恐是大势所趋。

——郑浩 时事评论员

曾几何时,七国集团和后来的八国集团在国际舞台上叱咤风云数十年。而今,世界格局处在大调整时期,新兴经济体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并且发挥重要作用,二十国集团等新

平台的作用和影响力都不断增强,八国集团的重要性日益下降,长久维持下去的有效动力日渐缺失。这个“富国俱乐部”要想真正“给世界事务带来积极变化”,恐怕关键还在于同新兴经济体找到一种有效对话及合作机制,将双方各自关心的重要经济议题纳入到同一平台上,以弥合差异、寻求共赢。

——陈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

### ➤ 学生视角

G8峰会本应是世界八大工业领袖国首脑的峰会,但是由于国际经济形势的不景气,G8各成员国都面临着需要扭转的国内经济局势。G8成果不多,一方面是因为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各国由于国家利益受损,彼此矛盾增多,谈判中需要略强硬且谨慎的立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全球并未出现新的可以拉动经济恢复的新增长点和增长领域,确实也并没有什么可以进行深刻讨论的内容。

——南开大学 2011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郭晓琼

八国峰会成果少是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原因之一是俄罗斯与其他七国意见不一致,原因之二是八国峰会这一机制的影响力越来越比不上G20这一囊括了新兴发展国家的机制了,因此这是一个并不怎么让人吃惊的结果。

——南开大学 2010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吕海

## 6. 美国历史上迄今规模最大的城市底特律破产

当地时间7月18日下午,美国“汽车之城”、密歇根州最大的城市底特律,依照《破产法》第九章相关规定正式向该州东部地区法院申请地方政府破产保护。这是美国历史上迄今规模最大的城市破产案。

### ➤ 专家解读

底特律不应过于依赖单一行业,要适时发展多元化经济。继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汽车工业兴盛之后,底特律随着汽车业的波动而起伏。预测未来总是困难的,正如能预见到金融危机的人寥寥无几一样,但是多元化一直是一个很好的规避风险的方法。如果底特律吸引汽车行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就不会走到今天的地步。随着经济全球化,明智地预测未来在诸如能源、电子、医药或农业等领域的发展趋势,将有助于这个城市利用已有资源发展多元化经济。

——托马斯·斯蒂贝尔 美国夸尔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 ➤ 学生视角

我认为金融危机也是底特律经济状况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从新闻网了解到底特律失

业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而房地产泡沫破灭引起的房价下跌使得房地产税收收入降低。这些迹象都是其经济状况恶化的表现。

——南开大学 2010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郝丽君

我认为底特律破产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也起到了一个警示作用，城市的发展不能过度依赖钢铁、石油等资源，所以，转变我国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

——南开大学 2010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孙晶

底特律是典型的单一产业城市，单一的汽车产业造就了底特律的辉煌，但也促使其走向衰败，在当下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政府的参与应与市场的作用相结合，合理负责地推动经济的发展。

——南开大学 2010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孟丹

## 7.G20 峰会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

9 月 5 日至 6 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八次峰会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这是在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不断显现的背景下，世界主要经济体领导人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当前，二十国集团正从危机应对向长效经济治理机制转型。



### ➤ 专家解读

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一直领先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比重逐年增加，中国经济对世界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在此背景下，习主席出席此次 G20 峰会的意义尤为重要。

——弗兰克·拉文 美国前商务部副部长、“现在出口”公司创始人

中国的经济发展受全球关注，相信在即将举行的 G20 峰会上，中国将利用该平台发挥推动世界经济走向复苏、健康发展的积极作用。

——伊科维奇 澳大利亚资源公司首席执行官、金融专家

作为全球经济治理机构，G20 在全球贸易、投资等领域作用不断扩大，有力促进了国际社会在重大问题上的合作与协调。中国已是全球经济的重要力量，对全球经济稳定和发展举足轻重。因此，中国在 G20 内就国际金融秩序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全球可持续均衡发展乃至全球气候变化等议题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彼得·德雷珀 南非国际问题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 ➤ 学生视角

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作为含概念最广、档次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国际合作机制，G20 致力于推动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就经济金融问题进行开放性、建设性的问题讨论与研究，有利于促进国际合作与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南开大学 2010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曹滢

本次峰会以造福所有人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性就业和包容性增长为目标，致力于投资和结构改革，可见这无疑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大国对全球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做出努力的表现。中国也将在未来的全球发展中起到日渐重要的作用。

——南开大学 2010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贺莉莉

## 8. 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 9 月 18 日接受了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的专访。巴沙尔表示，叙利亚将遵守加入《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所有要求，同时不生产、不储存、不使用、不分发化学武器。

### ➤ 专家解读

从公开的材料看，叙利亚具有一定的化学武器生产能力，尤其是工艺较为简单的神经性毒剂如沙林、糜烂性毒剂如芥子气的生产能力较强，但生产这类武器必需的一些原料如三氯化磷、硫二甘醇等，叙利亚本国并不出产，需要进口。此前就有媒体报道，叙利亚从别国进口了大量生产化武的原材料。需要指出的是，叙利亚具有较强的化学武器防御能力，是少数可以独立生产化武防御装备的国家，从这个角度看，叙利亚的化武水平不容小觑。美国以使用化武为借口，宣布将对叙利亚进行军事打击，俄罗斯从中斡旋，是叙利亚加入公约的直接原因。另一个情况是，作为叙利亚邻国的以色列，直到今年 5 月才签署该公约，但尚未得到议会批准。叙利亚出于自身安全考虑，迟迟没有签署。从目前的情况看，叙利亚应该很早就做好了加入禁化武公约的准备，在美俄关于叙利亚化武问题协议达成后的几天里，叙利亚就向国际禁化武组织提供了详细的清单，其详尽程度甚至超过了美国的意料，美国官方也对叙政府迅速提交化武清单感到惊喜，认为“叙政府的申报比华盛顿预料的更全面”。这种情况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叙利亚可能早已做好了弃化武的准备。

——程振兴 防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科技部科技反生化恐怖主题专家组成员

化学武器的销毁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二战中日本在亚洲战场上遗留的含砷的化学武器,至今仍未能完全销毁。叙利亚销毁化学武器面临的第一个困难是资金问题,销毁化学武器的成本往往数倍于生产成本。第二个困难是技术问题,销毁化学武器首先需要对弹药进行拆解,分离弹体以及弹体内的化学战剂,再对化学战剂进行中和、焚烧等处理,这一过程危险性高,技术难度大。第三个困难是环境问题,化武销毁不可避免要对环境造成影响。在叙利亚当前的安全形势下,难以控制销毁工作对环境带来的影响。所以说,叙利亚要在协议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销毁工作,难度极大。

——董俊军 防化学院副教授、商务部两用物项和技术出口化学管制专家组副组长

### ➤ 学生观点

我认为公约中的一个缺陷就是只对附表中提到的毒剂类型进行了限制,但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有新型物质被研究出来,那么如何对新出现的毒剂类型采取措施?这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难题。

——南开大学 2010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郝丽君

虽然技术证据指向叙利亚政府军使用了化学武器,但是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的目的并不是要找出化学武器,而是为了消除化学武器对当地人民的威胁,所以我认为叙利亚当局应该配合联合国销毁国内的化学武器,遵守国际公约。

——南开大学 2010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杨雪

## 9.曼德拉去世



南非总统祖马 2013 年 12 月 06 日发表全国讲话宣布,前总统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住所去世,享年 95 岁。南非将为曼德拉举行国葬,全国降半旗。曼德拉是世界上最受尊重的政治家之一,他带领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走向多种族的民主制度。1993 年,曼德拉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1994 年 5 月 10 日曼德拉成为南非首位黑人总统,达到他传奇人生的高潮。曼德拉曾被当局囚禁达 27 年之久,这没有摧垮他,反而使他变得更坚强。他出狱后展示的自嘲式的幽默、活力以及对别人的宽恕让他成为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之一。

### ➤ 专家解读

种族平等是曼德拉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无论是和南非共产党合作,还是和南非国民党合作,无论是来自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共产主义国家的援助,他都愿意接受。

曼德拉的存在满足了西方社会追求政治与道德完美结合的一种圣徒心理,但不应神化曼德拉的作用,曼德拉的离去,正是“彩虹之国”南非认真面对现实的重要契机。

——贺文萍 中国社科院亚非所南非政治专家

他始终倡导民族和解和种族包容,这样一个民族和解的精神,实际上和非洲传统的村社文化一脉相传。与西方文化更多的强调竞争和个人来达到发展的目的不同,这种精神提倡得更多的是一种包容式的发展,它强调家庭和社会不同人群的和睦相处。

——刘鸿武 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副会长兼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副会长

### ➤ 学生视角

曼德拉先生是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的著名领袖、新南非的缔造者,也是享誉世界的卓越政治家。他不仅被南非人民尊为“国父”,也赢得世界各国人民的崇敬和爱戴。

——南开大学 2011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程康

伟大的曼德拉走了。他的伟大不仅在于他成功终结了种族隔离制度,还在于他用一种连他的反对者都最终赞许的方式去终结恶的制度。他的伟大也揭示容忍社会修复和改良机制的重要性。

——南开大学 2011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于凯玥

## 10. 朝鲜政局动荡



张成泽是朝鲜政治及军事人物,前党和国家领导干部之一,曾任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行政部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朝鲜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国家体育指导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大将。他是金正日的妹妹、金日成长女金敬姬的丈夫,金正恩的姑父,在金正恩掌权初期,一度被视为是朝鲜实际上的“二号人物”,也是经济改革和创新领域的标志性人物。2013

年12月8日,在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成泽因处理经济问题失当、贪渎、结党营私、乱搞男女关系、受资本主义影响吸毒放纵等5大罪状遭到撤免。随后张成泽被押往军事法庭受审,在庭上承认图谋发动政变并出任内阁总理。12月12日,张成泽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这是朝鲜近16年来首次处决政治局委员级的高官,备受外界瞩目。

### ➤ 专家解读

从提出的那些指控和朝鲜媒体所作的评论来看,可以说,张成泽受到指控的第一个原因是他企图在朝鲜劳动党内部建立特殊派别;第二,他拒绝朝鲜当前领导层的独揽大权。对他还有一个严重指控,即他否定阶级斗争,破坏人民民主专政,且让曾因意识形态原因被解除

权力的人们重返朝鲜劳动党领导机构。

——叶夫根尼·金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朝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在金正恩执政期间，中朝经济合作事务一直是张成泽在负责，中朝经贸合作的许多项目也是张成泽一手抓的，其中就包括中朝罗先经济区。张成泽被处决，可能会对中朝经贸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一些具体项目可能会出现调整。

——石源华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任

### ➤ 学生视角

张泽成的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可避免的，金正恩需要这样一个机会来稳定其政权，显示其能力，处决了“二号人物”张泽成会在朝鲜国内产生最大的政治和心理效用。

——南开大学 2011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郭晓琼

张泽成被处决可能会影响到朝鲜的内政外交，既然曾经是朝鲜政坛的二号人物，其在处理各方面事务时必然有一定的能力和影响力，现在张泽成落马，也许一时间很难找到一个可以接替他与其具有同样影响力的人。

——南开大学 2011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程康

## 11. 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 2013 年 11 月 23 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根据一九七七年三月十四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一九九五年十月三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一九九五年十月三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一九九五年十月三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一九九五年十月三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一九九五年十月三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二〇〇一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宣布划设中华人民共和国东海防空识别区。中国政府按照国际通行做法，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目的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领空安全，维护空中飞行秩序。



### ➤ 专家解读

防空识别区的划设基于国家安全形势发展的要求，可以完善我国海洋方向的防御体系，了解了飞行器的航向、航速、高度等航行数据，还可保障区内飞行的其他航空器的安全。

——尹卓 军事专家



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就好比一个缓冲区或是防火墙,对于来自海上方向的空中威胁和不明飞行物,根据不同情况,及时采取识别、监视、管制和处置等相应措施加以应对划定区域,不是去激化矛盾,而是将模糊界限清晰化、复杂问题简单化。界限不清晰更容易发生偶发冲突,有了界限各方就会采取谨慎态度。我们防空识别区的划法,已经非常克制。

——罗援 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

### ➤ 学生视角

中国为何在此时设立防空识别区,在维护国防安全的同时应当是含有威慑各国、警告一些国家不要做出不理智的行動的含义在里面,防空识别区的设立将使得我国在钓鱼岛事件上占据更有利的地位。

——南开大学 2012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钱美

在美国战略中心东移以亚太以及日本军事扩张的背景下,中国设立防空识别区是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海洋、领空合法权益的重要措施,表明新一届领导集体对于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坚定决心!

——南开大学 2012 级国际政治本科生 武燕

## 《新视界》2013 大事记

### ◆ 《新视界》编辑部成功举办“2013 届毕业生经验交流会”

2013年6月25日晚7点,由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新视界》编辑部举办的“2013 届毕业生经验交流会”在范孙楼 116 室举行。四位毕业生为同学们带来了一次内容翔实的经验分享交流,主要涉及就业、保研、考研三个方面,国际关系系的部分同学参加了会议。在互动环节中,在场的同学就求职行业选择、专业对口、读研选校等关心的问题与几位毕业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交流,为大家将来的求学和求职规划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 ◆ 《新视界》编辑部成功进行换届选举

2013年9月30日晚18:30,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新视界》编辑部在范孙楼 116 成功进行了换届选举。2010 级本科生吕海当选为新一任主编,2011 级本科生刘芮宁、郭晓琼和王宝盆当选为新的副主编。换届大会由上任主编姜忆楠主持,系刊部分成员以及新加入的实习生参加会议。选出新一届的主编、副主编后,大家也纷纷发表对系刊未来建设的意见。

### ◆ 《新视界》新章程颁布

2013年10月22日晚10点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新视界》主编吕海以电子邮件方式将《新视界》2013至2014年度新章程下发至系刊成员,新章程主要对栏目分工、组织机构、编辑部人员产生方式及职责、奖惩制度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新章程对于

指导系刊工作的进行有很大作用,系刊成员也对新章程给予了肯定和支持。

#### ◆ 《新视界》编辑部与 2013 级国际政治本科班交流会成功举办

2013 年 11 月 12 日晚 7 点,《新视界》编辑部与 2013 级国际政治本科班交流会在南开大学迎水道校区 118 教室成功举办。首先,编辑部成员向 2013 级本科同学介绍了《新视界》的基本情况,其次;在互动环节,高年级的代表与一年级的同学就大学生活和未来规划、专业学习和论文写作、编辑技巧及时间管理等具体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

#### ◆ 《新视界》编辑部内部培训会顺利召开

2013 年 11 月 30 日下午 2 点,《新视界》编辑部内部培训会在范孙楼 116 会议室举行,本次培训会的主题是“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会议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在主编吕海的主持下,国际关系系 2013 级博士生李金潼和硕士生董柞壮在会上与同学们分享了学习、写论文、文献查询与管理的宝贵经验,部分非系刊成员的国际政治本科生也参加了此次培训会。

[整理:程康、郝丽君、马逸群、彭紫嫣、唐铭兴]

[责任编辑:程康]

[校对编辑:孙迪]

### ..... 海德堡大学 .....

海德堡大学成立于 1386 年,是德国最古老的大学,也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开设的第三所大学。十六世纪的下半叶,海德堡大学就成为欧洲科学文化的中心。

今天,海德堡还是德国乃至欧洲的一大科研基地,先后出过 10 位诺贝尔奖得主。

海德堡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生院,是欧洲顶尖的创新以及跨学科研究机构之一。海德堡大学尤其重视跨学科以及国际的交流,产生了包括“全球化下的文化转变”等四大重要的跨学科研究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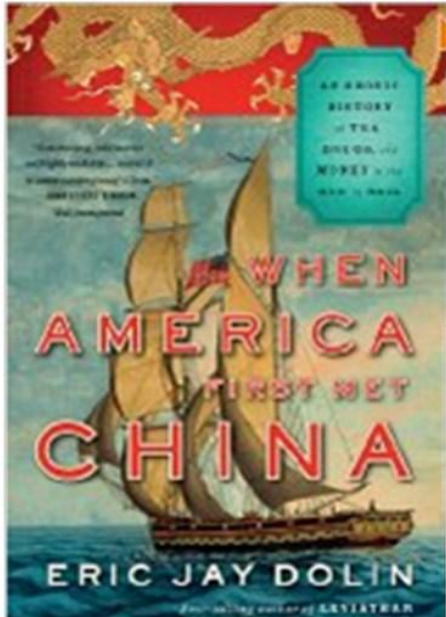
海德堡大学有一座独一无二的学生监狱。海德堡大学的学生监狱始建于 1712 年。当时入学的孩子年龄偏小,喜欢调皮捣蛋。根据法律,警察不能关他们,于是学校设立了“监狱”,以正校风。学生在入监期间白天可以去听课,下课后要乖乖地呆在监狱里。往日阴暗的监狱已成为旅游景点,每年吸引着 500 万游客到此参观。

海德堡大学同许多中国的大学都有校际交流,例如南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原同济医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南开大学与海德堡大学于 1985 年签订校际交流协议,此后双方连续开展了教师交流项目、学生交换项目。目前南开大学已有 30 余位教师赴海德堡大学进修和交流,共接受对方留学生 30 余位。

[整理:马焜粮、赵政、任娟、姜忆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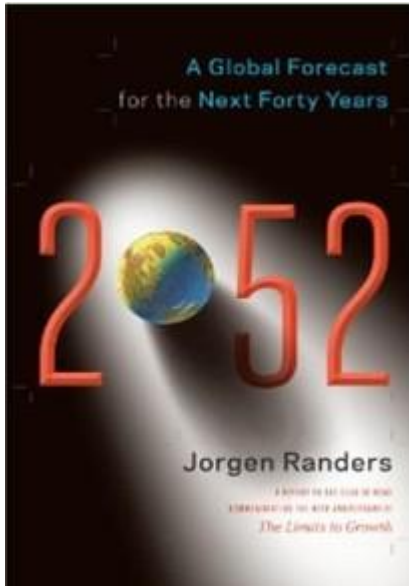
## 新书架(四)

**【编者按】**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也迅速上升,在许多国际事务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各种关于中国与各国、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讨论也愈发激烈。或有追溯中美关系的过去,或有探知未来中国的世界地位,或有研讨中国与当今的国际新秩序,等等。本期新书架以此为主题,介绍一些近两年来的相关书籍,以飨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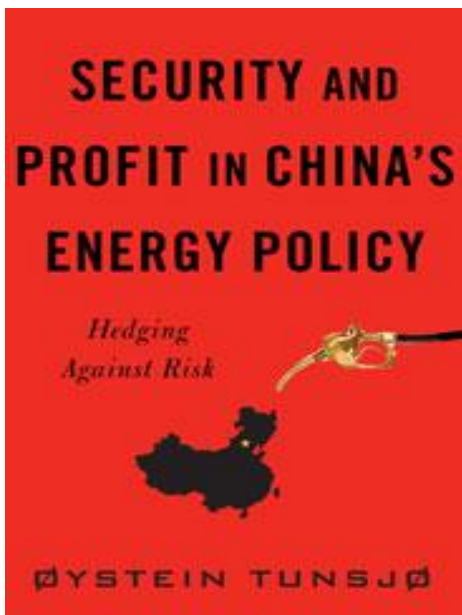
埃里克·杰·多林:《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航海时代奇异的中美关系史》,李佛莱特出版社,2013年。(Eric Jay Dolin, *When America First Met China: An Exotic History of Tea, Drugs, and Money in the Age of Sail*, Liveright, 2013.)

本书从第一艘抵达中国广州的美国船说起,从关注独立之初的美国热衷对晚清帝国茶、丝绸、瓷器以及鸦片贸易开始,描绘了诸多中美关系历史趣闻:在蒸汽船兴起之前的航海时代,美国商人乘船在南太平洋寻找檀木、海豹皮等,在美国西北部的太平洋沿岸寻找皮草、海参等中国人喜爱的商品,与中国贸易;在鸦片战争中,美国适时退出鸦片贸易,遵循清朝约束,并在中英关系恶化时期,充当中间商人,并与英国积极竞争;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美国不满中国的贸易“壁垒”,伙同英法,武力攻打中国;美国商人染指华工“苦力”输入拉丁美洲的苦难,同时,华工在美国大陆铁路贯通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等等。书中涉及的历史人物众多,皆形象鲜明,如中国的乾隆、道光等皇帝,林则徐、关天培等官员,义律、琦善等来华的英国大员,浩官等中国商人,美国的华盛顿总统,著名的驻华公使以及莫里斯等一大批来华贸易的美国巨商,此外还有南太平洋岛国国王、广州的地方官吏、流落美国的中国人等或著名或无名的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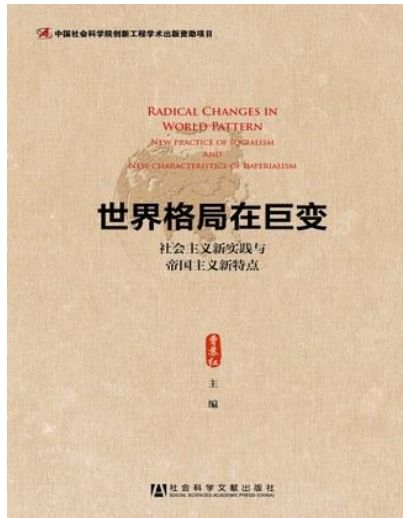
乔根·兰德斯:《2052: 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 切尔西绿色出版公司, 2013年。(Jorgen Randers, *2052: A Global Forecast for the Next Forty Years*, Chelsea Green Publishing Co., 2013.)

在未来四十年中, 人口数量将会达到多少? 地球是否能承受得了这么多人的生存需求? 下一代人是否愿意为这一代人的养老与债务买单? 气候与环境会不会一直恶化下去? 西方式的民主能否解决人类面对的巨大问题? 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将如何过渡给中国? 本书作者聚合了全球顶尖的科学家、经济学家与未来学研究者, 就经济、能源、自然资源、气候、食品、城市化、养老金等问题, 对未来四十年进行了趋势预测。好消息是, 在能源效率方面我们将看到深刻的进步, 我们会更多地关注人类福祉而不是人均收入的增长; 但变化也许并不会如我们期望的一样发生: 最贫穷的20亿人口仍然生活在穷困当中, 失去控制的全球变暖也是可能出现的。那么, 我们该如何为未来做好准备? 兰德斯将我们导向一条通往未来的现实之路, 讨论我们可以为自己以及子孙们的更美好的未来做些什么。



[挪威]奥伊斯坦·唐斯尤:《中国的能源政策: 安全与利益对冲风险》, 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2013年。(Øystein Tunsjø, *Security and Profit in China's Energy Policy: Hedging Against Risk*,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本书综合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的国内外及海陆能源战略和政策, 并建立了一个用于研究国家安全和利益两者间关系的全新理论框架。书中主要探讨政府对国家安全的担忧与能源集团对利益的索求两方面, 并讨论这两者间关系对中国能源政策的重要性。通过分析了威胁与风险、和平时期与战争事件、管道和海上能源供应路线等因素之间的重要区别, 作者全面地从安全问题谈到保证能源的稳定供给, 从控制管理能源资源讲到拓展海上交通线。综合来看, 本书的数据及分析可以说是目前为止对中国如何解决能源与利益间对冲问题的最为详实而准确的。



曹苏红主编：《世界格局在巨变：社会主义新实践与帝国主义新特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2008年肇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至今仍在深化，当今的资本主义已经加剧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生产无限扩张与社会有限需求之间这一基本矛盾，加剧了世界范围内收入和财产占有的贫富两极分化，加剧了贫困和失业等一系列社会矛盾，它还会有未来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实践所取得的成就、拉美国家左翼运动的发展和“21世纪社会主义”的提出与进展，是否预示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本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和分析，反映了这一领域的最新思考和动态。

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和分析，反映了这一领域的最新思考和动态。



刘鸣、刘阿明、崔荣伟编：《国际秩序中的中国与新兴国家：领导作用、制度建构与身份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21世纪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大调整的时代，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是这个时代最具标志性的事件，以2008年全球性的经济金融危机为契机，新兴国家加强了彼此之间的协调，以统一的行动和团结的声音，积极参与相关国际问题的治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成为崛起中的新兴国家的典型代表。本书就如何看待新兴国家的身份、角色与作用，如何处理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定位新兴国家与全球治理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中国与新兴国家和国际秩序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给当下的中国以有益的启示。

新兴国家和国际秩序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给当下的中国以有益的启示。

[责任编辑：李 澍]

[校对编辑：赵 政]



## ♣学术交流♣

## 委内瑞拉总统顾问庞塞莱昂受聘南开大学客座教授

(通讯员:姚丽丽)9月21日,委内瑞拉总统顾问特米尔·博拉斯·庞塞莱昂先生(Dr. Temir Porras Ponceleon)客座教授致聘仪式在行政楼111室举行,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薛进文出席,副校长关乃佳主持。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吴志成、南开大学客座教授高大伟、国际学术交流处的相关负责人列席。本次活动由南开大学国际学术交流处、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主办。



受聘仪式伊始,南开大学客座教授高大伟向大家介绍了庞塞莱昂先生。庞塞莱昂先生是一名国际关系学者,曾任大学校长、委内瑞拉教育部副部长、外交部部长办公室主任、外交部副部长等职,现为总统特别顾问,委内瑞拉国家开发银行行长。薛进文书记向庞塞莱昂先生致送南开大学客座教授聘书并佩戴南开校徽。

受聘仪式结束后,庞塞莱昂先生带来了题为“中国与拉美关系展望”的讲座。首先,他简要介绍了委内瑞拉的历史和现状,委内瑞拉作为一个年轻的拉丁美洲的国家,曾是美洲国家独立革命时期的先驱和中心力量,自19世纪以来一直在拉丁美洲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委内瑞拉在塑造自身国家身份的同时积极推动拉丁美洲一体化。接着,在中国和拉丁美洲的关系方面,他认为现在中国无论是政治实力还是经济实力都不断上升,国际地位提高,拉丁美洲人民对此大多表示欢迎,也十分愿意与中国建立良好合作关系。在中委关系方面,在他看来,两国在石油领域的合作就是互利共赢的典范。最后,他表示,在最近的十几年里中委两国的合作呈不断上升趋势。加强彼此在国际关系舞台上的合作、增进双方人民的交流十分必要。

演讲完毕后,在互动提问环节,庞塞莱昂先生关于委内瑞拉石油定价问题、委内瑞拉与玻利维亚关系等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他幽默的言语和热情的笑容让大家印象深刻,赢得了阵阵掌声。本次活动在如潮的掌声中落下了帷幕。

## 中外学者研讨周恩来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和世界

### ——第四届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举行

(转自南开新闻网)今年是周恩来总理诞辰115周年,为缅怀他的丰功伟绩,学习他的思想风范,进一步推动国内外周恩来研究学术交流,第四届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10月22日在南开大学隆重开幕。



此次研讨会主题是“周恩来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和世界”，由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和南开大学共同主办，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周恩来研究中心承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中共

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多名专家、周恩来亲属、我校多位领导以及论文入选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来自俄罗斯、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出席。

开幕式上，薛进文代表南开大学对中外来宾表示热烈欢迎。陈晋在致辞中说，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是中国大陆和海外学者交流、展示周恩来研究成果的重要学术平台。周恩来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金冲及、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主任弗拉基米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丁·理夫林等中外学者作了关于周恩来研究最新成果的主题报告。

本届研讨会为期两天，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周恩来综合评价及其思想和早期研究”、“周恩来与中国政治曲折发展研究”、“周恩来与中国各项建设事业研究”、“周恩来与中外关系和对外贸易研究”等专题进行深入的学术交流研讨。

据了解，首届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是南开大学为纪念周恩来诞辰90周年于1988年10月召开的，此后十年一届，已连续举办三届，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在各方建议和支持下，研讨会从本届开始改为五年举办一次。经过一年的论文征集，大会共收到中外学者提交的论文200余篇，各方专家认真评阅后，最终确定129篇论文入选，其中中国大陆学者论文107篇，港台地区和国外学者论文22篇。这些论文，反映了当前国内外周恩来研究的最新成果。

## 俄著名学者做客周恩来论坛

(通讯员:李金潼)10月23日,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远东事务》(Far Eastern Affairs)主编弗拉基米尔·波特雅科夫(Vladimir Portyakov)教授做客“周恩来论坛”,给南开师生带来一场题为“俄罗斯的中国对外关系与对外政策研究”的精彩讲座。讲座由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孙涛教授主持。

波特雅科夫教授首先回顾了从中苏关系到新时期中俄关系的友好传统,认为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在地区事务中开始扮演越来越积极的角色,影响力超越东亚的地域限制,成为世界舞台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其他国家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即反对霸权主义、经济合作以及文化和人员往来。

波特雅科夫指出,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俄罗斯学者主要围绕中国的经济发展进行研究,而随着2005年后越来越多研究中国对外政策机构的建立,俄罗斯对中国对外关系与对外政策的研究领域更加广泛,包括中国的经济外交、联合国外交、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议、



软实力以及中国的“伙伴关系政策”、“睦邻友好政策”、“反恐政策”等。他认为中俄双方在众多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所具有的共同利益是两国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事务中进行广泛合作的重要基础。

在最后的互动环节,波特雅科夫与在场师生就俄罗斯如何看待中国更加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中国如何扮演“负责任大国”的角色、“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叙利亚问题及斯诺登事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 十大学者纵论世界大势与国际热点

(通讯员:李金潼)10月26日,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吉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十位知名学者齐聚南开,做客“周恩来论坛”,纵论世界大势与国际热点,为南开师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生动的高水平学术报告。论坛由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吴志成主持,百余位师生参加。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陈志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袁鹏、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史志钦、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李文、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刘德斌、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蔡

拓、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门洪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军、天津师范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王存刚等作为主讲嘉宾分别演讲。

各位专家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形势总体下行,美欧发达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面临不同程度的困难,而中国较为有效地应对了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有了显著提升。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外交已成为观察国际形势的



重要自变量。特别是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中国把握世界大势和发展机遇,在坚持和平发展战略的同时,增加外交主动性,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扩大和深化区域合作机制,稳定了外交大局,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了积极有利的国际和周边环境。大家认为,对自身的清晰定位是制定中国发展战略的前提。作为负责任的新兴发展中大国,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到国际公共产品供应的实践中,并努力提供更多与国际接轨的价值理念,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互动环节,各位嘉宾与在场师生就中国的外交战略、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周边外交工作、成熟的大国心态、人民币国际化、当前全球治理的特点及评估等诸多理论和现实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 国际学科前沿研究高峰论坛南开举行

(转自南开新闻网)10月2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协同创新中心、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共同主办的国际学科前沿研究高峰论坛在南开大学省身楼举行。南开大学副校长佟家栋、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王利民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来自中国社科院、国家发改委、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等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众多知名国际问题研究专家参加研讨。



佟家栋在致辞中代表南开大学对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各位嘉宾莅临南开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当前,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深入推进,全球失衡、金融危机、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全球重大问题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从而对世界的经济均衡发展

与全球治理合理变革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对国际问题的研究也不断提出新课题。本次论坛在这样的背景下举行,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学术界对国际问题的研究,从而为推动中国经济崛起与国际话语权提高、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重要贡献。

王利民表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愿与全国学者和同行共同努力,共同担当振兴、繁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学科建设的重任,共同呵护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此次论坛就是为了试图打造一个国际问题研究和国际学科建设领先平台的尝试,希望通过这次论坛的研讨,对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开放提供有益的借鉴,希望论坛能一届一届地办下去,成为一个出人才、出成果、出思想的摇篮,为促进中国更好地认识世界、促进世界更好地认

识中国作出努力。

本次论坛主题为“全球发展、国际合作与中国角色”。开幕式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教授、南开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盛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中国进出口银行经济研究部总经理代鹏教授分别作主题演讲。当天下午，论坛分“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国际经济”两大主题，各举行两场同步高端圆桌论坛。

在分论坛中，与会专家学者就新时期全球化与国际合作新趋势、国际经济治理秩序变革、中国对外开放转型、新时期大国关系等内容展开深入交流。

## 南开大学客座教授高大伟先生讲座

### 暨第七届公立大学国际研讨会年度会议

(通讯员：姚丽丽) 10月28日，第七届公立大学国际研讨会年度会议(The 7th Annual Meeting of International Forum of Public Universities)在南开大学省身楼一楼报告厅举行。南开大学客座教授高大伟先生(David Gusset)在会议上发表了主题演讲“中国的崛起和对世界的影响”。南开大学副校长关乃佳以及多位外国学者出席本次会议。

在40分钟的讲座中，高大伟教授主要从四个方面介绍了他对中国崛起以及对世界影响的想法。首先，关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高教授指出，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率从原来的2%增长到12%，近些年持续维持在7%以上，因此他估计至2020年左右，中国经济总量将成为世界第一。其次，高教授谈到了中国的政治转型，在他看来，中俄之间有很大不同，中国很可能走出一套自己的政治模式，对此他也表示十分期待。再者，高教授谈到，虽然当下中国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大，但主流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他以在中国街巷遍布的茶馆与随处可见的麦当劳、肯德基并存的现象来举例说明。在他看来，中国人正在积极构建自己的价值观，如和谐社会。最后，他表示，不仅世界越来越关注中国，中国也正积极地走向世界，比如中国的物品、人员、技术、文化等正在不断地在世界范围内流动。高教授表示他十分关心中国的未来。由于当下世界处于巨大变化之中，全球问题不断增多，各国相互依存，彼此交流是必须的。中国的崛起必将影响世界，但这些影响并不总是消极的。

在主题演讲之后的互动环节，高教授对于与会外国学者提出的中国在崛起中将面临怎样的难题、中非关系与中拉关系如何平衡等问题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回答。

最后高教授幽默地借着南开著名校友周总理的话，以“我也是爱南开的”为其演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整场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了帷幕。

高大伟，法国人，中欧论坛创始人，国际关系著名学者，汉学家，南开大学客座教授，“中美欧建设性三角”的提出者。

## 朝鲜高级代表团做客南开

(通讯员:姚丽丽)11月18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高级代表团做客南开,并在省身楼206会议室与我校多位学者开展座谈。本次座谈会由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赵龙跃教授主持,来自朝鲜国家经济开发委员会的代表团成员,以及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经济学院、法学院的师生参加了此次会议。

座谈会伊始,代表团播放了介绍朝鲜国家经济开发委员会的相关视频,随后,朝鲜国家经济开发委员会局长、高级代表团团长桂松男(Kye Song Nam)先生做了题为“朝鲜经济开发区的现状与前景”的演讲。在演讲中,他首先介绍了朝鲜的对外经济政策。他提到,朝鲜国家经济开发委员会于今年3月刚建立,就受到朝鲜国内外各方的重视。接着,他详细介绍了当前的朝鲜经济开发区项目。据了解,当下朝鲜有13个城市正在建设经济开发区,不同开发区拥有不同主题,如工业、旅游、高新技术等。而且,关于经济开发区的相关法律法规等已相继出台,细致的执行条例也将进一步确定下来。比如,黄金坪开发区根据中朝两国最高领导人于2010年10月达成的协议建立,并组建了专门的指导委员会,是中朝之间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开发、共同管理的项目。在建设过程中,虽然存在缺乏资金、基础设施有待完善等问题,但他表示朝方对此项目高度重视,相信在中朝两国“政府指导、市场运营、互赢互利”的原则指导下,该开发区必将取得巨大建设成果。在演讲的最后,桂团长表示,中国在建设经济开发区方面积累了较多经验,值得朝鲜学习,朝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也将借鉴中国的一些有益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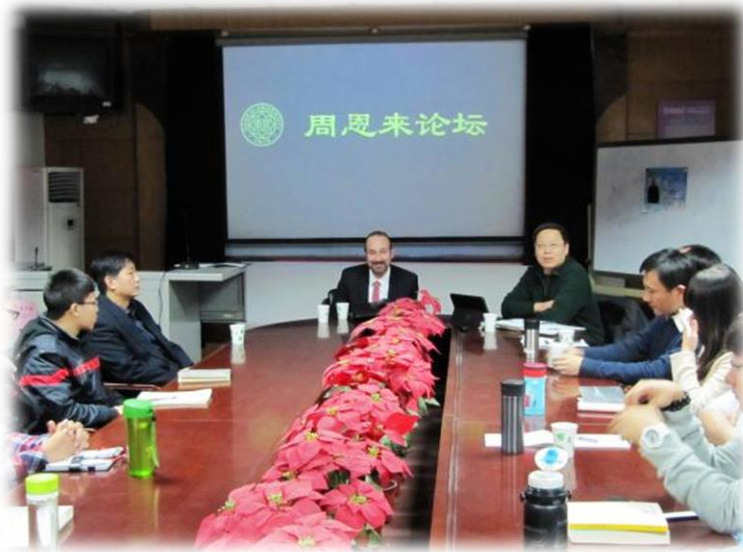
演讲结束后进入了互动环节,双方关于朝鲜上世纪90年代第一个经济开发区与2013年朝鲜国家经济开发委员会成立后建立的经济开发区之间的区别、朝鲜在建设经济开发区过程中的税制改革及招标投标法的有关规定、朝鲜国内民众如何看待此次改革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而坦诚的交流。

最后,赵教授做了总结发言,他表示,“可以看到,此次的朝鲜代表团不仅是一支高级别的代表团,同时也是一支青年代表团,大多成员都是‘80后’。从他们的言语和学识中,我们看到了朝鲜的美好未来。”的确,中朝两国有着深厚友谊,我们祝福朝鲜经济开发区项目顺利进行,也相信这必将惠及更多中朝两国民众。

## 兰德尔·施韦勒做客周恩来论坛

(通讯员:刘志)2013年11月28日,知名国际关系理论家、新古典现实主义开创者、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做客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周恩来论坛”,给南开师生带来一场题为“新千年的全球失序”的精彩演讲。论坛由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主任韩召颖教授主持,来自南开大学多个院系的60余位师生参加。

施韦勒教授的演讲围绕其即将出版的《麦克斯韦妖与金苹果——新千年的全球失序》一书的内容展开,他将热力学中的“熵”(entropy)引入国际关系领域,用以比喻当代国际政



治转型和世界秩序变迁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失序、混乱和不确定现象。他认为，当今国际体系的结构以全球权力扩散为特征，世界正在经历一场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从西方到东方的权力转移；而国际体系的进程中表现为信息过量和难以处理。施韦勒指出，随着系统中的“熵”

逐渐增多，国际体系的未来既不会简单的回到过去，也不会走向线性的进化，而是表现出更多的失序和功能失调，国家间围绕着地位、威望和权力展开的竞争也会加剧。

在富有激情的演讲之后，施韦勒教授在互动环节与现场师生就中国崛起、国际法的作用与国际制度的效力、国际关系研究的预测性、中美关系的前景以及国际关系理论是否终结等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 《人民日报》国际部副主任章念生做客周恩来论坛

(通讯员：李金潼) 2013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国际部副主任、高级编辑章念生做客“周恩来论坛”，给南开师生带来一场题为“国际热点背后的游说博弈”的精彩讲座。讲座由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吴志成教授主持，政府学院部分师生参加。

章念生首先从近期伊朗核问题等国际热点问题切入，认为这些重大热点问题背后往往隐藏着容易被人忽视的游说机构的身影，它们是国际问题博弈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他指出美欧



日等发达国家多年来都存在数量庞大的游说机构，它们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对超国家、国家等行为体的决策过程施加影响。在他看来，游说机构大致可以分为官方代表团、公关公司、律

师事务所、私人咨询机构、个人等类型，这些机构根据自身偏好活跃在不同的问题领域。

随后，章念生从自身工作实践出发，重点对驻欧盟总部布鲁塞尔的游说机构进行了介绍



和分析。他指出欧盟总部所在地仅登记在册的各类游说人员超过了1.5万,它们通过参加研讨会、访谈、提供咨询服务等途径对欧盟的决策发挥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他认为欧盟每年出台很多行业标准、欧盟希望得到外界的反馈、彼此的利益需要等使得当地的游说力量不断壮大,甚至形成了高市场价值的“游说产业”。

此外,他结合近年来中欧纺织品贸易摩擦、光伏产品贸易争端等案例进行分析,表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特别是经济影响力的显著提升,中国企业“走出去”日益增多,但中国的游说力量却较为薄弱,如何凭借不同类型游说机构的力量以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企业发展利益,无疑是中国政府与企业需要积极探索、有效应对的重要问题。

在互动中,章念生与在场师生就中国在欧盟的游说力量、中国国际话语权、中国政府和企业对外交往的方式、国际媒体工作者的职业要求与挑战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章念生,人民日报国际部副主任,高级编辑。曾长期担任人民日报驻北欧记者、驻比利时首席记者,专访过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北约秘书长夏侯雅伯和北欧5国、荷兰、斯洛伐克等国政府首脑。

## ♣师生活动♣

### 《新视界》编辑部成功进行换届选举

(通讯员:刘志)9月30日晚6点半,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新视界》编辑部在范孙楼116成功进行了换届选举。2010级本科生吕海当选为新一任主编,2011级本科生刘芮宁、郭晓琼和王宝盆当选为新的副主编。换届大会由上任主编姜忆楠主持,系刊部分成员以及新加入的实习生参加。



换届大会首先由上任主编、2013级硕士生姜忆楠对上一届编委的工作进行了回顾。他指出,在过去一年中,上一届编委带领《新视界》编辑成员开展了众多活动。包括成功完成了四辑系刊的出版工作,新成员招收培训工作,国际关系系讲

座、论坛等其他活动的组织采访工作等。他对这一届成员的付出表示了感谢,并提出了几点希望,祝愿《新视界》越办越好!

第二项是选举主编。本次候选人只有吕海一人,他首先做了自我介绍,之后又对《新视界》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自己如果成为新任主编后的改进建议与工作计划。他认为新一届编辑组应当在以下两方面做出改进:一是进一步加强宣传,特别是网络宣传工

作；二是应当将编辑责任落实到个人。竞选演讲结束后，编辑部成员采用了无记名投票和电话投票的方式进行了选举。最后，吕海全票当选为新一任主编。

第三项是选举副主编。本次选举共选举三位新的副主编，11级本科生于凯玥、郭晓琼、刘芮宁、王宝盆和赵姝婧五位同学参与了选举。他们依次做了竞选演说，阐述了自己对《新视界》的认识，提出了未来的工作计划。演讲结束后，编辑部成员采用了无记名投票和电话投票的方式进行了选举。投票结果是刘芮宁、郭晓琼和王宝盆补选为新任副主编。目前，《新视界》编辑部共有六名副主编，分别是曹滢、郝丽君、沈琳、刘芮宁、郭晓琼和王宝盆。

在选出新一届的主编、副主编后，大家也纷纷发表对系刊未来建设的意见。相信《新视界》一定会在大家的努力下越来越好！

## “国际谈判与国际经济谈判”专题研修班在南开大学举办

(转自南开新闻网)10月20-24日，由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与南开大学联合发起，南开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复合人才高级研修项目”——“国际谈判与国际经济谈判”专题研修班在我校举行。

参加本期研修班的学员由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外交学院、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工业大学、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等高等院校的青年学子，国家有关科研机构的青年学者，以及财政部、商务部和环境保护部等国家机关的公务员40余人组成。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孙振宇和南开大学副校长佟家栋出席研修班的开幕式并致辞。财政部国际司司长邹加怡、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副司长李克新和商务部国际经贸关系司

副司长孙元江出席了开幕式，并分别从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与实践、实施经济外交战略和推进双边、区域和多边贸易协定的角度，为研修班学员做了全面系统的专题报告。与会的领导和专家对于启动“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复合人才



高级研修项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正当其时，非常重要。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复合人才高级研修项目”高级研修班的课程设置，将涵盖全球经济治理所涉及的政治、外交、经贸和法律等多个学科领域，以及当今国际管理机制发展演变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课程将采取专题模块形式，分为若干个单元，每个单元相对独立、滚动开发、逐渐完善。培训的重点将集中在熟悉国际管理知识、把握国际发展趋势、强化战略



布局能力、树立全球领导意识四个方面。

据悉,今年4月,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与南开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启动“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复合人才高级研修项目”,目的就是希望在当前我国对外开放发展的新需求下,通过该项目为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培养懂经济、外交、法律的综合性和复合性的高端人才,并为我国参与国际经济组织的改革与管理,培养输送高级专业技术人才,从行动上为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全球经济治理做好知识和人才的储备工作。

##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开题

(转自南开新闻网)10月26日,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践探索研究”开题讨论会在明珠园二楼会议室举行。南开大学副校长朱光磊教授和来自校内外多位专家学者、课题组成员和社科处相关负责人出席。



讨论会上,朱光磊副校长首先对各位校外同行专家的莅临指导表示感谢,并向课题组成员成功申报该项目表示祝贺。随后,课题首席专家、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主任韩召颖教授代表课题组向参加会议的专家们汇报了课题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总体框架与思路、

研究的主要问题和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计划以及各子课题的主要研究任务等。

在听取开题汇报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陈志敏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袁鹏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李文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蔡拓教授、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刘德斌教授、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门洪华教授、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李少军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副主编袁正清研究员、天津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存刚教授以及来自校内历史学院、日本研究院的各位专家进行了讨论和评议。各位专家认为,该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开题报告论证充分,逻辑清晰,并对课题的总体设计和研究进程的安排给予了充分肯定。入会专家们还就课题涉及到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了讨论,为课题进一步研究提出了众多启发性的意见和指导性的建议。

社科处负责人高度评价了开题会议所进行的热议讨论,要求课题组抓住重点,在有限时间内按时、高质量地完成任务,并表示学校社科处会在各方面提供支持,为课题组在研究过程中提供服务。

## 《新视界》编辑部与 2013 级国际政治本科班 交流会成功举办

(通讯员: 郭晓琼) 11 月 12 日晚 7 点,《新视界》编辑部与 2013 级国际政治本科班交流会在南开大学迎水道校区 118 教室成功举办。编辑部成员向 2013 级本科同学介绍了《新视界》的基本情况,并与同学们就大学学习、生活及人生规划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深入的交流。

首先,《新视界》现任主编吕海向在场同学介绍了《新视界》的历史和定位,并对栏目的基本情况及每一个栏目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说明。他以《新视界》2013 年秋季号为例,向一年级同学推介了“迎新特辑”、“他山之石”、“科研简报”等栏目,希望为同学们进一步了解南开、了解国际关系系及国际关系专业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发。

接着,国际关系系博士生李金潼、硕士生董柞壮及本科生郝丽君、刘志等同学分别就自己在南开园生活的感受、对大学学习的体会、对国际关系专业的认识和在《新视界》编辑部的收获等与在场同学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他们表示,大家从五湖四海来到南开学习是难得的缘分,希望大家珍视南开的平台,充分利用南开的资源丰富自己、提高自己。他们认为,从本科阶段应该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学习好专业知识的同时,广泛涉猎感兴趣的领域,开拓自己的视野。具体到专业学习而言,他们认为要想学好国际关系并不比学习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容易,国际关系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征,建议大家在学好本学科专业必修科目的同时,也不能放松对数学、英语、计算机科学等公共科目的学习。此外,他们以自己的经历向在场同学介绍了在《新视界》编辑部的收获,并期待感兴趣的同学通过进一步了解能加入到编辑部的团队中。

在互动环节,高年级的代表与一年级的同学就大学生活和未来规划、专业学习和论文写作、编辑技巧及时间管理等具体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

## 《新视界》编辑部内部培训会顺利召开

(通讯员: 姚丽丽 摄影: 吕海) 11 月 30 日下午 2 点,《新视界》编辑部内部培训会在范孙楼 116 会议室举行,本次培训会的主题是“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会议由主编吕海主持,国际关系系 2013 级博士生李金潼和硕士生董柞壮在会上与同学们分享了学习与写作的体会,包括国际关系系 2013 级新生在内的部分同学参加了此次培训。



培训会伊始,吕海向同学们介绍了此次培训会的主要内容和大体流程。接着,董柞壮同学首先分享了关于文献检索的经验与技巧,从期刊、电子图书、常用数据库三个方面为大家进行了详细讲解。具体而言,在期刊检索方面,主要介绍了如何通过中国知网(CNKI)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数据库(NSSD)检索中文文献,以及如何通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谷歌学术搜索、剑桥期刊数据库等检索英文文献;在电子图书检索方面,他讲述了如何利用学校图书馆的电子书资源、新浪爱问共享资料、人大经济论坛等平台查找相关资料;在国际关系常用数据库方面,他介绍了战争相关因素(COW)、联盟条约与义务条款数据库(ATOP)等数据库的大致情况。之后,李金潼和大家分享>NoteExpress的使用方法,它是一个文献管理软件,能够方便我们管理文献资料,并为我们解决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插入注释、参考文献等技术性问题提供便利。

培训会的第二项是关于论文写作的探讨。董柞壮同学结合自身经历谈了几点诚恳的建议。首先,写文章需要有如唐世平老师所言“与口号型文章决裂”的勇气和信念,注重文章的学理价值和实际价值;其次,写文章最好根据自我兴趣发现问题,然后带着问题写作;最后,提高写作水平没有捷径可走,只能从模仿优秀文章开始,掌握了论文写作的一般规范后再逐步尝试有所创新。做学问需要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性子。

此次培训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内容十分丰富,在座的同学纷纷表示获益匪浅,并期待以后能举办更多类似的培训会。

## ♣校外短讯♣

###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与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于2013年11月2日至3日共同举办了主题为“超越地缘政治:建立中美关系新框架”的学术研讨会。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达特茅斯学院、乔治敦大学等多所中外高等学府的20多名国际关系学者就中国崛起背景下的中美关系进行了精彩而深入的学术研讨。

●2013年10月26日,清华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与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国际关系与国际组织学系在清华紫光国际会议中心联合举办“中欧关系中的误解”研讨会。

●2013年10月23日,由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办,王雪莲教育基金会赞

助的以“非洲的整合与联盟”(African Integration and Unification)为主题的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召开。会场实际到场人数超过50人,来自多国使馆的外交人员也参与了会议。

### 复旦大学

●2013年9月21日以刘建军教授为首席专家的2013年度国家重大社科项目“资本-福利-信息时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困境与历史局限研究”在复旦大学举办了正式的开题论证会。此次论证会汇集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各个领域的几十位著名专家学者。

### 北京大学

●2013年10月24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组织院内外专家与由孔鲁明前外长、文正仁教授为团长

的韩国东亚基金会代表团就中韩关系进行对话。此次研讨会分为政治安全关系、经贸关系及社会文化关系三个议题。中国和韩国三十多位知名专家学者与会。

### 中国人民大学

●2013年7月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协办,中国17家国际问题教学与研究机构发起的“中国国际问题论坛2013:中国外交新动向”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此届论坛以“中国外交新动向”为主题,旨在探讨新一届领导集体执政以来中国外交的新动向。来自中共中央外办、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复旦大

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国际关系学院、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北京社会科学院外国问题研究所、以及美国密西西比大学、美国杰普曼大学、欧洲学院、荷兰Leiden University、VU University Amsterdam等国内外20余家单位的50多位国际问题专家参加本届论坛。

[整理:姚丽丽、于凯玥]

[责任编辑:郭晓琼]

[校对编辑:张晓康]

### ..... 国际机制 .....

**国际机制**是指在国际关系特定问题领域里,由行为体愿望汇聚而成的一整套明示或暗含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原则是指对事实、因果关系和诚实的信仰;规范是指以权利和义务方式确立的行为标准;规则是指对行动的专门规定和禁止;决策程序是指流行的决定和执行集体选择政策的习惯。

资料来源:Stephen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1982.

[整理:马焱粮、赵政、任娟、姜忆楠]

## 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科研简报

(2013年9月——2013年12月)

**1. 吴志成、王杨：《第四章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反一体化》，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集刊》2013年第1期。**

**导言：**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演进，反对、抵制一体化的思想与行动一直此起彼伏，反一体化伴随着一体化进程的始终。“反一体化”活动主要在国家、政党和民众三个层次上展开，遍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其动因主要在于一体化进程对利益的重新分配所引发的复杂利益冲突和传统主权观、民族主义思想与一体化现实之间产生的尖锐对立。“反一体化”对一体化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它是一体化前进的阻力，另一方面又对一体化的发展产生了建设性的影响，使一体化能够相对稳定地向前迈进。反一体化将长期存在，并在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发展中继续发挥自身的作用。

**关键词：**一体化；反一体化；欧洲

**作者简介：**吴志成，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欧洲一体化与欧洲治理；王杨，高等教育出版社编辑。

**2. 杨娜：《第二章 欧盟的全球治理战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集刊》2013年第1期。**

**导言：**在有效推进区域治理和积极应对全球化的进程中，欧盟也在不断构建和完善自己的全球治理战略。欧盟支持并参与国际机制的非根本性改革，以整体身份谋求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权和话语权，提高集体军事行动能力，通过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担当全球公益领域治理的主导。欧盟的全球治理战略表现出包容与排外相混合、有效多边主义、关注全球公益、推广欧盟式民主等特点，但在实施过程中，也面临着决策效率低、行动能力差、内部立场不统一等诸多制约。

**关键词：**欧盟；全球治理战略；全球化；国际机制；多边主义

**作者简介：**杨娜，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治理、欧洲治理、欧洲一体化、金砖机制。

**3. 刘丰：《中国周边战略的目标、手段及其匹配》，载《当代亚太》2013年第5期。**

**内容摘要：**在中国崛起进程中，周边环境和态势对中国实力的增长与国家利益的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与其他大国以及周边国家之间的互动制约着中国崛起的平稳性与持续性。中国需要根据自身的总体国际战略制定相应的周边战略，塑造有利的周边环境，与周边国家

建立友好而稳定的双边或多边关系,以保障自身利益在周边区域得到实现。由于战略目标的多重性和手段的多样性,“目标——手段不匹配”通常是影响战略决策和执行的难题。在周边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为了缓解这一难题,中国需要确定周边战略目标的优先次序,保证资源投入以及手段运用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加强国内的资源分配和部门协调,并尽可能争取外部力量的支持,从而保证战略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 中国崛起; 周边战略; 目标——手段匹配

**作者简介:** 刘丰,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安全、东亚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研究。

#### 4. 刘丰:《新的国际体系下中国的地位和作用》,载《国际经济评论》2013年第6期。

**内容摘要:** 当今国际体系呈现出总体延续和加速变迁的特征,国际体系的总体特征及其发展趋势为中国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设定了基本环境和约束条件,而中国的持久快速发展已成为国际力量对比走向均衡的强劲动力。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是国际体系调整的起点,会带动国际利益格局及国际规范的变化。在国际体系的持续调整过程中,为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改革,中国需要稳步提升综合实力,借重发展中国家的力量争取平等权益,根据自身能力参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并且带动美国与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关键词:** 国际体系; 国际秩序; 和平转型; 中国角色

**作者简介:** 刘丰,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安全、东亚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研究。

#### 5. 刘丰:《联合阵线与美国军事干涉》,载《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6期。

**内容摘要:** 作为国际体系中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是冷战后海外用兵最为频繁、进行军事干涉行动次数最多的国家。研究者们通常认为,美国的军事干涉在决策和实施上具有很强的单边主义色彩,其突出特征是动辄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在决定使用武力时一意孤行,时常将自身意志凌驾于联合国和国际法之上。通过考察冷战后美国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等重大军事干涉行动中的选择可以发现,尽管美国在使用武力的决策上较少受到国际社会的有效约束,但它在军事干涉行动中既不是纯粹依靠自身力量单干,也不是依靠其缔造的多边或双边军事同盟,而是经常性地采取联合阵线的方式执行军事打击和战后维稳行动。联合阵线的目标确定性及其手段灵活性为美国主导军事干涉行动提供了便利,而规避集体行动的困境、让伙伴承担军事行动的负担、为干涉行动寻找合法性以及减少美国的投入和损失等考量,也使得美国具有招募多国参与其军事行动的强烈动机。由于当前国际体系结构的制约,不少国家倾向于加入美国的军事干涉联合阵线,以便在美国主导的等级体系中获取安全保障和经济利益。



**关键词:** 联合阵线; 联盟; 军事干涉

作者简介: 刘丰, 男,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安全、东亚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研究。

**6. 杨娜、庞强、吴志成:《中东欧国家的国际关系研究评析》, 载《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9期。**

**内容摘要:** 冷战结束后, 中东欧国家的国际关系研究逐渐摆脱苏联理论框架的影响, 从政治学学科中分离出来发展成为独立学科。中东欧国家的国际关系研究多为描述性成果, 采用实证研究方法, 重点关注国际关系社会学、外交政策、地缘政治学等研究领域, 但其发展也受到政治权力干预学术、理论基础缺乏、学科规模小、国际化程度不高、学术标准低等诸多因素的制约。

**关键词:** 中东欧; 国际关系社会学; 地缘政治; 外交政策; 欧洲研究

作者简介: 杨娜, 女,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治理、欧洲治理、欧洲一体化、金砖机制; 庞强, 男,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10级本科生; 吴志成, 男,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教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欧洲一体化与欧洲治理。

**7. 吴志成、何睿:《国家有限权力与全球有效治理》,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2期。**

**内容摘要:** 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和全球问题的日益凸显,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但是全球有效治理并未自动生成, 更非当今世界现实。在全球治理中, 国家的角色是矛盾的, 它既是最核心的治理主体, 也被视为充满问题的治理对象。全球治理有赖于国家为其提供合法性与执行力, 然而权力的局限又迫使国家寻求更有效的方式维护自身利益。国家与治理之间相互需求的不对称, 导致国家对治理的多变态度, 并阻碍全球有效治理的实现。因此, 迫切需要探寻规范国家权力运行的治理路径, 通过重构国家利益中的自我与他者、构建新型多边合作机制、合理界定国家在多元治理中的地位、维护既有国际规制并推动其改革等, 在弥补国家权力缺失与供给不足的进程中增加国家对全球治理的需求, 引导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逐步走出低效均衡的困境。

**关键词:** 国家权力; 全球治理; 国际治理; 非国家行为体; 多边机制

作者简介: 吴志成, 男,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教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欧洲一体化与欧洲治理; 何睿, 男,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12级博士研究生。

## 国际关系中文核心期刊最新电子论文篇目信息

###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0期

1. 陈志敏:《多级世界的治理模式》,第4-23页。
2. [德]托马斯·里斯:《全球化与权力: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第24-37页。
3. 任琳:《多维度权力与网络安全治理》,第38-57页。
4. 刘建华、张学朋:《收缩与扩张:美国外交政策周期的地域主义解释》,第58-80页。
5. 朱剑:《回归马丁·怀特:革命主义思想传统再探究》,第81-95页。
6. 刘新华:《中国发展海权的战略选择》,第96-117页。
7. 顾炜:《双重结构与俄罗斯地区一体化战略》,第118-139页。
8. 韦宗友:《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再调整及其地缘战略影响》,第140-155页。

### 《当代亚太》2013年第5期

1. 刘丰:《中国周边战略目标、手段及其匹配》,第4-21页。
2. 毛维准:《国际责任的行为逻辑变迁:信任、责任与关怀》,第22-58页。
3. 曹玮:《中国公共外交的效果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对国外学者研究的批判性综述》,第59-91页。
4. 潘亚玲:《中国特色对外援助理论建构初探》,第92-110页。
5. 赵斌:《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的形成机制》,第111-138页。
6. 翁青青:《气候外交话语中的隐喻和身份构建》,第139-156页。

### 《国际观察》2013年第5期

1. 陈启懋:《对美国霸权的另一种分析》,第1-6页。
2. 俞正樑:《大国关系进入再平衡时期》,第7-13页。
3. 陈志敏:《新型大国关系的形态分析》,第14-20页。
4. 张家栋、金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历史、理论与现实》,第21-27页。
5. 左品、王丹、文少彪:《“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前沿思考”学术研讨会综述》,第28-31页。
6. 谭再文:《当代新兴大国的权力挑战与权力分享》,第32-36页。
7. 高飞:《转型中的中国国家定位与国际责任体系》,第37-43页。
8. 戴启秀:《德国当代非洲政策研究》,第44-50页。
9. 刘阿明:《南海问题的实质演变及其未来发展》,第51-57页。
10. 许慈惠、吴伟丽:《日本“文化外交战略”研究——以日本对华国际交流员项目为例》,第58-64页。
11. 王学玉、李阳:《东亚地区主义的停滞——以地区性国际社会缺失为视角的分析》,第

65-72页。

12. 杨恕、蒋海蛟:《中亚五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问题研究》,第73-79页。

###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1. 熊文驰:《“五十年危机”:战争何“必然”到来?——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片论》,第1-18页。
2. 李永成:《战略意图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第19-38页。
3. 高飞:《中国的“西进”战略与中美俄中亚博弈》,第39-50页。
4. 严怡宁:《媒介事件化的中国民族问题——对<纽约时报>2000年以来中国民族问题报道的研究》,第51-64页。
5. 牛军:《从“狐狸”到朋友:1980年代中国对“东欧五国”政策》,第65-81页。
6. 李潜虞:《试论新中国对外国驻华使馆的管理(1949—1965)》,第82-101页。
7. 白明华:《国际水法理论的演进与国际合作》,第102-112页。
8. 陈一峰:《全球治理视野下的国际组织法研究——理论动向及方法论反思》,第113-125页。
9. 唐晓:《非洲萨赫勒地区问题:国际社会的努力及挑战》,第126-141页。
10. 黄超:《理想与现实:“千年发展目标”的局限与前景》,第142-154页。
11. 凌胜利:《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第八届博士生论坛综述》,第155-156页。
12. 佟巍:《中国国际关系学会2013年理事会会议综述》,第157-158页。

### 《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9期

1. 赵宏图:《国际能源格局调整及其对气候谈判的影响》,第1-6页。
2. 吕蕊、赵建明:《韩国对苏岩礁的政策立场析评》,第7-13页。
3. 李益波:《浅析美孟关系新变化》,第14-19页。
4. 鲁林:《美国对外来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述评》,第20-124页。
5. 徐瑶:《冷战后美国亚太军事基地体系的调整及其影响》,第25-31页。
6. 余翔:《当前美国经济形势及其变化趋势》,第32-38页。
7. 王珊:《试评析安倍政权“摆脱战后体制”的外交举措》,第39-43页。
8. 熊李力、龙丝露:《日本加入TPP谈判的动机及其影响》,第44-51页。
9. 蒋丽、张小兰、徐飞彪:《国际网络安全合作的困境与出路》,第52-58页。
10. 肖文超:《中国学术界国际关系民主化研究:现状与问题》,第59-64页。

### 《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5期

1. 于洪君:《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意义与前景》,第1-9页。

2. 陈东晓:《美国经济政治生态特点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第10-22页。
3. 郭震远:《台湾问题对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影响》,第23-32页。
4. 高程:《周边环境变动对中国崛起的挑战》,第33-45页。
5. 王玉主:《RCEP倡议与东盟“中心地位”》,第46-59页。
6. 崔洪建:《欧美 TTIP: 由来、目标与影响》,第60-72页。
7. 刘作奎:《中国与中东欧合作: 问题与对策》,第73-82页。
8. 郭宪纲:《阿拉伯世界教俗之争新态势》,第83-92页。
9. 张梅:《绿色发展: 全球态势与中国的出路》,第93-102页。
10. 韩秀丽:《中国海外投资中的环境保护问题》,第103-115页。
11. 赵庆寺:《金砖国家能源合作的问题与路径》,第116-126页。
12. 曹群:《中国周边环境变化与外交应对——第一期“国研沙龙”综述》,第127-129页。
13. 郭金月:《叙利亚形势及美国军事干预前景研讨会观点综述》,第130-132页。

#### 《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2期

1. 王逸舟:《创新不干涉原则, 加大保护海外利益的力度》,第1-5页。
2. 唐永胜:《中国参与亚丁湾反海盗行动与大国责任》,第6-9页。
3. 夏莉萍:《海外中国公民安全风险与保护》,第10-16页。
4. 杨洋:《中国领事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第17-29页。
5. [德]奥利弗·布罗伊纳:《保护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中国公民——2010年撤离行动》,第30-35页。
6. [法]杜懋之:《海外公民保护与欧中安全合作》,第36-42页。
7. [挪威]舒尔·拉尔森:《危机中的领事保护——以挪威为案例》,第43-47页。
8. [法]高敬文:《海外公民的保护、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第48-52页。
9. 何奇松:《美国网络威慑理论之争》,第53-74页。
10. 李小军:《论印度核能开发的现状、挑战及前景》,第75-97页。
11. 王震:《论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以色列的核不扩散政策》,第98-116页。
12. 左凤荣:《俄罗斯的亚太新战略及其对中俄关系的影响》,第117-127页。
13. 梅然:《经济追求、相互依赖与德国在1914年的战争决定》,第128-153页。
14. 陈长伟:《台湾与越战——一场充满悖论的历史遭遇》,第154-173页。
15. 黄立志:《大领事时代——“保护海外公民: 中国与欧洲的经验与视角”研讨会侧记》,第174-184页。

#### 《美国研究》2013年第3期

1. 汪晓风:《中美关系中的网络安全问题》,第9-29页。

2. 沈逸:《美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的演进及实践》,第30-51页。
3. 岳小颖:《网络安全与澳美同盟》,第51-61页。
4. 张业亮:《美国围绕胚胎干细胞研究的道德和政治争议》,第62-88页。
5. 姬虹:《美国技术移民与人才引进机制研究》,第89-109页。
6. 王栋、李侃:《美国中国外交研究的流变:方法、议题与趋势》,第110-135页。
7. 于留振:《美国内战期间联邦政府筹措战争资金的政策》,第136-149页。
8. 王玮:《“叙利亚局势与大国博弈”研讨会综述》,第150-153页。
9. 何维保:《“中美关系中的网络安全问题”研讨会综述》,第154-158页。

### 《欧洲研究》2013年第5期

1. 孙伊然:《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治理的观念融合与竞争》,第1-21页。
2. 余南平:《后金融危机时代欧洲政党政治结构的变迁——以“经济投票”为研究视角》,第22-41页。
3. 徐刚:《欧洲新民粹主义的政治实践:一项比较研究》,第42-58页。
4. 孙彦红:《欧盟“再工业化”战略解析》,第59-76页。
5. 潘兴明:《价值观外交与利益外交的叠加——欧盟中亚战略评析》,第77-92页。
6. 张华:《欧盟法与国际法的冲突和协调——基于欧洲法院近期典型判例的诠释》,第93-110页。
7. 伍慧萍:《普遍主义的困境:从文化冲突看欧洲认同的宗教文化向度》,第111-128页。
8. 高奇琦:《比较政治分析中的概念研究》,第129-147页。
9. 姜姝:《“后危机时代的欧洲一体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第148-150页。
10. 鞠维伟:《“冷战结束以来欧洲一体化进程:回顾与展望”——中国欧洲学会欧洲一体化史分会2013年年会综述》,第151-154页。

### 《国际政治科学》2013年第3期

1. 王凯、唐世平:《安全困境与族群冲突——基于“机制+因素”的分析框架》,第1-36页。
2. 郭杨:《资源转化效率——考量军事能力的新视角》,第37-61页。
3. 谢超:《实力变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基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的分析》,第62-88页。
4. 李少丹:《国际政治中的认知转变——以美国对中国的“认知转变”为例》,第89-106页。
5. 黄智虎:《公共产品与国际合作——评〈合作的动力——为何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第107-130页。

## 国际关系英文核心期刊最新论文篇目信息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7, No. 4

1. Michael G. Findley, Daniel L. Nielson and J.C. Sharman, "Using Field Experimen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Randomized Study of Anonymous Incorporation," pp. 657-693.
2. Tanisha M. Fazal, "The Demise of Peace Treaties in Interstate War," pp. 695-724.
3. Benjamin Brake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Lost in Translation? Nonstate Actors and the Transnational Movement of Procedural Law," pp. 725-757.
4. Christina J. Schneider and Branislav L. Slantchev, "Abiding by the Vote: Between-Groups Conflict in International Collective Action," pp. 759-796.
5. Daniel J. Blake, "Thinking Ahead: Government Time Horizons and the Leg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pp. 797-827.
6. Marcus Holmes, "The Force of Face-to-Face Diplomacy: Mirror Neurons and the Problem of Intentions," pp. 829-861.
7. Stephen G. Brooks, "Economic Actors' Lobbying Influence on the Prospects for War and Peace," pp. 863-888.
8. Daniel Maliniak, Ryan Powers and Barbara F. Walter, "The Gender Citation Gap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889-922.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7, No. 4

1. Christian List and Kai Spiekermann,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and Holism in Political Science: A Reconciliation," pp. 629-643.
2. Jana Morgan and Melissa Buice, "Latin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Women in Politics: The Influence of Elite Cues, Female Advancement, and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pp. 644-662.
3. Gerald Gamm and Thad Kousser, "No Strength in Numbers: The Failure of Big-City Bills in American State Legislatures, 1880-2000," pp. 663-678.
4. Jason Lyall, Graeme Blair and Kosuke Imai, "Explaining Support for Combatants during Wartime: A Survey Experiment in Afghanistan," pp. 679-705.
5. Laura Paler, "Keeping the Public Purse: An Experiment in Windfalls, Taxes, and the Incentives to Restrain Government," pp. 706-725.
6. Paul Dragos Aligica and Vlad Tarko, "Co-Production, Polycentricity, and Value Heterogeneity: The Ostroms' Public Choice Institutionalism Revisited," pp. 726-741.
7. Marc Meredith, "Exploiting Friends-and-Neighbors to Estimate Coattail Effects,"



pp. 742-765.

8. Brandon J. Kinne, "Network Dynamics and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p. 766-785.

9. David A. Siegel, "Social Networks and the Mass Media," pp. 786-805.

10. Saumitra Jha, "Trade, Institutions, and Ethnic Tolerance: Evidence from South Asia," pp. 806-832.

11. Gustavo A. Flores-Macías and Sarah E. Kreps, "Political Parties at War: A Study of American War Finance, 1789–2010," pp. 833-848.

12. Michael R. Tomz and Jessica L. P. Weeks, "Public Opinion and the Democratic Peace," pp. 849-865.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9, No. 4*

1. Inanna Hamati-Ataya, "Reflectivity, reflexivity, reflexivism: IR's 'reflexive turn'-and beyond," pp. 669-694.

2. Choong-Nam Kang and Douglas M. Gibler, "An assessment of the validity of empirical measures of state satisfaction with the systemic status quo," pp. 695-719.

3. Alexander Anievas, "1914 in worl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uneven' and 'combined' origins of World War I," pp. 720-746.

4. Martin Austvoll Nome, "Transnational ethnic ties and military intervention: Taking sides in civil conflicts in Europe, Asia and North Africa, 1944–99," pp. 747-771.

5. Monika Heupel, "With power comes responsibility: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in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 policy," pp. 773-796.

6. Paul Kirby, "How is rape a weapon of war? Femin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odes of critical explanation and the study of wartime sexual violence," pp. 797-821.

7. Eric Grynaviski, "Contrasts, counterfactuals, and causes," pp. 823-846.

8. Eva Erman, "In search of democratic agency in deliberative governance," pp. 847-868.

9. Torsten Michel, "Time to get emotional: Phronetic reflections on the concept of 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869-890.

10. Axel Heck and Gabi Schlag, "Securitizing images: The female body and the war in Afghanistan," pp. 891-913.

11. Jelena Subotic and Ayşe Zarakol, "Cultural intima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915-938.

12. Edward Keene, "Social status, social closure and the idea of Europe as a

‘normative power’,” pp. 939-956.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8, No. 2*

1. Lucas Kello, “The Meaning of the Cyber Revolution: Perils to Theory and Statecraft,” pp. 7-40.
2. Erik Gartzke, “The Myth of Cyberwar: Bringing War in Cyberspace Back Down to Earth,” pp. 41-73.
3. David A. Lake, “Legitimizing Power: 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U.S. International Hierarchy,” pp. 74-111.
4. Charles L. Glaser, “How Oil Influences U.S. National Security,” pp. 112-146.
5. Jeff D. Colgan, “Fueling the Fire: Pathways from Oil to War,” pp. 147-180.
6. Campbell Craig, Benjamin H. Friedman, Brendan Rittenhouse Green, Justin Logan, Stephen G. Brooks, G. John Ikenberry, William C. Wohlforth, “Debating American Engagement: The Future of U.S. Grand Strategy,” pp. 181-199.
7. Alex J. Bellamy, Robert A. Pape, “Reconsidering the Cases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pp. 200-202.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7, No. 4*

1. Michael A. Allen and Matthew Digioseppe, “Tightening the Belt: Sovereign Debt and Alliance Formation,” pp. 647-659.
2. Max Abrahms, “The Credibility Paradox: Violence as a Double-Edged Sword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660-671.
3. Timothy M. Peterson, “Sending a Message: The Reputation Effect of US Sanction Threat Behavior,” pp. 672-682.
4. Seo-Young Cho, “Integrating Equality: Globalization, Women's Rights, and Human Trafficking,” pp. 683-697.
5. Simone Dietrich, “Bypass or Engage? Explaining Donor Delivery Tactics in Foreign Aid Allocation,” pp. 698-712.
6. Catherine Eschle, “Gender and the Subject of (Anti) Nuclear Politics: Revisiting Women’s Campaigning against the Bomb,” pp. 713-724.
7. Graeme A. M. Davies and Robert Johns, “Audience Costs among the British Public: The Impact of Escalation, Crisis Type, and Prime Ministerial Rhetoric,” pp. 725-737.
8. Elizabeth Buckner and Susan Garnett Russell, “Portraying the Global: Cross-national Trends in Textbooks’ Portrayal of 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Citizenship,” pp. 738-750.

9. Nathan M. Jensen, “Domestic Institutions and the Taxing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pp. 751-759.

10. Ryan Kennedy and Lydia Tiede, “Economic Development Assumptions and the Elusive Curse of Oil,” pp. 760-771.

11. Nicola Pratt, “Reconceptualizing Gender, Reinscribing Racial–Sexual Boundaries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 Case of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325 on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 pp. 772-783.

12. Karl Kaltenthaler and William J. Miller, “Social Psychology and Public Support for Trade Liberalization,” pp. 784-790.

13. Richard A. Nielse, “Rewarding Human Rights? Selective Aid Sanctions against Repressive States,” pp. 791-803.

14. José Fernández-Albertos, Alexander Kuo and Laia Balcells, “Economic Crisis, Globalization, and Partisan Bias: Evidence from Spain,” pp. 804-619.

15. Sean Starrs, “American Economic Power Hasn't Declined—It Globalized! Summoning the Data and Taking Globalization Seriously,” pp. 817–830.

16. Paul Poast and Johannes Urpelainen, “Fit and Feasible: Why Democratizing States Form, not Jo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pp. 831-841.

17. Michael Breen and Iain McMenami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Credible Commitment, and Sovereign Debt in Advanced Economies,” pp. 842-854.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7, No. 6***

1. Ursula Daxecker and Brandon Prins, “Insurgents of the Sea: Institutional and Economic Opportunities for Maritime Piracy,” pp. 940-965.

2. Daniel Druckman and Mara Olekalns, “Motivational Primes, Trust, and Negotiators' Reaction to Crisis,” pp. 966-990.

3. Milica Kecmanovic, “The Short-run Effects of the Croatian War on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pp. 991-1010.

4. Yonatan Lupu and Vincent A. Traag, “Trading Communities, the Networked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Kantian Peace,” pp. 1011-1042.

5. Rose McDermott, Chris Dawes, Elizabeth Prom-Wormley, Lindon Eaves, and Peter K. Hatemi, “MAOA and Aggression: A Gene–Environment Interaction in Two Populations,” pp. 1043-1064.

6. Ahmer Tarar and Bahar Leventoğlu, “Limited Audience Costs in International

Crises,” pp. 1065-1089.

7. Anita Gohdes and Megan Price, “First Things First: Assessing Data Quality before Model Quality,” pp. 1090-1108.

8. Bethany Lacina and Nils Petter Gleditsch, “The Waning of War is Real: A Response to Gohdes and Price,” pp. 1109-1127.

####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20, No. 5***

1. Juliet Johnson, Daniel Mügge, Leonard Seabrooke, Cornelia Woll, Ilene Grabel & Kevin P. Gallagher,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troduction to the 20th anniversary issue of RIPE,” pp. 1009-1023.

2. John M. Hobson, “Part 1 – Revealing the Eurocentric foundations of IPE: A critical historiography of the discipline from the classical to the modern era,” pp. 1024-1054.

3. John M. Hobson, “Part 2 – Reconstructing the non-Eurocentric foundations of IPE: From Eurocentric ‘open economy politics’ to inter-civiliz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p. 1055-1081.

4. J. C. Sharman & Catherine Weaver, “RIPE, the American School and diversity in global IPE,” pp. 1082-1100.

5. Peter J. Katzenstein & Stephen C. Nelson, “Reading the right signals and reading the signals right: IPE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2008,” pp. 1101-1131.

#### ***Security Studies, Vol. 22, No. 4***

1. Zoltán I. Búzás, “The Color of Threat: Race, Threat Perception, and the Demise of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1902–1923),” pp. 573-606.

2. Steven Ward, “Race, Status, and Japanese Revisionism in the Early 1930s,” pp. 607-639.

3. Zachary Zwald, “Imaginary Nuclear Conflicts: Explaining Deterrence Policy Preference Formation,” pp. 640-671.

4. Evan N. Resnick, “Hang Together or Hang Separately? Evaluating Rival Theories of Wartime Alliance Cohesion,” pp. 672-706.

5. Scott Fitzsimmons, “Wheeled Warriors: Explaining Variations in the Use of Violence by Private Security Companies in Iraq,” pp. 707-739.

6. Alex Wilner, “Fencing in Warfare: Threats, Punishment, and Intra-war Deterrence in Counterterrorism,” pp. 740-772.

7. Andrew Moravcsik, “Did Power Politics Cause European Integration? Realist

Theory Meets Qualitative Methods,” pp. 773-790.

8. Craig Parsons, “Power, Patterns, and Process in European Union History,” pp. 791-801.

9. Sebastian Rosato, “Theory and Evidence in Europe United: A Response to My Critics,” pp. 802-820.

#### ***World Politics, Vol. 65, No. 4***

1. Edward D. Mansfield and Diana C. Mutz, “US versus Them: Mass Attitudes toward Offshore Outsourcing,” pp. 571-608.

2. Hanna Lerner, “Permissive Constitutions, Democracy, and Religious Freedom in India, Indonesia, Israel, and Turkey,” pp. 609-655.

3. Jeff D. Colgan, “Domestic Revolutionary Leaders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pp. 656-690.

4. Iain Hardie, David Howarth, Sylvia Maxfield and Amy Verdun, “Banks and the False Dichotomy in the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of Finance,” pp. 691-728.

5. Dan Slater, “Democratic Careening,” pp. 729-763.

####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9, No. 5***

1. John Macmillan, “Intervention and the ordering of the modern world,” pp. 1039-1056.

2. Christian Reus-Smit, “The concept of intervention,” pp. 1057-1076.

3. Edward Keene, “International hierarch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practice of intervention,” pp. 1077-1090.

4. John Macmillan, “Historicising intervention: strategy and synchronicity in British intervention 1815–50,” pp. 1091-1110.

5. Richard Little, “Intervention and non-interven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Britain's responses to the American and Spanish Civil Wars,” pp. 1111-1129.

6. Robbie Shilliam, “Intervention and colonial-modernity: decolonising the Italy/Ethiopia conflict through Psalms 68:31,” pp. 1131-1147.

7. Lee Jones, “Sovereignty, intervention, and social order in revolutionary times,” pp. 1149-1167.

8. Susan L. Woodward, “The long intervention: continuity in the Balkan theatre,” pp. 1169-1187.

9. Toby Dodge, “Intervention and dreams of exogenous statebuilding: the application

of Liberal Peacebuilding in Afghanistan and Iraq,” pp. 1189-1212.

10. David Williams, “Development, interven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pp. 1213-1231.

11. George Lawson and Luca Tardelli,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intervention,” pp. 1233-1253.

[整理: 赵姝婧、宁鹏举、于凯玥]

[责任编辑: 于凯玥]

[校对编辑: 刘雨晨]

### …………… 世界百名政要送别民主与自由战士——曼德拉 ……………

2013年12月6日(当地时间5日),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住所去世,享年95岁。曼德拉去世后,他的葬礼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南非政府8日公布了9日各省悼念曼德拉活动的场所和时间,政府在各省设立90个大屏幕播放葬礼实况。英国广播公司9日称,预计将有100多名各国现任前任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曼德拉葬礼,联合国、欧盟和非盟领导人已确认出席。美国确认奥巴马夫妇、前总统卡特夫妇、前总统小布什夫妇和前总统克林顿夫妇及26名国会议员参加。巴西总统卢塞夫和四位前总统参加。

曼德拉于1994年至1999年间任南非总统,是该国首位黑人总统,被尊称为南非国父。在任职总统前,曼德拉是积极的反种族隔离人士,同时也是非洲国民大会的武装组织民族之矛的领袖。由于其领导反种族隔离运动,南非法院曾以密谋推翻政府等罪名将他定罪。曼德拉在牢中度过了27年的漫长岁月,却始终未改变反对种族主义,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新南非的坚定信念。1990年出狱后,他转而支持不同人种间的调解与协商,并领导南非发展多元族群民主。曼德拉在40年来获得了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在内的一百多个奖项,于2004年被选为最伟大的南非人。

[整理: 马焱粮、赵政、任娟、姜忆楠]



## 读编往来

**【编者按】**自《新视界》创刊以来,一直致力于开阔国关人的视野,展现国关人的风采,成为国关学子同外界进行学术交流的平台。在以往的读编往来栏目中,小编们收到了许多来自老师和同学的祝福和建议,也对大家提出的各种问题进行了解答。恰逢年终特辑,编辑部特地对本科生读者进行调查和采访,通过读者的反馈进一步了解大家对各栏目的看法和建议,以完善对系刊的编辑。



最受欢迎的栏目:

时事观察

他山之石

国关人物

### 读者言论

学习国关离不开对时事的观察和掌握,平时学到的知识只有应用到实际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和吸收。时事观察栏目对热点问题进行的精辟全面的分析往往使人获益匪浅:在阅读中可以由他人的言论引发自身的思考,并在思考的过程中将学习到的理论知识融入进去,从而得到自身能力的提高。同时,希望这一栏目能够更加具有多样性,以不同的人的视角来看同一问题,在“百家争鸣”中让人感受到思想的碰撞和多角度的理解;也可以增加一些外媒对这些事件的报道或者知名学者对事件的解读,使我们对事件有更加立体的了解。

——匿名读者(2012级国际政治专业

本科生)

对于刚刚接触国关的我而言,理论知识还相对匮乏,在这种时候很高兴能够有系刊来帮助我的学习。通过国关人物,我得以近距离了解大师的学术经历和研究精华,拓宽了视野并且增加对这一学科的了解,学术论文和他山之石更为论文的规范写作提供了范例。而迎新特辑中的各种经验分享和学习攻略不仅有助于我们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而且对于“双辅修”等问题都做出了详细的讲解,希望在以后的系刊中也能有这样答疑的内容。

——匿名读者(2013级国际政治专业  
本科生)

我比较喜欢他山之石和新书架。他山之石提供了一个平台,使我们了解外国学者的学术之路,虽然阅读过程中有些部分晦涩难懂,却不妨碍我们了解更多的学术知识,使人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而新书架则为我们推荐了最新的国关书籍,通过这些课外阅读了解学术前沿和时事热点的不同解读,提高了自身的专业素养。当然,如果可以在推荐这些最新的学术书籍的同时也推荐一些经典的国关理论读物和一些学术期刊中的

最新研究成果就更好了。

——匿名读者(2012级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

时事观察不仅能让我们了解时事动态,更通过对事件的分析使我们对热点问题一个立体的了解,年终刊的时事盘点也很有意思。

——匿名读者(2011级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

### 小编总结



首先感谢各位本科生同学积极参与系刊的反馈调查并提出宝贵的意见。编辑部将会根据大家的建议,完善各个栏目的设置,改进各栏目的内容。

作为系刊年终的一个总结,评选出的三个受欢迎栏目可以说各具特色;在调查和统计的过程中小编也发现了读者们的阅读倾向:既有对时事的关注,也有对学术和大师的关注。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各位同学的偏好确实存在着一些区别:大二的同学大多喜欢迎新特辑中对学习的建议和“双辅修”等情况的介绍,想要投稿的同学比较关注英采

飞扬,想到国外交流学习的同学则喜欢海外国关人等栏目。

在此,小编只能截取一些读者的留言,没有办法将大家的想法一一呈现出来,但是我们会把信息反馈给编辑部,并根据意见进行栏目的调整。

在以后的读编往来中,小编将继续和大家的交流,为大家解答疑惑,推进系刊的工作进展地更加顺利,也真心希望各位读者能够积极的参与互动,持续关注和监督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

《新视界》信箱:

把你想对我们说的话,对我们改善栏目的建议,以及希望得到我们解答的疑惑,发给我们吧!来信请发:[newvision@mail.nankai.edu.cn](mailto:newvision@mail.nankai.edu.cn)。我们将尽可能迅速和详细地回答你的提问。

[整理:王芳琳、李冰莹、李 漩]

[责任编辑:李冰莹]

## 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论文注释体例

### 一、总 则

1. 正文注释采用页下注(脚注), 每页依序重新编号。
2. 注释格式: 中文字体为宋体, 英文字体为 Times New Roman, 字号小五, 单倍行距。
3. 学位论文后必须列出“参考文献”, 课程论文一般不做要求。
4. 所引资料务必真实、准确、规范。

### 二、中文注释

#### (一) 著作

1. 专著: 著者, 文献名, 卷册序号, 出版地, 出版机构, 出版时间, 页码。若出版机构名称已包含地名, 不必重复注出。

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 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201 页。

2. 编著: 应在编者姓名后加“编”或“主编”、“编著”。

王逸舟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60-68 页。

3. 译著: 在著者姓名前可以“[]”标明著者国别; 在文献名之后, 可标明译者。

[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六章”。

4. 如著者、编者为二人, 两者姓名之间以顿号间隔; 如为三人以上, 可省略为“×××(第一责任者姓名)等(编)”。

宇燕、盛洪:《旧邦新命》, 上海三联书店 2004 年版, 第 146、158 页。

吴志成、薛晓源主编:《欧洲研究前沿报告》,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陈志瑞等主编:《开放的国际社会: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英国学派》,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49 页。

#### (二) 文章

1. 文集论文: 著者, 文章题目(加书名号), 文集编者名称, 文集名, 出版地、出版单位及版次, 页码。

[美]威廉·沃尔福思:《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 载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99-117 页。

## 2. 期刊论文

张睿壮:《“人道干涉”神话与美国意识形态》,《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第109-117页。

## 3. 会议论文

任东来:《对国际体制和国际制度的理解和翻译》,“全球化与亚太区域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天津:南开大学,2000年6月15-17日,第3页。

## 4. 学位论文

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论文,1999年4月,第55页。

### (三) 其他

如引用资料来自政府出版物、通讯社消息、未刊手稿、缩微胶卷等,其注释也应尽量标明编辑者、文献名、出版地、出版机构和时间、页码,或者文献性质、收藏地点、收藏编号等。如无需或不便标明著作者/编辑者,则标明其他类项也可。例如: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3页。

《中国与八国财长就全球经济发展等问题进行对话》,新华社莫斯科2006年2月1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研究室:《中国外交——2006年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560页。

## 三、外文注释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以英文文献为准。其他外文如法文、德文、日文、俄文等文献的释出,可参照相应文献释出的通约惯例。

### (一) 著作

专著:著者,文献名(斜体),出版地、出版机构及版次,页码。著作者姓名以名前姓后的顺序书写。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p. 18.

如为编著,则编者姓名后加“ed.”(编者为一入)或“eds.”(编者为二人以上)。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

John A.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2003, Chapter 3.

如著作者为三人以上,第一责任者姓名之后可省略为“et al.”(意即 and others)。例如:

Judith L. Goldstein, et al., *Leg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2001, p. 160.

Walter Carlsnaes, et al.,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2002, pp. 354-355.

## (二) 文章

1. 文集论文:作者,文章标题(加双引号),文集编者,文集名称(斜体),出版地、出版机构及版次,页码。

Joseph M. Grieco, “Realist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Michael W. Doyle and G. John Ikenberry, eds.,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1997, p. 169.

2. 期刊论文:作者,文章标题(加双引号),刊物名称(斜体),刊物出版卷次、期号及年份,页码。例如:

Robert Jervis, “Unipolarity: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January 2009, pp. 188-213.

3. 报纸文章:作者、文章标题(加双引号)、报纸名称(斜体)及具体出版日期,如能注明版面更好。

Joseph S. Nye Jr., “Lessons in Imperialism,” *Financial Times*, June 17, 2002.

## 4. 会议论文

David Shambaugh, “The Evolving Asian System: A New Regional Structur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East Asia Cooperation and Sino-U.S. Relations”, Beijing, China, November 3-4, 2005.

## 5. 学位论文

Ruizhuang Zha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Motives: National Interest vs. Ideolog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7, p. 9.

## (三) 其他

如引用政府或国际组织出版物、通讯社消息、未刊手稿、缩微胶卷等,其注释也应尽量

标明编辑者、文献名、出版地、出版机构和时间、页码, 或者文献性质、收藏地点、收藏编号等。如无需或不便标明著作者/编辑者, 则标明其他类项也可。

Daniel Landau, "The Economic Impact of Military Expenditure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138,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3, p. 55.

## 四、重复引用和转引

### (一) 重复引用

如重复引用同一文献, 不论中外文, 只需注明著作者、文献名和页码。

沃尔福思:《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 第 101 页。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12-113.

### (二) 转引

#### 1. 中文文献

先将转引文献按上述注释方式释出, 以句号结束。再以“转引自”把载有转引文献的来源文献按相应方式释出。

[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 体系、过程与政策》(曹沛霖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232 页。转引自胡鞍钢:《中国崛起之路》,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181 页。

#### 2. 外文文献

Hans Morgenthau, *Scientific Man vs. Power Politic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6, p. 194. Quoted in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2001, p. 19.

## 五、互联网资料

使用互联网资料时, 著作者、文献名称等类项同上述相应体例, 同时注明详细网址和访问时间。

《中美联合声明》, 新华网, 2009 年 11 月 17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1/17/content\\_12475620.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1/17/content_12475620.htm) (最后访问时间: 2009 年 12 月 10 日)。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25: A Transformed World," [http://www.dni.gov/nic/PDF\\_2025/2025\\_Global\\_Trends\\_Final\\_Report.pdf](http://www.dni.gov/nic/PDF_2025/2025_Global_Trends_Final_Report.pdf) (最后访问时间: 2009 年 12 月 14 日)。



## 六、参考文献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供制作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时参考。

### (一) 中文部分

中文参考文献的书写体例同中文注释体例，文献排序规则如下：

1. 中文作者按照姓氏拼音排列；
2. 译著按照作者中译名顺序排列。
3. 同一作者的多篇文献，以专著、编著、论文为类依次排列，同一类文献按出版时间升序排列；
4. 期刊和文集集中的论文须注明起始页码。

示例如下：

1.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2. 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3. 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8 年版。
4.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5.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 3 期，第 165-176 页。
6.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一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 年版。

### (二) 外文部分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以英文文献为准。其他外文如法文、德文、日文、俄文等文献的，可参照相应文献的通约惯例。书写体例如下：

1. 第一著作者姓名以姓前名后的顺序书写，姓名以逗号间隔；
2. 以第一著作者英文姓氏顺序排列，首行缩进 2 字符；
3. 同一作者的多篇文献，以专著、编著、论文为类依次排列，同一类文献按出版时间升序排列；
4. 同一作者姓名多次出现以“——”代替；
5. 期刊和文集集中的论文须注明起始页码。

示例如下：

- Doyle, Michael W. 1983. "Kant,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Part II."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2(4): 323-353.

———. 1986.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 (4): 1151-1169.

Elman, Coli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2001. *Bridges and Boundaries: Historians, 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Keohane, Robert O. ed. 1986.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altz, Kenneth N. 1967. *Foreign Polic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2000.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1): 4-41.

———. 2002. “Intimations of Multipolarity.” in Birthe Hansen and Bertel Heurlin eds. *The New World Order: Contrasting Theories*. London: Macmillan. pp. 1-18.

## 征稿启事

《新视界》(季刊)是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主管,国际关系系学生自筹自办、倡导学术性和生活性相结合的学生刊物。本刊秉承“知识性、交流性、原创性”原则,以“我的视界我做主”为理念,旨在为师生搭建交流的平台、营造学术的争鸣氛围,为国际关系的发展提供助力。“立足于南开,但又限于南开”,我们热忱欢迎校内外和国内外学人和同学惠赐佳作。

本刊主要有学人访谈、学术论文、书山有路、国关人物、他山之石、新书架、英采飞扬等固定栏目。另外,根据学科发展及国际形势变化,本刊还适时增设论文工作坊、学界动态、聚焦、笔谈等浮动栏目。本刊欢迎学术性论文(包括书评),国内外国际关系学者访谈、学术历程介绍及轶事,新书评介及学术动态等方面的稿件。来稿正文字数在 10000 字以内为宜。

### 投稿须知:

1. 本刊来稿一律要求原创首发,文责自负,反对剽窃、抄袭等一切学术不端行为(由于本刊**内部发行**,**不影响**作者**转投**其他公开性学术刊物)。本刊将竭诚为作者进一步研究提供交流平台。
2. 来稿需为 Word 文档格式,注释采用脚注,格式参阅本刊附录《国际关系系论文注释体例》。投稿请作者把稿件电子版以附件形式发至本刊邮箱 [newvision@mail.nankai.edu.cn](mailto:newvision@mail.nankai.edu.cn),并请提供 200 字以内作者基本信息(姓名,性别,教育背景,单位,职称,邮箱,电话,通信地址等)。
3. 首次涉及的外国人民、地名、机构名及其他专有名词,中译名请参照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并在中译名后括号内注明原文。
4. 所有学术性来稿采取双向匿名审稿制度,将在一个月内审读来稿并告知作者是否采用。对拟采用的稿件,编辑部将请作者根据评审意见进行修改,并在出刊后向作者寄送该刊物两本。另外,本刊根据栏目需要有权对来稿酌情删改,如不同意请在来稿中注明。
5. 编辑部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中国天津市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300071)

邮箱: [newvision@mail.nankai.edu.cn](mailto:newvision@mail.nankai.edu.cn)

博客: <http://blog.sina.com.cn/nkirnewvision>

主页: <http://nknewvision.yolasite.com/>

# New Vision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主管  
《新视界》编辑部 主办